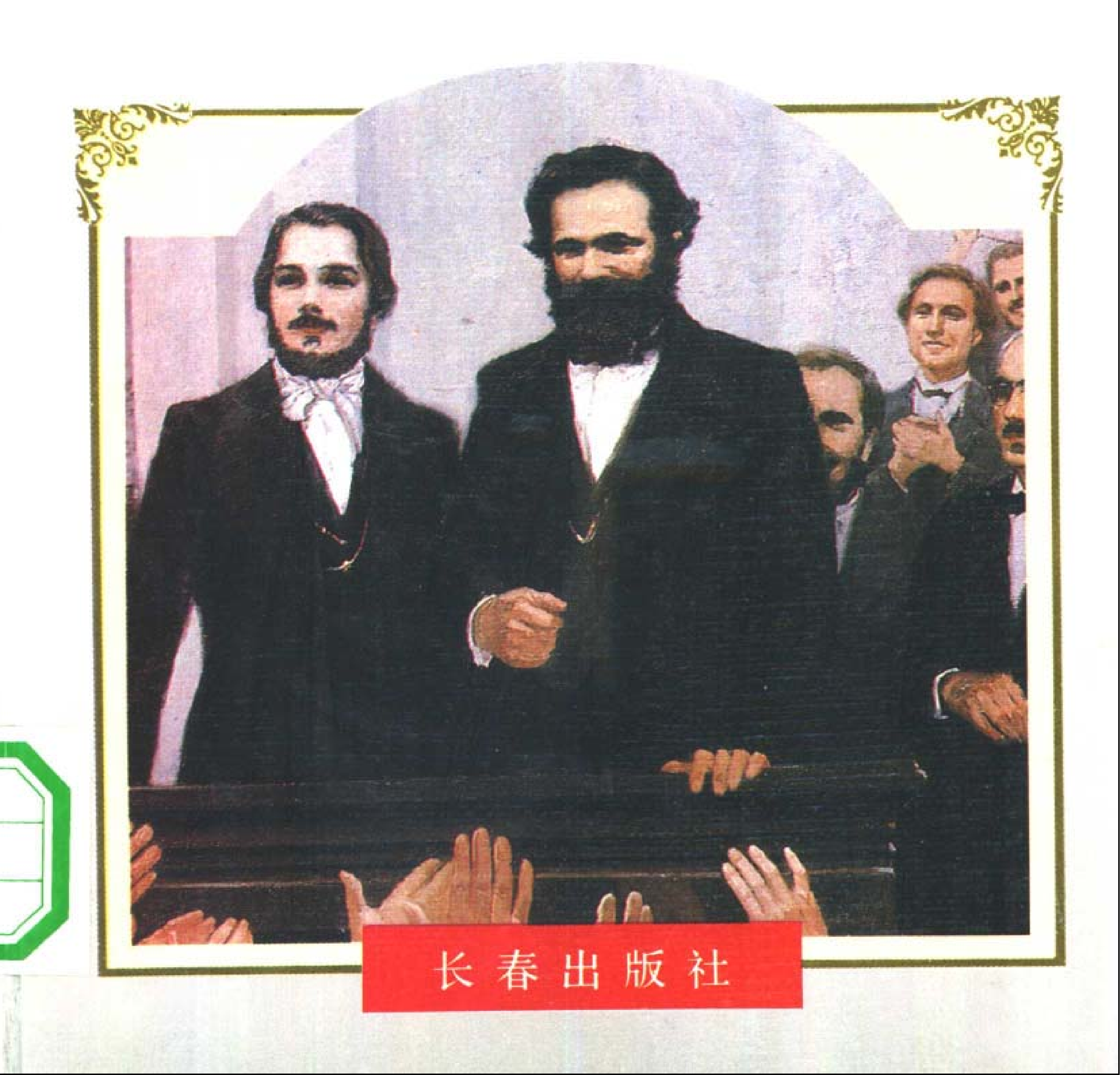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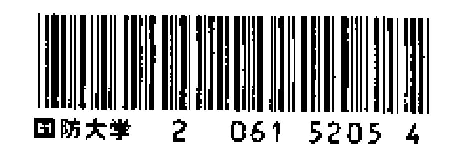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巨星光环

——马克思恩格斯的坎坷生活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巨星光环

——马克思恩格斯的坎坷生涯

钟立恒 周 杰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巨星光环

钟立恒　周杰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肇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1.2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8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4.5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啻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人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人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读。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序 言

时间在飞逝，奔驰向永恒。

你若是永恒，它与你同在。

——席勒

席勒的诗句，用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早已离开了人间，但是他们的理论学说却不断地激励着世界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从人类历史中消失，它们是永恒的，它们将与时间同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不仅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

规律，认识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且找到了实现这一使命的战略和策略，明确了前进的道路。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才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他们产生了无比的尊敬、热爱和怀念。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撰编书籍，在国内已如浩海，本无另洒笔墨的必要。但纵观各类有关撰著及译编，能简要介绍两颗巨星生平坎坷艰辛、思想发展道路峻峭崎岖的书籍确属不多。所以很有必要编写篇幅不大，却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巨星生涯的小书。

本书编者在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资料的过程中，不揣冒昧，突出选择了巨星近人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星照寰宇，但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也是由一个普通的人成长起来的，他们从来不是天生的神灵，而是像正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性格、感情和理想。当然，既然来自普通的人，难免也会有一些微瑕，比如，本书提到马克思在波恩大学读书时，因受波恩风气的影响，曾酗酒遭校方禁闭。甚至还

与贵族子弟偷偷进行决斗，终使忧虑的父亲把他转入柏林大学。还如马克思与燕妮相恋，也曾沉迷于爱河，不能收心读书，遭父亲训导。而恩格斯虽从小酷爱自由，极力挣脱资产者家庭的锁链，但也不得不多次屈从父亲，学习“该死的生意经”。正是由于书中展现这些诸多动人的事例，才能使读者以巨星成长为线索，更加深刻地掌握他们作为常人的不常之处，达到理解“巨星光环”的真意，并从他们的人格、意志、情操等多方面得到有益的启示。

革命导师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更是辉煌的，要在区区一本小书中全部显映出来，实在是不可能。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在取舍剪裁资料方面是否得体，论述量度著文方面是否合适，自有不少问题。所以，书中谬误疏漏之处，深望读者不吝指正。

第二章　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

布雷加塞街664号，是德国西部特利尔城的一幢普通的小房子。1818年5月5日，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里诞生了，他就是卡尔·马克思

特利尔是德国西部莱茵省最溽热的一个城市，连碧绿的摩塞尔河也显得燥灼难当，加上茂密的森林挡住了风势，以致瘴气流行，云雾迷漫……

城内满布的是使人厌倦的尖顶的天主教堂，新教堂和犹太教堂。居民中有不少十分穷苦的人。穷富是那样的分明，以致富人不想看到穷人，穷人也不敢靠近富人。富人有漂亮的别墅，院庭内有奇花异草组成的花园，成排绿树浓荫守卫在院庭的周围；而穷人则集中住在

低矮、破烂、肮脏、连成一片的小屋子内，污水、垃圾、粪便满地都是。他们终年不得一饱，破衣烂衫，骨瘦如柴，满身污垢，愁眉苦脸。

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家住在布雷加塞街，门牌664号。

住宅的外表平淡无奇。大门上边的几个拉丁字码是唯一的、不显眼的装饰物。字码大概是在做什么测量时留下的。房屋修建于18世纪，是圣罗棱士教堂的财产。教士们把它租给了公国中中产的官员。这种房子里没有住过任何比较著名的人物。在特利尔，这种房屋不知不觉中修起了几百幢，曾供给了好几辈人居住。

1818年开头，还是冬天，法律顾问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罕丽达·普勒斯堡到布雷加塞来找房子。觉得这幢房子虽然光线微弱，但房屋安排十分方便，而且幽静、宽敞，于是决定长期租下这幢房屋。

这年5月5日，马克思夫人就在这幢房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取名叫卡尔·马克思。

孩子在母亲的房间里生活了一年。后来，盖尔曼·卡尔在1819年出世以后，他便被送

去和哥哥姊妹们住在一起了。

在布雷加塞街664号住宅里，孩子的床不断增加。罕丽达教育孩子很严格。她受过相当的教育，知道新鲜空气、清洁卫生和正确的作息时间能保证孩子的健康。马克思夫人非常看重贤妻良母的称号，这种称号使她担负起许多义务。罕丽达从小就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在故乡尼威根——一个不发达的荷兰城市的时候，她就学习过令人厌倦的复杂的操持家务的艺术。荷兰人的住宅，特别是妇女的深闺是不让外人出入的。只有亲属和最近的朋友才能进去。尼威根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用沉甸甸的窗帘遮掩着。这些人家的妇女的生活都沉静、严峻、忧郁和端庄的。

亨利希·马克思一生勤奋学习。他的父亲马克思·列维是一名犹太律法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因好学而逐渐学识渊博。他喜爱哲学和古典文学，崇拜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等人，相信法律是自由、平等的保障。但是，由于他工资比较优厚，工作也很稳定，所以在政治上没有革命的要求。他不希望当时普鲁士王朝被推翻。他希望恬静，认为安静是公

民的首要职责，守纪是人的本份。1824年，他和家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可是，尽管他那样尊重王朝，而王朝并不尊重他。由于他信仰自由主义思想，曾经受到政府的监视。亨利希·马克思在特利尔市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为他待人忠厚，又很正直，后来被推选为特利尔市律师公会会长，还获得司法参事的荣誉称号。他的许多优点，对卡尔·马克思都有很大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兄弟姐妹九人：哥哥莫里茨·达维生下来体质很弱，到四岁时就死了。姐姐索菲亚比卡尔·马克思大两岁。卡尔·马克思还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与两个弟弟相比，卡尔·马克思的身体最健壮。他的面孔很像父亲，黑头发，宽肩膀，两腿粗壮而显得有点短，躯干强而有力，显得十分结实。他的性格也十分顽强，两个弟弟就大不相同了。大弟弟盖尔曼窄胸脯，驼背，面色苍白，老成温顺，精神萎靡；小弟弟爱德华多病，到十几岁就离开了人间。尽管他们家里人口很多，但由于父亲有优厚的工资，家里的生活还是文明的、富裕的。

卡尔·马克思的双亲的婚姻是极其美满的，因此，作为仅次于长姊索菲亚的最大的男孩子，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渡过的。1820年初，马克思一家从布雷加塞街664号搬到西梅昂街1070号的房子里。卡尔纵情地和弟妹们在花园里奔耍，或是在附近的马尔库斯山丘把他们当作马儿驱赶着飞驰下山。他很淘气，常常作弄姐妹们，但又懂得如何向她们和她们的女友讲述奇妙动人的故事，来迅速重新赢得她们的好感。卡尔的小学全部课程都是在父母亲的指导下学完的，因而没进过小学校。他的“辉煌的天赋”在他父亲心中唤起希望，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才能终将用于造福人类的事业。不过，作为父亲，他希望卡尔能够沿着自己走过的道路，成为他本人在年轻时所力图达到的那种理想人物：一个大法官、大法学家，备受人们尊敬的、富有理性和博爱精神的律师。母亲对卡尔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她把儿子称做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幸运儿。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

亨利希·马克思在1830年把年满12岁的儿子卡尔送进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法国的七月革命在同年爆发。这一年也是卡尔·马克思生活史上新篇章的开始。

特利尔中学从1815年起就由普鲁士文化部领导，但柏林政府始终未能使这所学校在思想上屈从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精神。这首先应归功于那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符登巴赫校长主持校务有方，他知道如何在这个学校培养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该校的教学水平也很高，教师中有好几名是科学家。

卡尔的少年时代的同学多半是资产阶级和官吏的子弟，但也有不少是手工业和农民的子女，他们都希望将来当牧师或政府官员。同学中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怕他，正像他的女儿爱琳娜后来忆及她的双亲和亲属时所描述的：“喜欢他，是因为他乐于和他们一起闹着玩；怕他，是因为他能写辛辣的讽刺诗和善于

嘲弄他的对手”。和他交往密切的显然只有年岁比他略小的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是在同一时期进入这所中学的，他和卡尔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同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这种从幼年开始的友谊并非偶然，因为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一家和司法参事马克思一家很早就认识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本人跟他那些同僚及地位相当的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位有高深素养和富于自由思想的人。父系方面原是出身于德国平民阶层，只是到了父亲一辈才以军功卓著被封为贵族。威斯特华伦的父亲怀着市民阶级的自豪感，同一个苏格兰贵族的女儿结了婚。

威斯特华伦一家的住宅坐落在罗马街，离马克思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两家的孩子早就建立了友谊。卡尔的姐姐索菲亚和比她大两岁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是知心朋友，卡尔和燕妮也互相倾慕。这对少年男女常常在一起游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吸引着中学生卡尔的不仅仅是燕妮和埃德加尔，她们的父亲同样使卡尔非常愿意接

近。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喜爱这个邻家的早熟的孩子，而卡尔也对他敬如慈父。枢密顾问官非常欣赏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能用英语和德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本，并深爱浪漫主义文学。他善于用自己爱好人本主义文学的热忱感染别人，并传给青年一代。对求知心切的卡尔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位慈父般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激励是他在学校，甚至从某些方面说来在自己的家里也得不到的。此外，燕妮的父亲并不仅在文学领域向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枢密顾问还关注社会问题。卡尔在童年时代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挤满了贫苦农民的中心广场，在长远的路途中目睹城里贫民区的惨状。所以当这位慈父般的朋友指控这种使很多特利尔人备受折磨的贫困状况时，他总是精神专注地倾听着。几十年后，马克思还回忆说，自己正是在威斯特华伦家里第一次听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的思想。

卡尔在中学里的五年学习，使他逐渐成为十分持重的学生。他不追求分数和奖励，但是十分酷爱知识，喜欢自学，又肯思考问题，谈

话也喜欢追根问底。由于爱看书，性格显得孤僻，尤其是在假期里，他往往离群独居。在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籍。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最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席勒、歌德和伏尔泰、莱辛、圣西门等人的著作。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就是读、想、写，把读过的东西认真思考后用自己的语言写札记、纲要和摘要。他习惯于在夜静时学习，往往睡得很晚，起得很晚。

卡尔·马克思能够那样热爱学习，与他父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父亲勤奋学习和对文学、哲学的爱好，诱使卡尔·马克思酷爱书本。父亲偏爱这个早熟的孩子，常常在晚上穿着丝绒便鞋，披着长便衣，把便帽歪戴在后脑勺上，悄悄地走进卡尔的房间，以漫谈的方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父亲也很乐意听卡尔谈自己的见解。这样两个人就针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讨论起来。有时他们的谈话甚至不知不觉地进行到鸡叫才各自去睡觉。

卡尔有敏捷的领悟力，在升入高中最后一年级时，绝大多数课程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优

异成绩。1835年9月，他才17岁，就中学毕业了。王室考试委员会在他的中学毕业证书上写了鉴定："该生天资聪颖，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课程中表现出非常令人满意的勤勉，数学课程是令人满意的勤勉，在法语课程中是颇为勤勉"，最后又说："因此本委员会衷心希望该生将由于得天独厚而获得应有的美好前程。"

在他写的毕业作文中，有一篇德文文章特别引人注目。这篇作文的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年轻的马克思谴责那种仅仅依据自私自利的打算或基于物质利益来选择职业的做法。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思想高尚、致力于为全人类服务的人们，历史称之为最伟大的人物；对于曾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经验颂之为最幸福的人。"这位17岁的青年认为，为人类服务并切实做到这一点是自己的本分，是一种福气。

这也是他的老师符登巴赫所倡导并经常向同学们宣讲的思想。但当时正在成长中的马克思却已经看到选择职业并不决定于个人的主观志愿了。他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

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种种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发人深思的,它表明了这个高中毕业生已经意识到各种社会关系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他用这样的话结束自己的文章:“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我必须学习法律,但还感到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要求,就是要用全力为哲学奋斗。”

卡尔·马克思于 1835 年 10 月中旬离开特利尔,乘船沿摩塞尔河转莱茵河顺流而下,到达波恩。在那里他遵从父亲的愿望改读法

律。

波恩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当时波恩大学有700多名学生。虽然大学生反对封建制度的运动已经被镇压下去，但是，争取自由、和平的斗争还是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学生们以“同乡会”的组织形式同政府和警察进行斗争。学校的秩序很混乱，不少学生酗酒，决斗成风。

卡尔·马克思以巨大的热忱从事学习。他打算选修九门课程，其中大多是法学课程，但也有文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课程，以致父亲写信给他说：“九门大学课程在我看来是有点过多了，我不希望你选修超出自己体力和精神所能承担的课程。当然，如果你对此不感到任何困难，倒也未尝不可。须知光阴短促，知识无涯。”

马克思确实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但由于很快就断定大多数课程都不能使自己满意，他就削减了听课的次数，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学。他想看的书很多，不得不利用夜间和其他课外时间阅读。他感觉时间不够用，一个小时60分钟、一天24小时太短了。由于大脑过于

兴奋和疲劳过度，他得了失眠症，常常头痛和精神不振。为了恢复健康，在圣诞节的前夕，马克思只得根据母亲的意见到荷兰姨父尼姆韦根家里去度节和休息游玩。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息游览才恢复了健康。

到了第二学期，马克思熟悉了大学的生活。他经不住同学们的劝诱而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被推选为特利尔“同乡会”的主席。有一次他因夜间和同学们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被学校的法官禁闭了一天。他在禁闭室内，一群大学生还拥进去用酒祝贺他“光荣”地被罚。还有一次，马克思竟和一位贵族出身的浪漫弟子偷偷地进行决斗。当然，这些“活动”马克思也诚实地告诉了父亲。

父亲对这种发展趋势深感忧虑，因此在第一个学年结束之前，即给波恩大学当局写了函件说：“我儿子卡尔·马克思下学期要进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在波恩进修的法律和官房学。这不仅得到我的准许，而且是我的意愿。”

1836年10月，卡尔·马克思到了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柏林比特利尔和波恩都大得多了，是当时欧洲的第九大城市。马克思身在柏

林，感觉特利尔和波恩简直都是乡村，他的衣着也显得土里土气。柏林城里那些雄伟壮丽的楼房，一幢幢林立在大街两旁，街头熙熙攘攘，服饰华丽的人群川流不息，从文武官员到大学生都穿着金丝点缀的呢子制服。

卡尔·马克思在柏林大学附近一个僻静的公寓住了下来。柏林大学有二千多名学生，是哺育哲学家的摇篮，德国一些著名的哲学家都曾在那里任教。大哲学家黑格尔晚年在那里讲学达13年之久。他已经去世五年了，但是他的学生还占据着许多讲席。伟大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也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后来，他从无神论转向了唯物主义，正确地解决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在柏林大学，卡尔·马克思能够较为静心地博览群书。这里没有象波恩大学结伙酗酒的现象，也不准成立同乡会之类的学生团体。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柏林大学曾作如下评语："比起这里的习艺所来，其它大学就是不折不扣的酒馆。"

刚进柏林大学的马克思，对教授们十分崇拜。他十分热心地去听课，除了法律之外，他还听哲学和历史课。可是一个学期之后，他厌

倦了许多教授只会死背老一套讲义的课堂，因此，他除了听少数几位出色的教授讲课之外，就自由地钻研各种科学。

马克思信守自己向父亲许下要学习法律的诺言，并且在柏林大学啃了堆积如山的专业文献，大大超过正常课程所指定的参考书籍。然而没有多久，法律专业课程的学习比起钻研哲学来，已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马克思后来谈起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必须学习法律，但还感到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要求，就是要用全力为哲学奋斗。"他精心研究康德、费希特、卢梭、伏尔泰、谢林等人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不能使他继续前进。后来甘斯教授指导他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博大、庞杂，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1837年夏天，卡尔·马克思累病了，他准备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宁静的小渔村——施特拉劳疗养三、四十天。起初他在那里常去河里划船，或者沿着河边散步。过了几天，他觉得自己已能够看书了，就系统地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并写了大量的摘

要和评注。他觉得自己的这种学习方法比教室内靠教授点点滴滴的喂养、机械地灌输，效果要好得多。

黑格尔关于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世界都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的观点，给马克思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像风暴那样使他久久不能平静。辩证法吸引了他，他成了黑格尔的俘虏，变成了一个黑格尔分子。他和几位青年黑格尔派著名的活动分子交上了朋友。不久，马克思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博士俱乐部”。

青年黑格尔派是从黑格尔学派分裂出来的派别。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对普鲁士反动统治阶级具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使对统治阶级持不同态度的学者容易产生对黑格尔哲学不同理解，形成互相对立的派别。黑格尔把反动的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和禁锢人们思想的基督教说成是合理的、必然的，他的格言是：“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和必然的。”这样得到统治阶级的赞扬，他因此在去世前一年被提升为柏林大学校长，他的哲学被推崇为国家哲学。但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丰富的辩

证法思想，对普鲁士封建统治阶级却是很不利的。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是永恒存在，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无止境地发展着，昨天还是合理存在的事物，到了今天就该消亡。以此类推，普鲁士王国、封建制度也不应该是永恒的。黑格尔去世不久，由于他的哲学体系和方法之间的冲突，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和斗争激化，黑格尔学派分裂了。政治上保守、竭力维护封建宗教统治的人，形成了黑格尔右派，或称正统黑格尔派或老年黑格尔派；而那些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则利用黑格尔辩证法，为他们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宗教服务，形成了黑格尔左派，因这派年龄多在30岁以下，所以又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组织。

卡尔·马克思加入这个组织，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大多数成员比他大十来岁，他们早已不是学生了。尽管这样，马克思很快成为具有最强大思想推动力的几个成员之一。他同布鲁诺·鲍威尔与阿道夫·鲁滕堡的友谊

十分密切。布鲁诺·鲍威尔起初对这个比他小九岁的大学生有很强烈的影响，但很快看出马克思是一个在才智上同他旗鼓相当的伙伴——不仅可以共同讨论当代的一切问题，而且在个人琐事方面也能谈心求教。弗里德里希·科本也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战友深表钦佩。

关于马克思对这个组织产生过何等持久的影响，有一首诙谐诗曾十分风趣地做过描述。这首诗写于马克思离开柏林之后，作者是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1 年至 1842 年间在柏林当近卫炮兵，当时还不认识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诗中追忆这位热情奔放和勇敢无畏的同志时写道：

“谁跟在他[①] 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才智非凡的奇人。

他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① 指布鲁诺·鲍威尔。

紧攥拳头的双手，愤怒地向上伸，
好象要把苍穹扯下埃尘。
不知疲倦的力士一味猛冲，
好一似恶魔缠住了身！”

不过，马克思的思想很快就走上与青年黑格尔派们截然不同的道路。当他们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于精神——思辨的领域，首先是用于对宗教的批判，而不触及具体的现实时，马克思却日益致力于把哲学用于联系实际。

父亲对远离自己的马克思的坚定志向，勤奋努力，清晰的头脑，过人的智力，纯洁无瑕的感情，端正、耿直、坦率、诚实的品德，丝毫也不怀疑。但是作为父亲，总是牵挂着儿子的一切，每当卡尔来信谈到学习、生活和思想倾向时，父亲常常回信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建议，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父亲的不断教导和关怀，才使马克思没有偏离正确轨道，能够继续勤奋地学习。父亲在卡尔·马克思将来选择职业的问题上，与卡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自从卡尔深入哲学领域之后，有计划等大学毕业后到大学里任教，父亲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很希望卡尔成为一名律师。不过，当劝

说不了卡尔·马克思心中坚定的信念后，他并没有固执地给儿子强行规定生活道路，而只要卡尔能够选择一条使自己有可能完成“神圣的天职”的生活道路。可是他毕竟心情沉重，看出儿子的前面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却没有一个安全的碇泊之所。

1838年5月10日，父亲在长期卧病之后，溘然长逝，终年61岁。卡尔·马克思终生以衷心感激的心情怀念父亲——这位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忧虑和问题向之尽情倾诉的慈父。直到临终，他一直把父亲的肖像带在身边。

1839年初，卡尔·马克思（由于“心脏衰弱”，大概也还由于眼疾，免服兵役）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当时他住在路易森大街45号A（今路易森大街60号），这是他在柏林大学上学期间先后住过的七处地方中至今保留下来的唯一住处。

马克思选择了《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作为博士论文的论题。他非常深入地研究了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持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希腊哲学

家。最重要的是，他为伊壁鸠鲁——古希腊最伟大的启蒙者和公开反对信仰上帝的人——的无神论辩护。马克思申明自己信奉无神论，就是间接向“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和封建制度宣战。

在同一期间，马克思已经着手对同时代的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几年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继续这一工作。尽管他的博士论文中仍然持有黑格尔的，因而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他绝不是黑格尔的盲目追随者，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仍认为它绝不是哲学发展的终极，而是哲学向前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他原来就按照科学向前迈进的需要，而深深为黑格尔的思想所吸引的。因此凡是不符合这一需要的，他都加以扬弃。

1841 年 3 月，马克思写完了这篇博士论文，在序言中，马克思以豪迈的气概极力推崇普罗米修斯，称颂普罗米修斯为自由的殉道者，为神灵的仇敌和人类的朋友的象征。他决心按照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走到人民中间，以便同人民一起猛烈冲击那些倒退、压迫和愚昧的

牢狱。他把那些维护一切古旧、过时和反动事物的人比作赫尔墨斯这个上帝的使者，奥林匹斯山上希腊神的奴仆。他通过自己的哲学研究和初期的政治经历，早已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了。他决心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

就在这一年，普鲁士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遭到政府的排挤和迫害。为了免于让柏林大学唯命是从的人捉弄自己，马克思放弃了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打算，而把博士论文寄给一个比较小的政治空气比较好的耶拿大学。1841 年 4 月，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看过马克思寄给他的论文、证件之后，立即写了推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书，巴赫曼的推荐书写道：

"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本人认为该候选人实应授予学衔。"

耶拿大学的教授们看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后，一致同意巴赫曼推荐书的意见。于是七位教授在推荐书下方写道：

最尊敬的哲学系主任：

悉听尊便处理。

由于马克思博士论文写得十分出色，耶拿大学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和其他形式的考试，直接授于他哲学博士学位。这样，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正式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

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是卡尔·马克思童年时的朋友。两家住的地方很近，关系相当密切。燕妮比卡尔大四岁，她和卡尔的长姐索菲亚是好朋友，她的弟弟埃德加尔也和卡尔玩得很好。他们常常在一起嬉逐、玩耍，彼此十分开心。燕妮的父亲则非常喜爱聪明调皮的卡尔，时常在家里用磁性般的语言使卡尔和燕妮闯进了传奇式的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打开了通往莎士比亚的道路。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燕妮逐渐焕发着爱的魅力和少女的妩媚，她开朗、风趣，生气勃勃，开始了作为贵族名门富裕人家女儿应有的生活：参加家庭舞会，看戏，听音乐会，参加俱乐部的宴会，冬天乘着马铃

叮当的雪橇去遨游，夏天随全家到风景优美的特利尔郊区去远足。燕妮被当作“特利尔的舞会皇后”，开始被大批追求者包围着。

但是，燕妮不同于她的那个阶层的大多数姑娘，她从来没有在社交的欢乐中入迷。我们今天才知道，这个17岁的少女曾和一个青年军官陆军少尉冯·帕里茨订过婚，他竭尽忠诚地向她奉承，可几个月后她就解除了婚约，她讨厌这个庸俗愚蠢的年轻人。比同她跳舞的这班青年军官和官吏更接近她的一直是暗恋她的卡尔，他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纯洁的友情。

等到卡尔17岁上波恩大学攻读法学时，他已经和青年女友存在着一种默契了。卡尔离开特利尔以后，燕妮实际上已经知道自己深深地爱上了他。她只好通过她的亲密朋友——卡尔的姐姐索菲娅，有时也会从卡尔的父母亲偶尔的评价中听到他的消息。索菲娅早就了解燕妮和卡尔的心事，只要他们需要她帮助，总是热情地伸出援助的手。

1836年夏天，卡尔回到特利尔，在父母家中过暑假。好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卡尔和燕

妮吸引在一起。卡尔向燕妮介绍波恩大学的生活和一年的见闻，又一起讨论人生的道路，他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燕妮在卡尔那坚强而令人心醉的品格的魅力中，以一个恋爱着的姑娘的微妙感觉，预料身边的恋人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于是他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了卡尔。他们订了婚。以当时的眼光，尤其是有产阶级的眼光看来，他们的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们的订婚开始只有索菲娅知道，后来卡尔离开特利尔前向父亲透露了“秘密”。他们私订终生，使卡尔父亲又惊又喜，喜的是儿子能够与燕妮这样好的姑娘结合，真是“幸运儿”；惊的是这种违背社会风俗的结合，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风波，因此非常忧虑。

卡尔不得不前往柏林大学学习，这时他的心充满了离别的痛苦，也充满了只有青年人才懂得的令人神往的爱情。一年后他给父亲写信说：

“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对我来说，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爱情的世界，而且是在憧憬的、空有希望的爱情开始之中。甚至柏林之行，也使我冷淡，它本来会引起我高度快乐，促使

我观察自然，燃起我生活情趣的，的确，它特别使我情绪不安，因为我所看见的岩石不比我心灵的感觉更峥嵘、更崎岖，广阔的城市不比我的血液更活跃，饭店的酒宴不比我身负的幻想锦囊更丰富，反而更不容易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

燕妮留在父母家中，精神上极为痛苦。由于卡尔离开了他，她以前有过的种种疑虑现在又强烈地涌上心头，而且还增添了新的疑虑。他的双亲是没有贵族偏见的，但是，燕妮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很想通过所谓缔结良缘看到她的前途能有保障。因此，燕妮有理由担心会遭到父母强烈的反对，会给他们带来许多烦恼。她还估计到，她的那些傲慢的贵族异母兄姐，特别是她的异母兄斐迪南，会想方设法破坏这门亲事。不管怎样，她仍然下定决心，为她的爱情而奋斗，坚守她对卡尔所作的诺言。然而，她毕竟束缚于她所出身的贵族市民的世界中，因此她过于受到她所陷入的外在和内心冲突的压抑。要不是她在老法律顾问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个忠实的父亲般的朋友，她会被这种冲突所压倒。她在卡尔家里找到了第二个家，这里

的一切使她感到遥远的爱人如在眼前，她还能向他倾诉衷曲。那时，她时常到马克思家去，在那里她尤其受到卡尔的父亲亲切的接待，她对他也寄以充分的信任，他立刻象他写信对儿子所说的那样，“像爱自己孩子一样爱她。”

燕妮和卡尔在他们订婚头几个月内没有通过一封信。但是卡尔却寄给她三本诗集——《爱情集》之一、《爱情集》之二和《诗歌集》——这是他在逗留柏林的头几个月内为她写作的。下面是其中的一首。

“我深深屈服于爱情。已经找到了，
我的明亮的眼睛，这内心的憧憬。
不是听凭我的意志，于是你的一盼，
而是命运的驱使，深入了我的内心。”

诗寄去后，马克思接到他的姐姐索菲娅写的几行字（这是写在他父亲信后的附言），这封信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燕妮的精神状态。

“你最近的来信，亲爱的卡尔，激起了我悲痛的眼泪；你会认为，我这样疏忽，不把你的燕妮的消息告诉你?！我连作梦都只想到你们。燕妮爱你；倘若年纪的悬殊使她忧虑的话，那是由于她的父母的缘故。现在她将尝试使他

们逐渐有所准备；然后你自己再写信给他们；你在他们那里是很受重视的。燕妮时常来看我们。昨天她还在我们这里，她接到你的诗'悲喜交集之泪'，她哭了。我们父母和姐妹们都很爱她，尤其是后者，爱她胜于所有的人，十点以前从来不让她离开我们，你称心吗？再见吧，亲爱的好卡尔，我衷心地希望你能美满地完成你的心愿。"

除了这些诗集外，燕妮还收到她朋友的另外一件礼物：从各国最美好的民歌宝藏里选出的 81 首民歌集。卡尔·马克思把它们亲笔抄写在华丽的八开本上献给他的"心爱的小燕妮。"

单是这些美丽的爱情赠礼还不能使燕妮平静，而且卡尔不是一个有耐性的恋人。燕妮的危险处境是瞒不过老亨利希·马克思的。因此，在看到姐姐的亲切的几行字之前，父亲就作了严肃的告诫：

"……你担负着重大责任……，你在诗的情操中用尽爱情的夸张和激动，并不能使你倾心的人儿恢复宁静，恰恰相反，你在冒着摧残她的危险，只有用模范行为，用男子的、坚定

的、能获得人们善待和恩遇的努力，才能有效的使关系调和，使她在他们的和社会的眼光里受到重视，从而使她得到安慰。我已经对燕妮说过：希望她能够完全平静下来。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事，但是一切不是都能用说服办法解决的。她还不知道她父母怎样对待这种关系。亲戚和社会的舆论也不是一件小事。我担心你的感觉不总是那么适当的，因此我让你对这种情况自己作一番估计……

她为你作了无可估量的牺牲——她表现的那种自我克制，只有冷静的理智才能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悲哉，如果你在你的一生中忘掉了这件事！现在只有你自己才能起作用。从你的内心必须有这样的肯定：你虽年轻，但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男子汉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应该用突击的步伐去赢得这种尊敬，还要对他的永恒和对他的未来的认真努力作出保证……"

1837年3月，卡尔·马克思在威斯特华伦家里向燕妮求婚，燕妮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燕妮病倒在床。燕妮的父亲非常看重卡尔·马克思，欣赏他的睿智、刚毅和才华，没有

任何异议就同意了。但是燕妮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强烈地反对这桩婚事，他希望妹妹能嫁到有名望的贵族家庭，以利于在他晋升的仕途中有可靠的依托。（这个名利之徒后来官至普鲁士内政大臣）最后，由于父亲的支持，弟弟埃德加尔的配合，更主要的是燕妮的坚定信念，她终于得到了同意。

“……她也有才华”，老马克思写信对他儿子说，”你可以肯定，我是肯定的（而且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一个王子也不能把她从你手中夺走。她全心全意依恋着你，这是你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以她的年华为你所作的牺牲，绝不是寻常女子所能办到的。”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马克思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24岁时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以犀利的文笔，猛烈地抨击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封建专制

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曾打算到波恩大学讲授哲学。然而，由于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使德国的封建制度愈加陷入危机之中，普鲁士

政府强烈地感觉到必须使用一切力量去镇压到处蔓延的自由民主运动。这样，封建反动势力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极其凌厉的措施镇压自由民主运动。政府开始把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当中最彻底的分子，这时已公开站出来反对普鲁士国家——一一逐出大学讲坛。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到大学任教的计划就成了问题。后来，马克思以前在“博士俱乐部”的朋友，在波恩大学任讲师的布鲁诺·鲍威尔也被逐出了大学，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深切的感受。这时马克思已完全放弃了在波恩大学占一教席的想法。

日益壮大的反封建运动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之间的斗争越来越迫切地要求马克思进入政治著作出版工作的领域，因为当时这个领域已成了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互相搏斗的最主要战场。诚然，起初他曾和布鲁诺·鲍威尔写过一些批判宗教的作品，为此还阅读了一大批艺术史和宗教史的著作，并摘要作了笔记。但日常生活的经验已愈益强烈地向他表明，用哲学领域内的批判来反对普鲁士国家是不够的。哲学家的职责就是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于

是，当从事这种斗争的机会出现时，他就满怀激情的毅然抓住了它。

1841年12月，普鲁士政府公布了新书报检查令，表面上不干涉作家的写作活动，实际上却取消了出版自由。因此，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冲突就显得特别尖锐。许多作者，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作者们纷纷起来反对这个法令。马克思也决定参加这场斗争，他用了20多天写了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寄给在德累斯顿办《德国年鉴》杂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卢格认为马克思的稿子写得很好，但由于《德国年鉴》杂志受到检查，这篇出色的稿子未能刊登。不过卢格没有把稿件退还给马克思，他打算把马克思的稿子和其他因书报检查制度未能发表的稿子汇集成册在国外出版。这当然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事情，要一年之后才能刊印出来，这样就太不及时了。而日报的检查比杂志要马虎得多，一般的稿件都比较容易在日报上发表。于是，马克思决定向日报投稿。这时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吸引了他。

《莱茵报》是一些科隆的资产者合办的报

纸，于 1842 年 1 月 1 日发行。他们打算利用这家报纸来鼓吹和维护莱茵省工商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后来，由于莱茵省大资产阶级中有些人想同青年黑格尔派拉关系并表示同情，就吸收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些居于领导地位的代表人物参加报纸的筹办和领导工作。马克思从 1842 年夏天起，也开始为这家报纸写稿。这样一来，莱茵省大资产阶级的各种纯属经济方面的问题反倒逐渐退到次要的地位了，这家报纸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在报纸上刊登的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文章越来越多。

马克思的文章文笔犀利有力，思想敏锐，论据充分，总是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必须把哲学同政治现实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摒弃那种抽象的、假激进主义的批判。他在同年 8 月写给该报出报人的一封信中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由于马克思的文章实际已领导了该报的风格、面貌，因此，从 1842 年 10 月起，他被聘任为该报的主编。

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之后，该报变成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刊。它越来越受

更多的读者欢迎，报纸在1842年10月中旬有订户885人，四周之后长期订户就增至1800人，过了八周又增至3400人。这些读者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遍布全国各地。除担任编辑工作之外，马克思还为报纸写了许多文章，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论离婚法草案》、《〈莱比锡总汇报〉的被查封》、《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等，不断地揭露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专制行为，站在劳苦人民一边，竭力维护那些受压迫、受剥削贫苦群众的利益。

马克思为了坚持自己的办报方针，同各种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首先是反对"自由人"的斗争，其次就是和政府的迫害作斗争，最后还设法解除股东们的怨言。

所谓"自由人"，指的是马克思以前参加过的那个柏林"博士俱乐部"里的某些成员，布鲁诺·鲍威尔也是其中一员，他们聚集成一个小团体，汇集了一些自我吹嘘的疯疯癫癫的文人，他们打算把《莱茵报》变成他们空谈议论的传声筒。当他们寄来一大堆毫无意义、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写得极其草率的文章时，马克思毫不客气地加以淘汰。马克思为了把"自

由人”引向正道，多次写信给“自由人”的代表梅因，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谈，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但是这些“自由人”却不听劝告，反而给马克思寄了一些极其粗暴的信。最后，为了不牺牲从事进步出版事业的报刊，马克思只好同他们决裂，并拒绝刊登他们的一切文章。

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革命趋向越来越惊恐，于是加紧了对该报的审查和迫害，马克思几乎每天必须同科隆的普鲁士检查官周旋。尽管政府不断调换检查官，以增强对《莱茵报》审查的能力，事实证明，马克思在同这些普鲁士进行无休止的令人疲劳的小战斗中，总是优胜的一方。

几十年后，马克思还带着会心的微笑谈及他当时是如何捉弄检查官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当时必须连夜把清样送交检查官，以便报纸可以在第二天出版。检查官用红铅笔东勾西划之后，常常给印刷厂带来十分费时的夜班工作。一天晚上，检查官正要带着妻子和几

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去参加省督邀赴的大舞会。但在赴会之前，他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书报检查工作。可是恰好在这天晚上，清样没有在通常的时间内送来。检查官等了又等，因为他不敢玩忽职守；但又必须在省督面前露露面，好让别人见见自己的这几个女儿。差不多十点钟了，检查官非常烦躁，于是他就打发妻子和女儿先去省督那里，同时派仆人到印刷厂去取样。仆人回来报告说，印刷厂已经关门了。检查官大感失望之余，驱车前往距离很远的马克思寓所。这时已近11点钟。

经过长时间的敲门之后，才见马克思在三楼的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

‘清样！’检查官向上大声吼叫说。

‘没有！’马克思朝下呼喊。

‘啊！！’……

‘我们明天不出报了！’

马克思砰然把窗户关上。”

马克思主编的报刊文章像鞭子一样狠狠抽打着政府当局，政府只得以禁止出版相威胁，要求报纸改变反政府趋向。胆小怕事的股东为了不使自己的财产受影响，要求马克思用

降低报纸的政治调子来保存《莱茵报》的生命。然而马克思却不愿向政府屈膝投降。但股东的态度也使马克思辞去编辑职务。1843 年 3 月 18 日，该报登出了如下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1843 年 3 月 17 日于科隆。"

在 3 月 17 日，马克思排完的最后一份《莱茵报》上，醒目处画着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上忍受巨鹰噬心的痛苦的插图，表明马克思决心承担一切人间疾苦来为人民群众争取自由平等的坚强意志，正如马克思在大学毕业时博士论文中，以普罗米修斯这个"哲学历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精神自勉那样，用自己的坚定信念回答了现实中的"众神的侍者赫耳墨斯"：

"你要知道，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
去换取奴隶般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这位来自特利尔的普罗米修斯，在主编《莱茵报》的活动中，得到了锤炼他已开始认

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起何等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后来证实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向他谈过："正是对林木盗窃法的研究和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关系，从而研究社会主义。"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写道："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发奋研究这门科学。"通过办报还使他认识到了在为无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以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哲学上和政治上的武器是完全不够的。

马克思早在1839年便开始接触伟大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著作了，他深深地被这位哲人的思想所吸引：原来费尔巴哈在著作中不仅尖锐地批判了封建阶级在宗教方面的意识形态，也不仅对黑格尔哲学的个别方面作了批判性的发展，而且指出了：任何宗教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全部内容都是同世界的真实本质，同人的尊严不能相容，因此必须加以扬弃，由哲学上唯物主义取而代之。费尔巴哈宣告说：世界和人的存在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什么

“绝对观念”，二者是“由于自己本身并通过自己本身而成为必然的”，并且是“可以感觉到的，物质的”。人的存在只能归功于自然界，并且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自然界、存在是第一性的，并且不依赖于人和人的知觉而存在。在自然界和人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上帝。宗教是人的产物，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形象，即人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以后在办报期间，马克思更多地研究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他开始已洞察出费尔巴哈学说的一些弱点了。费尔巴哈只是从生物方面的性质，而没有从社会方面的性质去理解人，这就妨碍了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马克思的这些见解，也是随着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后才逐步臻于成熟的。

马克思在辞去《莱茵报》主编以前，便已经同阿尔诺德·卢格在通信中讨论在国外出版一个革命机关报的问题。1843年5月底，马克思曾到德累斯顿去了几天，看望了卢格，马克思与卢格商量决定：等马克思结婚后一起到巴黎办一份刊物，作为同反动专制制度斗争的

武器。

马克思与燕妮私订终身后，面临着社会、家庭、感情上的斗争煎熬。投身政治生活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富裕，他们的婚姻一拖再拖。经过坎坷缠绵的七年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订婚后，马克思仍是柏林大学的学生，未婚妻燕妮只好等待着马克思。

在马克思的熏陶之下，燕妮开始热心地阅读报纸与新书，讨论政治问题。马克思给她介绍书，使她认识进步德国的思想问题和斗争。他的每一封信都给她新的动力。他的有限的来访是她生活的高峰。她渴望同朋友保持内在的联系，她力求追随他的思想道路。她开始钻研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为了能在古代希腊哲学道路上跟上马克思，她甚至学习希腊文。在同马克思内在联系逐渐加深时，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他的才华和追求。

但是，在她的爱情中也投下过阴影。当马克思逐渐在首都思想界杰出人物中成为赞扬的中心，当他出入于象贝梯娜·冯·亚尔尼姆和瓦恩哈根那样柏林有名的沙龙时，她想，他对她能够长期保持18岁的青年所有的同样的感情吗？他对已经超过了她们阶级的女儿通常结婚年龄的她能够保持不变吗？她对她朋友的爱情能否坚持下去产生疑虑，而这些疑虑一定会被不怀好意的亲友们滋长着，使燕妮非常苦恼。这还使她在和陌生男子说话时轻松活泼，而在爱人的面前忸怩不安，正如她自己曾向马克思所承认的那样。马克思曾因她的拘束的、又像是冷淡的态度而责怪她，于是她写信对马克思说：

"……我一开始就知道，还在人们如此冷静地、聪明地、理智地向我分析之前，我就深深地感觉到，我不能得到你现在令人心醉的青春之爱。呵，卡尔！其中正好有我的苦恼。凡是以无以名状的快乐使任何另外的姑娘得到满足的东西，你的美好的动人的热烈的爱，你的无法形容的外形，你的令我鼓舞的理想，总之，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不安，甚至时常给我

带来失望。我越是耽于幸福，如果你的热情火焰一旦熄灭，你变得冷漠而彷徨，我的命运越是可怕……瞧，卡尔，因此我对你的爱情不那么十分感激，不那么感到十分幸福，像它实际上应该得到的那样；因此我时常提醒你注意外在事物，注意生活，注意实际，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要我完全沉溺于爱的世界，在爱的世界中忘掉其他一切……我的整个生命和存在是对你的相思。”

在同一封信里她对他说，她偶尔曾有过这种想法，如果他失去一只手，她就能对他有用，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人，这时她就可以写下他的思想，还“照顾其他事情”。其实，她料想不到，虽然马克思幸运地保存了双手，她仍然写下了他的许多思想。

1841 年，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并把博士论文献给他的岳父。燕妮的父亲接受了这个献礼。燕妮对于这篇博士论文一定感到吃惊，因为她的爱人承认无神论，而她还是信奉宗教的。……“我多次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祈求上帝赐福于你。”这是她在稍后一点时间写给他的。

不管怎样，她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卡尔在耶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他终于要回到莱茵地区，象他俩衷心所希望的那样，很快结婚。卡尔·马克思以为，在波恩大学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可以帮助他在那里谋得一个教席。但是，这个希望破灭了，因为普鲁士封建反动势力把进步讲师从大学里赶走，其中包括布鲁诺·鲍威尔。这对两个恋人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经过四年之久的期待，现在又面临这个令人忧虑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后来，马克思经过艰苦斗争认识到，单凭哲学斗争是不会使世界得到改善的，于是进入了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相互搏斗的最主要战场——政治著作出版工作领域，并通过写稿取得收入，这又使他们结婚成为可能。然而，事情还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燕妮多么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啊。当马克思在科隆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中，燕妮虽因病卧床休养，却以全身心的爱支持卡尔的政治斗争。她写信给恋人道：

“亲爱的小黑蛮子，我多么快乐呀，因为你高兴，因为我的信使你快活，因为你在渴望

我，因为你住在有裱糊的房间里，因为你在科隆喝了香槟，因为那儿有黑格尔俱乐部，因为你作了梦，因为你……总之，因为你是我的，我的爱人，我的小黑蛮子。

……呵，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现在你完全投身于政治中去了，政治是最性命交关的事。亲爱的卡尔，你永远不要忘记，家里还有你一个小爱人，她在盼望着，痛苦着，她同你完全命运相连……”

卡尔回到莱茵地区以后，燕妮比以前更坚强地参与他的生活，这对燕妮来说已经是够多的了。他会变心的恐惧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宁静而坦然的信任和无保留的爱和献身，这些决定着她的整个存在。她曾向他描绘了傍晚她在莱茵河畔散步时的感受：

“天赐的美丽夜晚。天上繁星点点，预告一个晴朗的明天。爱情的星光在天空闪烁。我觉得，它只为我悬挂在高空，为我照亮归途，把欢乐和宁静照在我心头，为我的爱情祝贺。我多么想念你啊！想念我的爱情……卡尔呵，卡尔，我多么爱你！今天我觉得浑身无力，几乎不能写信，我心中的一切，想的一切，过去、

现在、将来的一切，只有一个音调，一个符号，一个声响，那就是，我无以名状地爱你，没有界限，没有时间，没有范围……”

卡尔以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和普鲁士封建反动势力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他也常常回特利尔。他的未婚妻早已深入了他的精神世界，每当他在报刊上发表时论，燕妮总是以兴奋的心情读着未婚夫的论文，并为他不断增长的声望感到骄傲。在她的心中，已燃起炽热的火焰，以至她家里人尽量避免她同观点不同的人，尤其同她的异母兄斐迪南及其家属在一起。

然而，燕妮个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842 年 3 月 3 日，她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去世了。他的死在燕妮生活中划开了一大缺口。马克思和她悲痛异常。他的岳父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是在特利尔度过的，他以温柔体贴的爱支持着燕妮。

威斯特华伦死后家庭收入受到限制，这时，家里围绕着燕妮订婚问题又发生了争吵。特别是燕妮的异母兄斐迪南对他妹妹施加强硬的压力。他对马克思一向怀有恶意，由于马

克思成为民主阵营的有名领袖，恶意更变成不留情面的敌意。卡尔的未婚妻同母亲的关系也不融洽，罕丽达·马克思自从丈夫死后有不少烦恼，她不富有，她除卡尔外，还有七个儿女，其中三个经常有点小病，所以她只希望马克思能找"赚钱"的职业。但当马克思从事革命斗争而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宽裕时，就对马克思抱怨很深，甚至对燕妮也横加指责，认为她没有把未婚夫引上"正途"。母亲还扣下了卡尔应得的一份父亲遗产，致使卡尔与燕妮的婚姻一再推迟。所以，后来马克思列举了他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时说："余下的时间都浪费在最不愉快的家庭纠纷上了，"直到马克思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应得的一份父亲遗产。

父亲死后，燕妮和母亲迁居克罗茨纳赫。在这里，她除了曾与未婚夫有过少数的几次短暂相聚之外，就只能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她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堂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和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

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

幸福时刻终于到来了。经过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当中，燕妮忠贞不渝，坚定地等待着马克思，并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了十分折磨人的斗争。1843 年 6 月 19 日，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在克罗茨纳赫举行了婚礼。仪式相当简朴，这正和这年轻夫妇的观点相符。除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外，双方家庭再没有人参加。证婚人是克罗茨纳赫的四个公民。新婚之后，他们就到爱贝尔堡、普法尔茨、巴登—巴登等地度蜜月，所到之处，人们都用十分羡慕的眼光看着这对幸福的伴侣。从此，他们终于完成的积蓄多年的夙愿，而燕妮，正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仅分担了她丈夫的命运、劳苦和斗争，而且以最充分的了解和最炽烈的热情参与进去。”

第三章　巨人携手
共创伟业

马克思拒绝了普鲁士当局的收买诱惑，带领全家来到了革命历史名城——巴黎，在这里研究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并和革命的工人团体建立了联系，而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得到了一位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

蜜月旅行后的最初几个月，新婚夫妇暂时回克罗茨纳赫，住在燕妮母亲的家里。在这几个月里，他们没有沉迷于青年男女的儿女私情中，而是开始了艰苦的工作。

燕妮受到马克思的影响，积极学习，她的才能在同马克思共同生活中得以充分发挥。她

的天才的丈夫为她打开了她至今还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的大门。她深入了解黑格尔辩证法，钻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本质》。这样，在不久以来还是信奉宗教的她，开始树立起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如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写信对路德希·费尔巴哈所说的："我的妻子作为不相识的人向您问好，您不会相信，您在女性中有这么多信徒。燕妮就是这样获得了基础科学知识，这使她以后能够理解丈夫的学说，并积极同他参加斗争。

马克思则认真思考了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的实践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联系实际重新研究理论问题，特别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

这一时期，马克思着重批判性地分析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第261——313节，写了39印张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同时觉得仅仅利用德国哲学和实际经济研究这一理论是不够的。于是，他紧接着对英、法、德、美、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历史和国家理论学说进行了广泛研究，阅读了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亚弗利，法国启蒙

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反动浪漫主义理论家沙多勃利昂和尤斯图斯，麦尔以及一些其他人的著作，从24本著作中摘抄了五本笔记，这就是著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马克思考察了2500年以前各种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研究历史方面获得的知识，对他批判黑格尔学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为他提供了新的经验论证，而且促使他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所研究问题的本质。

这期间，马克思还一直同阿尔诺德·卢格通信联系讨论出版《德法年鉴》杂志问题。1843年8月，讨论终于结束了，9月2日卢格来信说，巴黎已经提供了出版杂志的可能性，他给马克思500至600塔勒年俸，保证他可以在巴黎过着虽然简单，但还平稳的生活。马克思则制定了这个杂志的路线和纲领，认为杂志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反动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怎样才算无情呢？马克思特别作了解释："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

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在异国他乡，这样的生活基础是不可靠的，而且燕妮正在等待她的第一个孩子出世。然而，这个年轻的妻子勇敢地、满怀信心地同意了。

他们除了接到卢格的聘请外，还接到了另外的聘请。普鲁士政府试图争取马克思这个人才为政府服务——这是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使这个可怕的敌人因此而不足为患。政府通过马克思父亲的一个朋友，枢密官艾塞尔，向卡尔·马克思招聘，为他提供一个“肥缺”，保证他在普鲁士仕途飞黄腾达。但是马克思和燕妮不为名利和地位所诱惑，1843 年 10 月底，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巴黎的征途。

卡尔和燕妮在塞纳河左岸市区的田凫路 38 号找到了一个简朴的住处。阿尔诺德·卢格于 8 月初到达巴黎，在同一所楼房下榻。还有一个流亡在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赫尔曼·莫伊勒也住在这里。莫伊勒很早以前就在巴黎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后来，马克思在他的帮助下同工人们建立了联系。

自从 1789 年以来，法国一直是历次政治革命的发源地。革命家们常常住在法国，他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国，把希望寄托于法国。这样一来，就使得巴黎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民主派汇集的地方。

巴黎的确给马克思带来了强有力的感受。在法国，他面对着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奏凯歌，正如在他们之前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胜利一样，它以飞快的速度扩展自己的经济力量。促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业革命，在 19 世纪上半期也达到了高潮。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先驱地，是空想共产主义的故乡，是各种思想激烈斗争的中心。

马克思迫切希望熟悉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包括它的进步之处和各种矛盾，也包括它的贫困和孕育着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的萌芽。虽然资本主义时代刚刚在英法两国有了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轮廓，但毫无疑问，整个欧洲将进入这个时代一事已经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马克思研究这一世界历史进程，运用取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

同时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认识，而最主要的是将自己的哲学见解，拿到实践中进行检验。

马克思要求《德法年鉴》“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也的确这样做了。他还竭力向被压迫的人们指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斗争”。

由于卢格患病，《德法年鉴》实际上是马克思一人主编。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这是第一、二期的合刊号，载有马克思撰写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鲍威尔曾经从唯心主义立场解答了在德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他认为出路是把犹太人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毫无根据。指出鲍威尔错误地把人为的解放同政治压迫混为一谈了。犹太人的解放首先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人类要摆脱宗教的桎梏，只有私有制被废除后才有可能。这样，他就把政治压迫跟人类解放两者区别开来。所谓人类解放实质上已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

初步设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论述了另一个论点——先进理论的革命化意义及其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的作用。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此外，马克思在文中，既公开申言信奉唯物主义，又与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划清了界线，他把唯物主义思想不仅贯穿于"自然"领域，而且应用于"政治"领域。

由于马克思在两文中把阶级斗争看作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强调它的这一重要意义，从而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就成功地获得这样的见解：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能力摧毁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经济基础——私有制，并通过摧毁这一切实现社会革命。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的论文表明：在哲学思想上，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已经结束；在政治思想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时期也走到终局。这些论文标志着一个新时期已经开

始，马克思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逐步发展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科学共产主义。

《德法年鉴》还刊登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海涅的诗；《一八四三年起的通信》；还载有在筹备刊物期间马克思给卢格的几封信；还有卢格本人、俄国流亡者巴枯宁以及费尔巴哈的信。

《德法年鉴》刚刚出版，创刊号却成了最后一号。停刊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被具有强烈感染力的革命思想的刊物吓慌了手脚的普鲁士政府，严禁它在德国发行。当听说《德法年鉴》已经在巴黎出版，普鲁士政府立即通令各省省长，说《德法年鉴》犯了“预谋叛国和侮辱陛下”的罪行，应严守国境线，采取各种手段阻止这个危险刊物偷运德国。同时还授意各省省长命令警察机关，在马克思、卢格、海涅等人一跨进普鲁士国境时就不事声张地加以逮捕，并且没收他们的证件。于是，普鲁士反动势力气势汹汹如临大敌地把守着国境。在莱茵河上的一艘汽船上搜出了100本

《德法年鉴》，在法国和普法尔茨边界上的贝尔格萨本没收的《德法年鉴》大大超过了200本。这些措施对刊物发行量还很小，经费相当困难的《德法年鉴》来说，无疑是重重的当头一棒。其二是：杂志的两位主编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卢格不同意马克思诉诸群众、诉诸工人阶级的做法。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再能够跟上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前进步伐，马克思思想的种种结论使他惊惧，倒退了下来，竟拒绝承担他原先答应拿出资金的义务。由于卢格的临阵脱逃，刊物继续出版就毫无希望了。

当时马克思身上几乎已是不名一文，因此，在巴黎的家庭失去了生活基础，而燕妮就要临产了。卢格却用若干份《德法年鉴》代替现钱支付马克思薪金。

但这对年轻夫妇并不是孤立的：莱茵省方面的朋友，那些《莱茵报》时期的战友，纷纷伸出友谊之手，帮助他们两人摆脱这种窘迫的困境。他们在三个月中寄来了1000塔勒，随后为了补偿被没收的一百本《德法年鉴》，又汇来800法郎。于是马克思得以暂时解除了最使人为难的忧虑。

1844年5月1日，燕妮生下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孩，他们给她起名叫燕妮。小女儿的诞生，对马克思、燕妮来说，是生活迄今他们爱情的加冕礼。

马克思刚刚卸下即便不是出于自愿的编辑职责，立刻就投身于新的撰写政论著作的计划。他打算以法国作为典型的例子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写出一本论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阅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浩翰著作。他看到他们当中思想最敏锐的人已经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并对此有所论述，——也就是说，他发现自己的见解得到了证实。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什么原因制约着各个阶级的产生，促进或阻碍它们的发展并最终又使它们毁灭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影响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将导向什么目的呢？对于这些问题，他从法国历史学家那里得不到任何解答。

马克思继续进行探索。他深入研究经济学，首先致力于研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两个最重要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

著作。绝不放过任何未加检验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的工作作风。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检查了这些经济学家的每一个命题，并把这些命题拿来同他所得到的一切有关英法两国新近经济发展的资料进行比较。

结果在1844年春天写出了一部内容广博的手稿，虽然还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这部手稿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才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题于1932年出版。

当然，身在空想共产主义的故乡，马克思还系统地研究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英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等人的著作。在扬弃他们的思想中，开始形成了他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雏型。

为了深入了解工人阶级，马克思还走到工人当中去。通过他的邻居莫伊勒结识了许多工人团体的领袖。其中，马克思和流亡法国的德国工人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建立了更亲密的联系。

但马克思没有加入当时的任何一个团体，因为他并不同意在这些团体当中流行的关于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见解。可他总是设法做到同工人们经常交谈，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他们阐释自己对无产阶级所负使命的看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工人们学习。他曾写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完全不同，“人类的兄弟情谊在他们中间不是词句，而是真实，而且人类的高贵从那被劳动锻炼得到刚强的形象中向我们发出光辉来”。同工人们的这些接触不仅使他获得丰富的宝贵经验，而且使他更加确信有必要进行斗争，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对工人阶级所拥有的力量和高贵品质的信心。

在寓居巴黎的日子里，亨利希·海涅是马克思家中最亲密的常客之一。他早在1831年就因受书报检查官和警察机关的迫害，从德国不得不逃亡国外。马克思同这位伟大的诗人有着真挚的友谊。卡尔和燕妮在美学方面的素养和对文学的卓越判断力，无疑有助于增进彼此的浓厚友情。正如海涅所说，他们之间只须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互相了解。海涅几乎天天去看望这对年轻夫妇，还向他们朗诵自己的诗篇，有时他们坐在一起花上许多小时，逐字逐句地讨论和推敲一首小诗。海涅同马克思夫妇

发生个人接触的时期，正是这位诗人的创作最成熟、最进步的时期。在此时期，他写了针对普鲁士政府和巴略威政府的政治讽刺诗和他的《织工歌》。还写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这著作中，以纯朴的民族自豪感、处处击中要害的讽刺和真挚的感情，宣告向德国的封建状况进行无情的斗争，并预言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来临，那时压迫与贫困永远从德国人民的生活中消失。诗中写道：

“啊，朋友们，我要为你们创作一首
新的歌，更美好的歌；
我们要在地上，
建起天国。”

《德法年鉴》停刊之后，马克思寻找报刊发表自己的文章，向普鲁士德国的反动势力展开公开的批判斗争，他终于以巴黎的《前进报》这家由德国的民主派流亡者出版的刊物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卢格、恩格斯和艾韦贝克，海涅和海尔维格，以及从1844年8月起还有马克思，都给这家尽管发行量不大但却未受检查官骚扰的激进民主派报纸撰稿。

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批判卢格的文章，导致他与卢格在政治上的决裂。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卢格呢？原因不在于他与卢格没有能够把《德法年鉴》办下去，而在于卢格转向工人运动的对立面。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发生了纺织工人起义。这次起义引起了全德工人的响应。统治阶级惊恐万状，调来大批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卢格在《前进报》上以"普鲁士人"的笔名发表《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说西里西亚工人的起义是缺乏"政治精神"的、"毫无意义"和"徒劳无益"的暴动，并说解决社会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群众的使命，而是政府、国家、王朝的使命。马克思对卢格的胡言乱语不能不加以公开批判。于是他写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在《前进报》上发表。马克思与卢格相反，他强调了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巨大意义，指出工人起义标志着德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工人阶级懂得了自己和私有制的对立，称赞这次起义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发动。马克思批判了卢格所谓的依靠现存国家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革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

义不通过革命是不能实现的。

马克思除了为《前进报》写稿之外，还参加了该报的一些编辑工作。于是“前进报”就非常猛烈地攻击柏林的“基督教德意志的蠢材”，而且在“侮辱圣上”方面也无所顾忌。诗人海涅更是对准了柏林城堡里的“新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射出一支又一支火箭。这些文章惹恼了普鲁士反动势力，普鲁士政府要求法国对《前进报》采取暴力行动。法国政府最后听从了普鲁士的要求，以《前进报》未交保证金为理由，判处责任编辑二个月的监禁和300法郎的罚金。但是，《前进报》马上宣布它为月刊，而月刊是不需要交保证金的。普鲁士政府不满足对《前进报》已经采取的处罚，坚决要求法国政府把《前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驱逐出巴黎。经过长时间的交涉，法国大臣于1845年1月16日下令驱逐马克思和其他几个人出法国。这其中包括卢格，但他却立即奔走在萨克森公使和法国议员门前，向他们证明他是怎样忠诚的一个公民，并且向普鲁士政府呈交了一份悔过书。马克思鄙视卢格的无耻行为，不屈服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决定迁居到布鲁塞

尔。

马克思流寓巴黎的时间不过一年多一点，但这是他修业和流浪生涯的最重要时期。在这一年多中他获得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位战友，为了完成他毕生的伟大事业，他越来越感到需要这位战友。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有产者家庭。高中没毕业，父亲就逼他弃学从商，但在经商的过程中，他却给自己开辟了一条走向革命的道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市。父亲是纺织厂的老板，是个性情暴躁、虔信宗教和独断专横的人。母亲爱莉莎，受过教育，心地和蔼，但性格比较软弱。一家人在恩格斯父亲——这个资本家暴君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恩格斯是家里的大儿子，父亲对他管得特别严，一定要他“规规矩矩”，虔信上帝，不然就要严加训斥。但从小就聪明机智、热爱自

由的恩格斯，不愿受任何束缚，所以常常受气挨骂。不过，父亲的严格管教和严厉训斥都不能使年幼的恩格斯盲从。

恩格斯的故乡是当时普鲁士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巴门和爱北斐特（两市之间只用一座桥沟通）所在的乌培河谷一带，不仅是宗教迷信的中心，也是工业发展的中心。在那里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机器，开设了一些煤矿和纺织工厂。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乌培河谷一带，工人们的劳动条件极差，他们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大量的煤烟和灰尘。纺织工人弯腰屈背地在纺织机旁劳动，炎热的火炉整天烤着他们的脊背。工人们没有象样的住所，大多数人住的是干草棚和马厩，天蒙蒙亮就从那里爬出来，到天黑又爬进去。但是他们得到的工钱只能勉强糊口，很难养活一家人。他们劳动出的大部分财富都被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剥削去了。

恩格斯从小就看到了劳动人民苦难和贫困的情景，他亲眼目睹着资本家怎样靠剥削工人而发财；资本家残酷地压榨工人，却要工人

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他们星期天悠闲自在地到教堂去做礼拜，可是在自己的工厂里却不顾工人们的死活；工人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资本家却花天酒地、奢侈浪费。

恩格斯很小就在巴门市立学校读书，他十分聪颖，异常勤奋。到十四岁时，他被转到爱北斐特理科中学学习。但学校里宗教气氛很浓厚，大部分教员都虔信宗教，认为不信教是一种罪恶，甚至把一些不信教的人看作是"下流的、不道德的人"。有一个学生一次问老师："歌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老师带着轻蔑的口气回答说："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恩格斯对于这种不自由的环境非常厌恶，把这样的学校叫作"监狱"。

恩格斯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他非常努力，喜欢自然科学，在中学时已经掌握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在学习课余，还看了许多进步书籍，而且不但自己看，还偷偷借给同学看。

父亲看到恩格斯这种放任自由而不愿束缚的性格非常担心。有一次，他给恩格斯的母

亲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上星期弗里德里希的学习成绩不好。你知道，他在表面上看来已经规矩了些，但是过去的一切严厉的惩罚显然都不能使他感到害怕而变得完全听话。今天他又使我为他担忧：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一本肮脏的书，这是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关于十三世纪骑士故事的小说……我还发现他有些意志薄弱和思想浮泛，这使我深为不安。"

恩格斯打算中学毕业以后再上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学和法学。可是1837年父亲和叔叔分了家，又在巴门开设了一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公司，专门经营小百货贸易，有时也兼带生产一些产品。这一年，父亲又在英国曼彻斯特与德国企业家彼得·欧门合伙建立了欧门——恩格斯棉纱公司。父亲一人经营这么多的企业，显然忙不过来，于是就把子女安排到自己的企业里工作。他打算让头脑灵活的恩格斯以后成为他的继承人，主持几家公司，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让还差九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恩格斯退学，把他安插到自己在巴门的事务所当练习生。恩格斯十分怨愤，甚至有些痛恨，但是没有办法，只得在父亲的压力下去做商业

工作。这时他才17岁。

第二年夏天，恩格斯根据父亲的决定，到不来梅一家巨大的商业公司实习经商。不来梅是个大港口，同世界各地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恩格斯离开巴门从狭窄的家庭圈子走上了广阔的社会，感到非常高兴。

事务商业公司的工作丝毫不能使这位年轻人感到满意。但他还是真心实意地认真学习经商，并且日后成为一个精通业务的商人。恩格斯在不来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外国书籍和报刊杂志。他在语言方面很有才能，早在青年时期就接连学习了好几种欧洲语言，而在不来梅是他提高语言能力的重要时期。由于不来梅是个自由市，这里可以买到瑞士、法国出版的一些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在普鲁士是被禁止的。恩格斯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广泛地阅读“禁书”。他还把这些书寄给巴门的同学和朋友。有一次他写信给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成了输送普鲁士‘禁书’的专门推销员，这种被严加禁止的东西，正在我手头准备送到巴门去。”

那时候，恩格斯正是一个活泼健壮的青

年，他很会骑马，也很会游泳，能够横渡宽阔的威悉河四个来回。

年轻的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当时正在扩展到整个欧洲的反封建运动地斗争。但逐步认识到只有坚决地站在人民和革命一边，才能为进步事业服务，才能为德意志民族久已渴望得到的自由服务。

当恩格斯日益坚定地确立其民主主义观点时，这种观点和自己过去所受的宗教教育发生越来越强烈的矛盾。这位18岁的青年同宗教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搏斗。他写信给巴门时的一个同学说："我每日几乎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怀疑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我仍然不能信奉你们的那种信仰。……我到处探求真理，凡是有希望找到真理影子的地方我都探索过了；但我仍然不能把你们的真理承认为永恒的真理"。经历了艰巨的内心斗争之后，他终于摆脱了"旧信仰的负担"，战胜了宗教，并以坚定不移和公开表明自己观点的态度——这正是他的特色——从宗教转向哲学，转向科学。

恩格斯开始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讨论政

治。他认为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所顾忌地行动起来，有所作为。他痛恨遇到困难和逆流就躲避退让的作风。他渴望着有一天国王的“宫殿的玻璃被革命的投石击碎。”

正是以这样一种精神，恩格斯开始挥笔投入反封建的斗争。他写了大量的诗篇和文章，热情为人民的言论自由及其他权利辩护，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主义的祖国。在《乌培河谷来信》一文（发表于1839年3月的《德意志电讯》杂志）中揭露了隐藏在故乡绮丽风光背后的社会贫困和思想空虚。他愤怒地痛斥有产阶级的残酷卑鄙，指出：“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佣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佣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有一次，为了表示自己对封建统治者及其血腥暴行的无比愤慨，恩格斯写信给友人痛骂普鲁士国王：“我痛恨他，……我对他恨之入骨。假如我对这个坏蛋不是蔑视到如此地步的话，那

末我对他的憎恨将会更甚。”

恩格斯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已明确表示：对于任何企图通过扩散反动与非科学的思想来妨碍德国进步的一切精神势力，他将采取毫不调和的敌对态度。他的座右铭是：“凡是科学所拒绝的东西，……也不应再在生活中存在。”

他还怀着极大的兴趣去研究哲学，正如他所说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灵魂”。他信奉黑格尔，认为在同一切反对进步的人物和言论进行斗争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锐利的武器。他站到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边，为德国古典哲学深感自豪。

年轻的恩格斯向往自由，渴望获得解放。他写了一首诗，满怀热情地想冲破周围环境的束缚，希望象一股汹涌的洪流那样，给自己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他写道：

“一股汹涌的洪流，
呼啸着独自奔出山谷，
松树在它面前轰然倒下，
它就这样给自己冲开一条大道；
我也将和这股山洪一样，

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恩格斯在不来梅大约呆了三年，1841 年 3 月回到巴门。恩格斯回来后，感到故乡还是那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使他非常苦闷。他不愿意顺从父亲的意志去当一个商人，但是以后到底怎么办呢？

就在这种非常苦闷的情况下，恩格斯决定到柏林去服兵役。普鲁士国家当时规定，每个青年都要以“志愿兵”身分服兵役一年，但服役的地点可以自己选择。本来像恩格斯这样有钱家庭的子弟，花些钱就可以免服兵股。但是，恩格斯希望利用在军队里服役的空余时间继续学习。而在柏林服兵役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因为那里有全国闻名的柏林大学。

1841 年 9 月，恩格斯到了柏林，作为志愿兵加入炮兵旅。炮兵旅的兵营就在柏林大学附近的广场上。

恩格斯在服役期间，认真学习军事，很快就成了一名炮手。但是这个炮手不是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而是专门向反动制度“开炮”的。

恩格斯利用空余时间到柏林大学去旁听。由于他很喜爱哲学，他经常听老哲学家谢林讲

授《启示哲学》，并尽力研究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这时他已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对谢林的哲学很反感，认为“启示哲学”是完全违反科学的，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来缚人们的自由思想，让人们盲目地为专制制度服务。恩格斯把这种“满足普鲁士国王的需要”的哲学叫作“基督教的哲学”，并加以批判，他拿起笔作刀枪，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谢林的唯心主义反动思想。他起先在一个杂志上用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了论文《谢林论黑格尔》，后来又出版了两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一本叫《谢林和启示》，另一本叫《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在《谢林和启示》的结尾，恩格斯发出了热情的战斗号召：“我们将斗争和流血，我们将无畏地直视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旗帜在山顶飘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同志们的刀剑在闪烁，钢盔在发光？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逼近，他们从平原奔向我们，他们在歌声和乐声中走下山岗。伟大的决定性的日子，各民族战斗的日子已日益临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一年期满，1842年10月又回到了巴门。可是没呆多久，父亲逼他到英国曼彻斯特去，在他父亲与人合伙开办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厂里经商。父亲不但希望儿子提高经商的本领，而且想让他赶快离开革命前夜的德国，因为当时他的革命思想在家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1842年11月底，一个浓雾弥漫的日子，恩格斯乘船沿着泰晤士河到了英国首都伦敦，又从伦敦乘火车到了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摇篮，当时是一个4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非常尖锐，贫富差别十分明显。工人都住在一些阴暗狭窄的小巷里，中等阶级的住宅是在宽广笔直的大街上，而一些大资产阶级则住在郊外新建的大厦或者奢侈的别墅里。恩格斯在英国亲眼看到，工业区的主要街道上到处站着饥饿的工人，失业者成群结队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人请求帮助，情况十分悲惨。

恩格斯到英国的时候，工人运动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高潮。工人们不愿忍受资本家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组织了工会，经常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当时英国还正在开展着一个宪章运动。参加这个全国性运动的有好几百万人，其中主要是工人。他们提出了一个“人民大宪章”要求议会通过后实行，好让工人得到选举权，可以把工人的代表也选进议会里去，来保障工人们的权利。

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使恩格斯的心情非常激动。他白天在公司里办公，晚上就去参加宪章派的集会，同他们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公司里的事情他根本不感兴趣。只要一有空，就去找工人聊天。他同工人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呆在办公室里的时间还多。在晚上或者星期天，他经常到工人家里去，详细考察工人们的生活情况和劳动条件。正像他自己后来亲切地对工人们说的：“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

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那时候，有位爱尔兰青年女纺织工经常陪着恩格斯到工厂里去访问。她就是1845年4月同恩格斯结婚的玛丽·白恩士。她比恩格斯小一岁，性格爽朗，精神焕发，吸引了恩格斯的注意力。工厂里的沉重劳动未能使她热情稍减。她那纯朴大方的举止、永不衰退的毅力、活泼的姿态以及她的“野蔷薇”般的美丽和“乌亮勇敢的目光”都使恩格斯倾心不已。和玛丽在一起，恩格斯享受了无限的快乐。恩格斯和玛丽经常一起参加工人们的社交集合，星期天到曼彻斯特的“共产主义大厅”参加晚会，“晚会上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身分，坐在一起吃便饭——茶和奶油面包；平时大厅里经常举行舞会和音乐会，人们在那里玩很高兴。”

在曼彻斯特的工厂里，恩格斯亲眼看到工人们在阴暗潮湿的车间里，弯腰屈背地在机器旁工作，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些童工和女工被繁重的劳动折磨得矮小瘦弱，发育不良。在机器上干活还经常发生事故，有的工人整个手指、整只手、甚至整只胳膊被机器的轮子卡住而轧碎了。恩格斯看到许多畸形者和

残废者，就像战争时期所在伤兵营见到的一样。可是那些肥头大耳、脑满肠肥的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顾工人们的死活。

有一次，恩格斯和一个资产者一起在曼彻斯特街上走，他指着工人破烂不堪的房子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这位资产者连头也不抬，一声不响地听完恩格斯的话，走到拐角时就向恩格斯告别说："但是在这里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

恩格斯后来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恩格斯亲切地告诉工人们一个道理：资产阶级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

作为一个批判思想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两年当中，怀着浓厚的感情调查了工人们的状况，观察了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斗争活动，同时还研究了一些官方的文件和材料，于1845年终于写成了一部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厉控诉书——《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这些非人的境况，并得出结论说：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这也是恩格斯对宪章运动那种非暴力的、合法的斗争形式最终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实际上，恩格斯从此已经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了。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再次拜会了马克思，两个相互倾慕已久的朋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开始了终生的合作与友谊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完一年兵役之后回到巴门，在途经科隆的时候停留下来。他想到《莱茵报》编辑部拜访主编马克思。因为他在柏林大学听青年黑格尔分子说马克思是一位才能非凡的人物，他也看过马克思发表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确实了不起，还曾写过歌颂马克思才能的诗。但这次他却没有见到马克思。同年11月底，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去经商，途

经科隆时再一次停留下来拜访马克思。这次他见到了马克思。尽管恩格斯很热情，但马克思却对他比较冷淡。因为马克思以为这位21岁的青年人是柏林“自由人”的同党，而马克思此时正在同“自由人”决裂。不过，由于恩格斯诙谐诚恳，马克思还是邀请他到英国之后为《莱茵报》写通讯稿，恩格斯答应了，并且到英国之后就非常及时地写了一系列政论性文章寄给马克思。马克思看过恩格斯的稿件，十分满意，立即挤出版面予以刊登。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两年，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论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并寄往巴黎马克思和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发表。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试图从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真正根源——私有财产——来引伸出一切矛盾的做法，包含着科学共产主义在经常学方面的茁壮的根苗，马克思称赞这本书是“天才的大纲”。1844年，马克思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便开始与恩格斯通信。

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德

途中，顺路到了巴黎，又去拜访了当时住在巴黎的马克思。

巴黎田凫路38号，马克思非常兴奋地接待了这位衣着十分整洁，长得十分英俊的年轻人。两人都非常高兴，彼此钦慕。恩格斯舍不得离开马克思，马克思也不愿恩格斯很快离开，于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家里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十天。两人形影不离，都被对方深邃敏捷的思想强烈地吸引着。虽然两人走过的道路不同，但是他们对一切重大问题的看法几乎都完全一致。这次会见就成了两人终身浓厚友谊的开端。后来。恩格斯回到巴门给马克思写信说："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在巴黎短短十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一起紧张地进行写作。早在恩格斯来巴黎前，马克思就打算写一篇文章，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兄弟的思想，因为他们越来越抛弃原来的革命思想，而自以为了不起，高傲地把广大群众看作"群氓"，是"毫无生气"，"目光短浅"的"乌合之众"，把自己看作"杰出人物"，有批判头脑的"超人"。他们还在自

己创办的杂志上写文章大力攻击《德法年鉴》上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观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挑战，决定合写一本小册子。

这本书起先叫《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因为鲍威尔兄弟及其同伙妄自尊大，看不起群众，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马恩写这本书就是要批判这种“批判的批判”。后来，马克思在付印这本书前，又在上面添了一个讽刺性的标题《神圣家族》。这是把鲍威尔比作耶稣，把他那一伙比作耶稣的门徒，合在一起就好像耶稣那个“神圣家族”一样。

两人是分工创作的。恩格斯的思想很敏捷，写文章特别快，文笔也非常流畅，在巴黎的这几天，已经把分给他的那部分写完了，一共写了一个半印张，总共七节。而马克思一向是很稳健的，一字一句都要琢磨得很周到，在恩格斯离开巴黎的时候，他还只写了一个开头。由于只有超20印张的著作，才算是学术著作，可以不经过严格的检查而出版，马克思就花了三个多月写了将近20个印张的厚书，这就使原来预计的小册子变成了一部巨著。

《神圣家族》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个著名的论点，批判了鲍威尔一伙所鼓吹的“天才史观”。针对他们说的“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反动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后来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列宁认为，《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光辉著作，标志着他们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们两人的名字和事业永远连在一起了。

恩格斯回到家乡巴门后，在乌培河谷播种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反动当局为此对他进行威胁、恫吓；父亲也对他进行训斥，逼迫他从事“生意经”。当他得知马克思处境困难时，毅然摆脱“生意经”，与马克思一起投入战斗

1844年，在德国西里西亚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工人起义，虽然起义被普鲁士反动军队镇压下去了，但是英勇的纺织工人点燃的斗争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都陆续不断地发生罢工运动，抗议的怒潮也席卷到乌培河谷一带。

恩格斯从巴黎返回巴门，看到故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非常激动。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积极参加政治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活动。

恩格斯和莱茵省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经常去出席一些集会，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有时还到科隆、爱北

斐特等地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有一次，在爱北斐特一家大饭馆的客厅里举行了共产主义者集会。恩格斯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下必然引起的后果，社会革命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战争，这场战争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恩格斯满怀信心地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全场一百多人都被这位年轻革命家的演说吸引住了。他的激昂的热情，使听众越来越多。在以后举行的另一次集会上，参加的人至少有二百多。正如他写信给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三次集会，第一次参加的有40人，第二次130人，第三次200人。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共产主义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每一天我们都有新的信徒。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力量。"

当时，使恩格斯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纷纷传入德国，报纸、周刊、月刊等等都应有尽有。无论在爱北斐特，还是在科隆，

到处都有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共产主义小组也一个一个地相继出现。

尽管当时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还带着一些空想的色彩，但这些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新思想的传播使反动当局惊慌失措。爱北斐特市市长把这些集会的情况报告了普鲁士内务大臣，并采取措施禁止举行这类集会。警察局威胁各家饭馆的老板不许在自己的饭馆举行集会，违者就要罚款或者坐牢。恩格斯也接到地方当局的一封警告信，信中宣布这类集会是非法的，并威胁说，如果再举行这样的集会，将用武力来驱散，而参加会议的人就要逮捕法办。

但是，恩格斯没有因此停止活动，他仍然千方百计地进行宣传。他同其他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为此他还特地到科隆、杜塞尔多夫、波恩等城市去。

在巴门的这段时间，恩格斯还根据在英国的考察，所收集的详细资料、文献，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杰著。除此以外，他还打算同莫泽斯·赫斯一起出版一种社会主义月刊，然后再出版外国社会主义作家的丛

书，写批判李斯特的文章，以及其他许多工作。他也不住地催促马克思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计划。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已经成熟，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像我那样干，给你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斯塔德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快出版"。甚至对于使他"大吃一惊"的《神圣家族》的庞大篇幅，他也自慰地认为这也不坏。他写道："现在就把这样多的东西发表出来，那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否则，谁知道它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他有多少次不得不用同样的话来催促马克思啊！

恩格斯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和宣传共产主义使他和父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他父亲看来，这些都是"行为不检"的表现，因此，他总是摆出一副基督教徒的难看面孔，来冷落

恩格斯。当恩格斯向他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时，他就暴跳如雷。有一天，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你简直不能想象我的处境……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子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简直叫人发疯。”

在父亲的逼迫下，恩格斯决定再去试试“生意经”。但是，在他父亲公司的营业所里只呆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开始工作，他就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只好又给马克思写信诉苦说：“‘生意经’实在太可怕，巴门实在太可怕。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长此下去，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德国庸人，会把这种庸俗习气带到共产主义里面去。”

恩格斯决心离开自己的家，摆脱该死的“生意经”。他甚至觉得宁可写一些违禁的东西，好让普鲁士政府把他驱逐出境，也比在这

里过着“庸人的生活”要好些。

实际上，恩格斯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已经被警察局密切注意上了。巴门的检察长几次来调查恩格斯的情况，密探早就开始对他进行监视。警察局长在给上司的报告中，称恩格斯是莱茵省共产主义的活跃分子，普鲁士内务大臣在这份报告边批上把恩格斯称为“狂暴的共产主义分子。”

恩格斯在故乡巴门已经呆不下去了，决定一有机会就离开巴门。

正在这个时候，马克思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巴黎的消息传到了巴门。恩格斯为朋友的遭遇感到气愤，立即设法帮助马克思。恩格斯知道马克思的处境一定很困难，就立即替马克思募捐。他说：“让我们按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分担你所付出的额外开支吧。”他通知马克思说，筹款“进行得很顺利”，又说：“我不知道这个数目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因此，我的第一部关于英国的东西的稿费（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者注），我当然非常乐意交给你去支配。这本书的稿费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

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感到快意。”

恩格斯非常希望分担马克思的困难，更希望在这危难的时刻和他在一起，并与他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恩格斯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1845年4月，恩格斯终于摆脱“生意经”，离开巴门，来到了布鲁塞尔。

马克思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移居布鲁塞尔。为摆脱普鲁士反动当局的迫害，马克思脱离了普鲁士国籍，从此成为世界公民，为世界而工作

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决定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居住。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乘驿传邮车到了比利时边境，再从那里前往布鲁塞尔。马克思的夫人暂时留在巴黎，以便卖掉家具和一部分衣物。由于时间紧迫，燕

妮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将家具全部出售。然后，她拖着带病的身子，带着出生刚九个月的女儿到了布鲁塞尔，一家人在一个不大的旅馆里住了下来。

这时，全家几乎一贫如洗，穷困的暗影始终紧紧追逼。恰在此时，比利时王国司法大臣又命令布鲁塞尔的警察当局秘密监视马克思。1845 年 3 月 22 日警察突然出现在马克思的门前，要他到警察局签署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的保证书，否则就不准他在比利时居住。欧洲大陆各国反动政府都像邪恶害怕正义一样害怕马克思。不过，马克思到布鲁塞尔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他在巴黎的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他不准备在刚到布鲁塞尔的时候就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对革命者不利，公开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的条件不成熟。所以，马克思于 3 月 22 日去警察局办理了有关手续。普鲁士政府探测到马克思在比利时安然无恙，就对比利时内阁施加压力，妄图迫使比利时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为了摆脱普鲁士政府豺狼般的跟踪

迫害，只好在1845年12月脱离了普鲁士国籍。

从此以后，马克思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公民。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

马克思家经过长时间的迁徙，才找到适合他们经济条件的住所。这是圣卢万郊区的工人住宅区，同盟街5号。他们同其他布鲁塞尔流亡者一样，过着贫苦的生活。燕妮刚住在那里曾这样写道："在布鲁塞尔，就象在贫苦的殖民地一样。"但是，在这简陋的新的生活环境里，很快又变得蛮不错了。

燕妮的母亲给了马克思家一种特殊形式的帮助。威斯特华伦太太给女儿送来了她自己可靠的管家助手，"忠实可爱的琳蘅，这是她可能给她送来的最好的帮助"。琳蘅就是海伦·德穆特。1845年4月，她来到这对年轻夫妇家里，帮助马克思夫人燕妮主持家务。琳蘅非常巧妙地处理好日常生活中各种使人烦恼的琐事。在这方面，燕妮也比不上她，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她讲求实际，谨慎而又果断，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处处节约，这一切都有助于

克服最恶劣的困苦境况。从此以后，她是马克思全家的朋友和助手，她的名字和人格同她的朋友一起永垂不朽。

1845年4月，恩格斯几乎和琳蘅同时来到了布鲁塞尔，并且住在马克思家的隔壁——同盟街7号。两个亲密的战友、两位共产主义的战士就在这里携手并肩地战斗。

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正在研究经济学和哲学；恩格斯自己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后，也继续在研究英国的经济和历史。为了给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很有必要来科学地论证自己的革命观点，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的无产阶级相信，他们所创立的新的理论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无产阶级虽然已经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已经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资产阶级，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工人运动还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因此，当时的情况迫切需要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同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要用革命的理论来武装各国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自己进行顽强的学习和刻苦的研究。他们一方面不断清算自己身上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德国哲学思想的批判，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着手写一部批判德国哲学思想的著作，书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投入全部精力来写这部书。那时候，恩格斯几乎天天都在马克思家里，两人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们两人在书房里，一边交谈，一边写作，共同研究和讨论革命的理论，互相交换新的见解。

有一天，已经是深夜了，马克思家里的人都已经入睡，他们两人却还在书房里紧张地写作，有时滔滔不绝地商谈，有时提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有时两人因为想出一些绝妙的词句或有趣的比喻而乐得哈哈大笑。马克思家的女管家琳蘅悄悄地走进书房来，皱着眉头向他们摆摆手，似乎说："别吵啦，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马克思恩格斯立即压低嗓门，掏出怀

表一看，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两人这才放下工作，各自回去睡觉。

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批判了黑格尔及其门徒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揭露了当时在德国十分流行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实质，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概况，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基本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同时，这一著作还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书中写道："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并且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必须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他们还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描绘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轮廓。《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由他们两人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新的世界观。

但在那时候，出版大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费了很大心血写的这部著作却被拒绝出版。马克思曾经请一个朋友把稿子带到普鲁士的威斯特伐里亚，准备请当地的出版商出版，出版商起先答应出版这部书，但是当另一部分稿子再寄去的时候，出版商却拒绝出版这部革命的书了，因为他们害怕反动政府会把这部书没收，而不肯担这个风险。马克思一再想方设法使这部书能够出版，但一切努力都落空了。书虽然没有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相反，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弄清了问题，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马克思当时很风趣地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一直没有能够出版，直到1932年，才在苏联按德文全文印出。

第四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846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广泛联系各国的革命者，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并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845年上半年，许多革命者受反动政府的迫害纷纷从各国来到布鲁塞尔，比利时成了革命者的避难所和革命民主运动的中心，而马克思的家里则成了革命者聚集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1845年2月出版之后，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他们的名字。马克思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和非凡的才能把许多人吸引在他的周围；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殷勤好客

和举止得体，高尚的教养和令人钦慕的才智，使他们家成了革命流亡者和比利时知识界先进人物聚会的场所。

但是，在这些人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讨论理论问题时，却有着许多观点的不一致。确实，当时欧洲有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在工人中流传比较广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博爱主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当时还只是作为一个流派存在，并且只是在德国一部分知识分子里传播着。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把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深入到政治运动中去，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广泛的联系，使欧洲无产阶级相信他们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决定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同时，着手建立一个通讯委员会。1846 年 1 月，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布鲁塞尔成立了。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同各国的革命组织和共产主义团体建立通讯联系，通过铅印和石印的通告，把材料分发到各地去，用各种办法来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使各国

共产主义者团结在委员会的周围。

在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种种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斗争。因为这些社会主义流派虽然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作用和使命，往往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是都不可能达到目的。相反，如果按照他们的办法实行，只会延长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使无产阶级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这些有害的思潮中，对当时工人运动影响最大的要算是魏特林所提倡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和格律恩、克利盖等人所宣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使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平均的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魏特林虽然出身于贫苦家庭，当过裁缝，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曾经起过一些作用，但他所宣扬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却是极其有害的。他主张采取密谋组织的策略，认为自由相爱的协作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只要想方设法

建立这样的组织就能够建成共产主义，而不必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也不必向工人宣传革命理论。于是他到处组织一些福利机构来改善工人的生活，以为只要生活改善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到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耐心地帮助他认识错误，争取他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告诉他，工人阶级如果没有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如果没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想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但是魏特林却妄自尊大，不听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一次集会上，马克思和魏特林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当时，恩格斯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恩格斯就指出，要制定一种共同的论点作为共产主义者行动的指南。会上有人提议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魏特林却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宣传理论是无济于事的。现在共产主义革命迫在眉睫，不是讨论理论的时候，应当向工人们进行鼓动，来实行他的那套"救世计划"。

马克思坐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拿着铅笔，

低着头在看一个文件。突然，他抬起头来，向魏特林问：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要进行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又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这个尖锐的问题使魏特林慌了手脚，他带着一种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创立新的经济理论，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打开工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自己可怕的处境……魏特林语无伦次地说了很久。马克思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揭穿他的实质。马克思指出"魏特林宣扬的那套东西的实质是只想激起工人们的幻想，而不想给工人们可靠的理论依据。这完全是在欺骗无产阶级。马克思还指出：激起工人们幻想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导到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不给无产阶级以科学的思想和正确的理论，就什么都作不成，光凭感情冲动只会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魏特林被马克思驳得面红耳赤，可是他又用激动而发抖的声音反驳马克思，说什么他为革命做了许多平凡的准备工作，而这些工作比马克思进行理论批评和理论分析，更有助于革命事业。马克

思听到最后这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使劲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许多人跟着马克思一起离开了会场。

魏特林不但没有接受马克思的批评，相反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一伙勾结起来，处处与马克思恩格斯为敌。

克利盖是个年轻的大学生，他竭力鼓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到美国后冒充德国共产主义的代表在那里创办了一个报纸，大肆宣扬一种荒诞的"共产主义"，胡说什么共产主义是"爱的王国"，要"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要在大地上建设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称作"荒诞的梦呓"，并同克利盖进行了坚决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一篇通告，提交共产主义者出席的大会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中批判了克利盖的错误观点，揭露了克利盖的反动面目，驳斥了克利盖的"荒诞的梦呓"。马克思指出：克利盖宣扬的这套东西会大大损害共产主义政党的声誉，如果这套东

西被工人们接受，那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走上邪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所接受，《反克利盖通告》在共产主义大会上被一致通过了。这个通告后来由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作为决议分发到世界各地，给了克利盖一个致命的打击，使克利盖这个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很快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魏特林在那次会上跳出来替克利盖辩护，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魏特林已经无可药救，于是也和魏特林彻底决裂了。

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很快把这场斗争的情况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声明和魏特林彻底决裂。巴黎、伦敦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都纷纷写信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魏特林遭到了完全失败，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面前被孤立起来了。

但是，在当时巴黎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中，“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还很大。“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头子格律恩在巴黎有一批信徒。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但又害怕阶级斗争，反对革命；他们宣扬超阶级的“博爱”，自命

为代表“一切人的利益”。他们把社会主义和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反对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斗争，他们鼓吹组织工人生产合作社，似乎依靠这种合作社、依靠工人们的积蓄，就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使工人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很明显，如果不给这种荒谬宣传以彻底揭露，就会给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造成极大障碍，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于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派恩格斯到巴黎去参加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活动，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并同格律恩一伙展开斗争。

恩格斯到巴黎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广泛进行活动，并利用工人集会的机会，宣传共产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及其同伙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有一次，辩论会开了三个晚上，辩论的主要问题是：暴力革命到底有没有必要？恩格斯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暴力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不通过暴力革命，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自行到来。恩格斯还指出格律恩的“真正社会主义”完全是反无产阶级的庸俗不堪的东西。恩格斯

的发言引起了一个格律恩分子的狂怒，那个家伙居然不择手段，对共产主义进行公开的攻击。于是，恩格斯当众把他驳斥了一顿，使这个格律恩分子以后再也不敢在集会上露面了。

格律恩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继续阴谋捣鬼，到处串联，并请一些人到他家去密谋。在一个星期日晚上的会议上，他指使一些格律恩分子当众又攻击起共产主义来了，恩格斯十分气愤，就向到会的人宣布说：今天的集会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如果是，那就不能容忍象格律恩分子那样攻击共产主义的事；如果不是，只是随便什么人讨论随便什么问题，那就不必跟他们打交道，以后也就不用再来开会了。这样一来，几个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连忙辩解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到这里来集会的，他们都是一些“进步的人”，不是什么空谈家，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称为“随便什么人”，等等。另外，他们要求恩格斯说明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并没有被这些家伙弄得措手不及，相反，他从容不迫地给共产主义者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恩格斯说：“我们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

(1) 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 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的这个定义使真假共产主义者分得一清二楚。有的格律恩分子就转变立场，同意了恩格斯的正确意见。辩论的结果，大会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定义。格律恩分子失败了。

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巴黎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于是巴黎的一些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小组。

1844年～1845年，马克思在巴黎时同蒲鲁东有过来往，曾竭力争取他转到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上来，但是，他却向右转，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亲近，1846年底，蒲鲁东发表了《贫困的哲学》，系统地宣扬他的改良主义经济观点，恶毒地攻击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责难共产主义者，反对任何革命运动。他的观点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中很有影响。为了批判蒲鲁东的反动谬论，肃清它在工人组织中的危害，马克思立即写了《哲学的

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书中马克思不仅论证了蒲鲁东的哲学观点的反科学性，也就是说，论证其“贫困”，而且还第一次把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公诸于世。(该书于1847年7月在布鲁塞尔以法文出版)，并且第一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原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有可能实现。这些论证，有力地驳斥了蒲鲁东的谬论，从而促使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更加广泛地得以在工人组织中传播。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艰苦不懈地与各种危害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思潮进行了斗争，科学共产主义逐渐深入到工人的心中，从而推动了新的革命春天的到来。

马克思恩格斯把“正义者同盟”改造成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2月，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诞生，从此，巨星的光环照耀着全世界无产者翻身解放的道路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约·莫尔携带着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托书到布鲁塞尔找马克思，后来又到巴黎找恩格斯，再三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莫尔诚恳地表示：同盟广大盟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正义者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宗派主义。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愿意参加同盟，就可以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阐述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然后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

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法国巴黎建立起来的。它的成员多数是德国流亡到法国的半无产者。后来，“正义者同盟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地都建立了支部，成为当时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但是，正

义者同盟的宗旨很不稳定，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对它都有影响，尤其是魏特林的“平均的共产主义”思想对它影响更大。此外，它的活动方式也带有神秘的、密谋的组织色彩。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曾经在巴黎邀请马克思、在伦敦邀请恩格斯参加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都拒绝了，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者同盟采取了既批判又帮助的态度：一方面同他们保持通讯联系，同他们的支部进行密切的交往，参加他们的集会，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另一方面经常通过口头、书信或报刊来影响同盟领导人的思想观点，积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1846 年 11 月，正义者同盟曾发出中央委员会告全体盟员书，号召同盟盟员同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并宣布有必要制定一份供全体盟员作规范的、简明的共产主义信条。由于同盟的领导人在着手制定共产主义信条时遇到了许多理论上的困难，他们急切盼望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参加。为此，他们才委派莫尔再次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同盟有了根本的转变，

便欣然同意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使它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还把他们同意参加同盟的决定通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朋友，建议他们也参加同盟和同盟的改组工作。在这之后，同盟中央委员会又发出了告同盟盟员书和无产者书，表明他们不是要以“爱”去对待一切事件的共产主义者，在敌人到处准备战斗的时候，绝对不能宣传现在就要永久的和平，要以武力争取在政治上的权力。这再一次表明同盟开始清算以前的错误思想。

1847 年 6 月初，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改组大会，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大会之前起草同盟的章程草案，并希望马克思恩格斯出席大会。

马克思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不能参加伦敦举行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他和他的家人再一次陷于穷困，连维持生活最必需的东西都感到匮乏，更谈不上购买去伦敦往返的昂贵的车船票，只好请威廉·沃尔弗作为代表前往伦敦出席大会。

恩格斯作为巴黎组织的代表和沃尔弗一起参加了大会。在代表大会期间，恩格斯根据

事先同马克思拟好的计划指导了同盟的改组工作。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取得了很大成果：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拟定了同盟的新章程。新章程的第一条就是恩格斯执笔起草的，这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恩格斯起草的这一条章程，使“共产主义同盟”有了明确的革命目标。

代表大会还接受恩格斯的建议，把过去那个阶级观点模糊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旧口号改成了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者同盟就这样诞生了，它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此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成了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月底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同盟的纲领和通过章程草案。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向布鲁塞尔区部委员

会建议马克思恩格斯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在写给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能够出席大会，我们真是高兴之极！我们将尽力减轻你们的费用负担，请你们尽力而为。如果克服了这次危机，我们将取得胜利。马克思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了做些准备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约定提前分别从布鲁塞尔和巴黎动身，在去伦敦途中的奥斯坦德会面，商量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以及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问题。

1847 年 11 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以及英国的代表。恩格斯担任大会的秘书。

但在当时，代表们的思想还不完全一致，无论是同盟的领导人或是它的大多数盟员仍旧有不少理论问题弄不明白，例如能不能立即就实行财产公有，能不能一下子就大规模实行共产主义，在实行共产主义时是否需要运用暴力手段等等。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新纲领的时候，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会一连开了十天，代表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马克思对

一切怀疑的问题作了解释，这样分歧消失了。绝大多数代表都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彻底批判了魏特林的“平均的共产主义”思想。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新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作为党的宣言公开发表。

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立即动手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在回布鲁塞尔之前，他们已经写出要点，并定名为《共产党宣言》。回到布鲁塞尔之后，两人又接着写了一部分。由于法国即将发生革命，恩格斯必须立即返回巴黎，因此，文件就留给马克思一人定稿。1848年1月底，《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寄给了伦敦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革命宣言。在这部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卓越的语言概括了1843年至1848年间得出来的科学见解和实际经验——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和他们本人的经验。他们还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作了扼要的系统论述。为了驳斥各种反对共产主义的谎言和诽谤，粉碎种种关于共产主义的传奇和空想，他们毅然公开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史命、斗争方法和斗争目标。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极为丰富，它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1) 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2)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3) 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4) 提出并阐明了共产党的目的、政策和策略；(5) 批判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在文献的结尾，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结束宣言时发出了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受到了各国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它很快被译成各国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它的发表，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一直像一盏明灯照耀着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以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恩格斯在巴黎积极领导同盟开展革命活动，在革命者和广大工人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革命形势大大发展起来。

特别是在巴黎，广大工人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日益高涨。法国反动政府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感到十分恐慌。警察对所有革命者的活动加强了秘密监视。

1847年12月31日，流亡在巴黎的德国

革命者举行了除夕宴会，许多工人和手工业者也参加了。在宴会上恩格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工人们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法国反动政府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借口恩格斯在演说中“有意煽动反对政府”，决定把他驱逐出巴黎。

1848年1月29日，恩格斯接到了巴黎警察局的正式通知书，限他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三天内离开法国，不然就要把他交给普鲁士政府处理。当天夜里，反动警察闯进了恩格斯的住宅，在屋子里搜来搜去，想找到新的罪证来加害于恩格斯，但是，搜了很久也没有搜出任何东西。因此无法再给恩格斯加上别的罪名。

在反动政府的迫害下，恩格斯不得不离开巴黎，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一起了。

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了革命，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3月1日左右，马克思收到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从巴黎发出的一封充满敬意的邀请信。信中写道：“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

敞开着大门。”

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革命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

比利时反动当局怕得要命，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竭力想防止革命的爆发，另一方面恶意散布谣言，说什么，争取共和制度的运动是一些流亡的德国人搞起来的，他们一无所有，经常被各国政府驱逐出境，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将来独揽比利时共和国的大权，等等。这个谣言很快传遍了布鲁塞尔全市。警察局立即警告咖啡馆的老板要他们不再让德国流亡者利用咖啡馆举行任何集会。但是，德国革命者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政府的造谣，仍然坚守岗位，每晚照例地举行会议。于是，比利时反动当局就下毒手迫害流亡的德国革命者，尤其是迫害马克思。

这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为了领导盟员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决定把自己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这项通知刚刚从伦敦送到布鲁

塞尔，比利时反动政府就宣布布鲁塞尔戒严，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革命者被比利时反动当局拘捕了。同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以中央委员会名义授权马克思到巴黎去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在那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欧洲各国即将爆发的革命。

马克思正准备收拾行装到巴黎，就接到了比利时警察局的一道命令，要他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暂时组成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刚刚在马克思家开完会，没离开多久，警察却闯了进来，逮捕了马克思。几天后，马克思在一家法国报纸上亲自揭露当时警察们的卑鄙行径说：

“3月3日傍晚5时，我接到了在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王国的命令。当天夜里，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十名警察闯进了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分证为借口，逮捕了我。……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一个警察，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官一开头就对她说，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特兰先生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分证。……他们以游荡罪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次日上午11时，一队宪兵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最强烈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二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严寒和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把孩子们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只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愤怒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不想再详谈了。只告诉你一点，当我们被释放时，24小时的期限已满，我们不得不立即离开，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这样，马克思又到了巴黎。到巴黎后，马克思立即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上，马克思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虽然未能出席，也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写信催促恩格斯赶快到巴黎来，以便共同领导革命斗争。

当时，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处境也非常危险，正象他自己说的：我时刻都在等待着驱逐出境的命令。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一个革命者在所谓“自由的国家”里只可能落到这样的处境。

3 月 21 日，恩格斯从布鲁塞尔到达巴黎，立即又与马克思一道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1848 年，革命风暴席卷欧洲，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于革命，回到德国创办了《新莱茵报》，为德国革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组织和领导群众运动

1848 年 3 月，在法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

德意志联邦爆发了革命：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的梅特涅政权，迫使首相梅特涅男扮女装逃往国外。接着普鲁士首都柏林也爆发了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是历史的火车头。德国爆发的这次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国资产阶级出于其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同封建君主制度是有矛盾的，但又害怕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因此它在这次革命中又是妥胁的、软弱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要德国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反对封建君主制度，而在推翻德国专制制度以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把资产阶级革命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德国三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但怎样回国呢？当时，在巴黎盛行一种风气，一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以及德国人都结成队伍，组成义勇军团，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由德国一个新闻记者伯恩施太德和诗人海尔维格领导的德国侨民民主协会也着

手组织义勇军团，准备拿起武器攻入德国。他们想从国外用武力去促成德国革命的胜利。革命后成立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表面上十分“支持”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怀好意，因为它早对德国侨民中的革命分子存有戒心，想通过这种办法让他们赶快离开法国。另外，还可以借此博得一个“支持革命”的美名。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组织义勇军团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是拿革命当儿戏，这种从外面强迫输入革命的做法等于破坏德国革命。他们主张单个地秘密回到德国，去从事艰苦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去发动人民群众投入这场已经开始的革命。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通过俱乐部的活动，来说服德国工人和革命者不要参加义勇军团，而要单个地回到德国去。当时大约有三四百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听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分散地回到了德国，后来他们在德国的革命斗争中成了先锋队。而组成“义勇军团”的一些德国流亡者，虽然享受了法国临时政府发给的每天50生丁的津贴费，但是在到达边境的时候，立即引起了普鲁士反动军

队的重视，没费多大力量就被反动军队消灭掉了。

184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满腔热情地回到了德国，立即参加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处境非常困难。德国各地的同盟组织遭到反动派的破坏，不少盟员下落不明，有的盟员被逮捕了，有的盟员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因此盟员们之间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能够把各地的盟员联合起来，就必须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一个中心点。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选定了科隆。

科隆是莱茵省省会，是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工人比较集中，又有出版自由，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组织，盟员人数比较多。此外，马克思五年前在这里担任过《莱茵报》主编，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在科隆运用什么方法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发出各种指示呢？当时德国各地的革命条件差异非常明显，因此，难以向这些革命条件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发出具体的指

示，是同中央委员会向全国盟员发出的只能是一般性的指示。而这种一般性的指示在当时的情况下，通过报刊传播是最合适的。报纸能够及时、广泛地把各种消息和指示传往全国。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立即准备创办大型政治日报，宣传他们制定的革命路线和策略，使它成为一面斗争的旗帜。他们准备把它定名为《新莱茵报》。

当时，要办这样一个日报存在着许多困难，主要是没有资金。为了筹集资金，恩格斯特地跑到巴门和爱北斐特，想在一些比较激进的资产者中筹集资金。但是，他费了很大力气，愿意认股的股东还是很少。因为这些资产者害怕革命像害怕瘟疫一样，表面上有时似乎很激进，但一触及到革命的问题，就异常害怕，恩格斯当时给马克思写信说："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甚至那些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深怕以后我们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

恩格斯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他也不肯把钱花在这样的事情上。正像恩格斯写信

给马克思说的："从我的老头子那里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

恩格斯想尽一切办法，费了很大周折，才在巴门征集了几个股东，但绝大多数股东只是认了股，却没有付钱。

马克思很快也来到巴门。帮助恩格斯招股。到了1848年5月20日，办报的经费才筹集了很小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身边所有的钱倾囊献出，就这样，办报的经费还有一半没有弄到。为了赶快出版报纸，只能因陋就简了。6月1日，《新莱茵报》第一号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了。在报头下面印着"民主派机关报"。第一天的报上还登了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编辑：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由于德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它还没有力量领导这个运动。参加革命运动的除无产阶级外，还有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因此《新莱茵报》必须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以便团结其他阶级一起进行革命斗

争。但是，《新莱茵报》与一切民主派们办的报纸有本质上的区别。它纯粹是无产阶级的报纸，比一切民主派的革命更坚决、更彻底，它最终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新莱茵报》从第一号开始，就号召人民毫不犹豫地起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告诉人民革命手段只能是暴力的，如果没有暴力历史上任何革命都不会成功。

《新莱茵报》一开始就显得生气勃勃，马克思和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起，把德国和欧洲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地报道给自己的读者，《新莱茵报》常常一天出二次，有时还有附页。收到重要消息还以传单的形式出号外。

一切重要社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执笔。不过，由于马克思的行政事务很多，日理万机，所以，写社论的重担更多地落到恩格斯的肩上。恩格斯的视野极广，笔头迅速而灵活，马克思说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极快”。

《新莱茵报》的选材都是由马克思决定的。

他带领编辑部人员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普鲁士王朝和奥地利王朝的封建贵族势力；动员全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向反动派开展革命斗争；揭露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变行为；教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丢掉幻想、克服动摇，反对议会迷，拿起武器积极参加战斗。《新莱茵报》成了革命年代欧洲最著名的日报，实际上成了当时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在德国革命最紧张的日子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新莱茵报》，总是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向整个德国发出最响亮的号令，动员广大革命人民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作出具体的指示在当时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给革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德国三月革命爆发以后，资产阶级就和封建势力实行妥协，成立了联合政府。新政府由于害怕革命，口头上答应进行一些改革，但暗地里却在准备镇压革命，屠杀人民。

《新莱茵报》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明德国三月革命后的形势。那时候，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散布错误的论调：革命已经完成，现

在就等收获革命果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写文章驳斥这种论调，并教育广大人民：三月革命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必须继续战斗，将革命进行到底。

《新莱茵报》坚决支持一切革命运动，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始终站在革命人民的一边，维护革命人民的利益。例如1848年6月，巴黎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马克思恩格斯从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就坚定不移地站在起义者方面。当起义被反动派镇压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文章，向战败的工人们致敬。当时，反动派咒骂起义者，资产阶级诽谤起义者，而只有《新莱茵报》高举着起义者的血迹斑斑的战旗，替战败者辩护，为战败者说话。

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其他成员，不但通过报纸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而且还经常亲自到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那时候，各地的民主运动非常活跃，而反动派千方百计地想扼杀革命取得的一点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就经常参加一

些群众集会，动员群众同反革命势力展开斗争。

有一次，在科隆弗兰肯广场举行了民众大会。参加大会的约6000人，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编辑威廉·沃尔弗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威廉·沃尔弗担任大会主席，扼要地报告了开会的目的，并提议选举由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作为科隆人民群众的代表组织，恩格斯被选入了安全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致柏林议会书，要求议员们在反动政府企图解散议会并用武力对付革命民众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

民主运动在科隆一带蓬勃发展起来。有一次，在科隆附近的沃林根召开了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大约有七八千人。莱茵河上有五六只大平底船，每只船都载着数百人，船头上红旗招展，从科隆顺流而下，来到沃林根。附近各地的居民也都派了代表团参加大会。大会在莱茵河畔的草地上举行，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大会的书记。根据大会主席的提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的决议；根据恩格斯的提议，还一致通

过了决心书，决心书表示：如果和普鲁士政府发生冲突，就要不惜一切力量捍卫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在开会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政府军准备不久开进科隆，并挑起军队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借此宣布科隆处于戒严状态，来解除居民自卫团的武装。参加大会的科隆近郊的居民万众一心，坚决表示，如果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如果冲突一旦发生，他们就来援助科隆人，他们说："我们沃林根人准备一有召唤就到科隆来！"

那时候，法兰克福附近的工人和农民发动了武装起义。《新莱茵报》立刻站在起义者一边，发动群众在科隆组织了声援起义者的民众大会。

莱茵省反动当局害怕蓬勃发展的革命风暴，准备对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反动政府把大批军队调到省城科隆，并宣布科隆戒严。警备司令部命令《新莱茵报》和其他一些民主报纸停刊，还下令逮捕报纸的几个编辑。在逮捕的黑名单上有恩格斯的名字，因为恩格斯是莱茵省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间特别活跃

的人物。

但是，恩格斯在科隆宣布戒严前夕预见到反动当局会对他下毒手，就已经离开科隆回到故乡巴门隐蔽起来了。

科隆反动当局抓不到恩格斯，于是下了一道通缉令，通缉令上说：恩格斯等“犯有刑法第87、91和120条所载之罪行，业已畏罪潜逃。兹根据科隆市检查官缉拿该等之命令，即请各有关机关和官员，采取措施，进行查访，一经拿获，即予逮捕。”通缉令上还把恩格斯的特征描绘得非常详细。

但是，不管反动派怎样到处搜捕，已经找不到恩格斯了。原来，恩格斯在巴门呆了几天之后，无法在家里呆下去，就到了比利时。可是恩格斯一到比利时，反动警察在旅馆里就把他逮捕了，由于他当时随身没有带证件，警察就把他关进监狱，以后当作“流浪汉”用囚车押送到边界，把他驱逐了。于是恩格斯就又到了巴黎。

恩格斯到巴黎时身上几乎没有一文钱，只得步行两个星期到瑞士，准备一有机会再回到科隆。

在科隆，马克思得知恩格斯在瑞士的消息之后，立即想方设法帮助他，虽然马克思当时自己也很困难，但他还是想尽办法给恩格斯寄了钱。不过，在当时动乱的情况下，恩格斯没有收到这笔钱。

1848年9月以后，在科隆戒严期间，《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了。但编辑部在马克思的领导下，仍然不顾个人安危，以十分顽强的精神克服了许多困难，准备《新莱茵报》复刊工作。由于当时革命力量还没有被反动派摧毁，它同反革命势力还在进行反复的较量。《新莱茵报》终于在10月12日复刊了。为此，马克思立即写信给在日内瓦的恩格斯，告诉他复刊的消息，并要他尽快给报纸寄通讯和文章来。

流亡在瑞士的恩格斯，这时的心情非常着急，他恨不得飞快地回到国内来，参加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但是，一直到1849年1月中旬恩格斯才从瑞士回到科隆，那时候，德国革命正处在非常艰苦的时刻。

《新莱茵报》的战斗号角，使反动当局惊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迫害马克思和恩格斯。随着革命运动被镇压，恩格斯受到通缉，马克思也被驱逐出境。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出了红色终刊号

自从巴黎的六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以后，全欧洲的反革命势力逐渐抬头。1848 年下半年，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势力开始向革命进行反扑，整个德国的革命处在十分紧张和危急的关头。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新莱茵报》，在反革命势力进攻面前，勇敢地举起了战斗的旗帜，号召人民同反革命展开斗争，粉碎反革命的进攻，《新莱茵报》的笔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每一号报纸，每一期号外，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抨击着反动势力，号召人民坚决打击敌人。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毫不妥协地与反动势力作搏斗，这必然引起敌人的恼怒。当时，编辑部随时都有被敌人武装包围和袭击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保卫编辑部，还配置了 8 条步枪和 250 发子

弹。

但是，敌人却采取了政治迫害的办法。他们天天窥伺《新莱茵报》，并以各种借口一次次地对编辑部人员进行法庭传讯、搜查、逮捕、驱逐等等；特别是对马克思的迫害，更狡猾、更毒辣、更阴险。

早在1848年3月底，为了给德国无产阶级指明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马克思就已同恩格斯拟定了一个《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纲领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口号：

"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这一要求把矛头首先指向德国封建反动势力的主力，即指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马克思向德国革命后与封建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提出获准在科隆居住的要求。在人民革命运动的压力下，新政府不得不废除过去对德国革命人士的种种迫害和逮捕法令，准许了马克思在科隆居住的要求，但却拒绝了马克思要求恢复普鲁士公民权的申请。然而，新政府始终忌讳马克思。特别是马克思在科隆办起《新莱茵报》，像一

把利剑直刺反动势力的心脏，更使他们害怕。由于马克思深得民心，在德国革命者中影响巨大，他们虽有意驱逐马克思，却怕引起革命群众的愤怒，从而更加剧革命局势的发展。于是，他们只能寻找借口伺机对付马克思。

《新莱茵报》刚刚出版一个月零六天的时候，马克思就被法庭传讯。法庭借口《新莱茵报》上“逮捕”一文“侮辱”了科隆最高检察官和宪兵，要求马克思提供撰稿人的名字，但却被马克思拒绝。于是反动当局派警察搜查了编辑部，抄出了“逮捕”一文的原稿。但是，还是无法确定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因此反动当局不仅传讯了马克思，还传讯了恩格斯等。

不过，当时的形势对革命者有利，反动派害怕“小不忍则乱大谋”，在这件事上只好暂时搁置。

1848 年 9 月，德国反动势力转入反攻，科隆宣布戒严，《新莱茵报》被禁止出版，马克思又被法庭传讯。检查机关控告他违反出版法，必须准备出席法庭受审。马克思却毫无畏惧，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和反动派斗争。

10 月中旬，他取得了《新莱茵报》复刊的

胜利。

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这时，科隆有几百人前来护送他。马克思走进传讯室，护送他的群众聚集在法院的院子里向法庭示威。法庭最后只得无条件地宣布他无罪。

1849年2月，反动政府旧事重提，以《新莱茵报》"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罪名，把马克思恩格斯解到法庭。审讯那天，法庭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在最高检察官和律师讲完以后，马克思开始发言。马克思义正词严地指出，《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绝不是对检察长的侮辱，而只是对司法官的非法行为的揭露，这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马克思在发言中对最高检察官，对卑鄙的普鲁士官僚、老朽的军队、腐败的法庭都一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最后他庄严地声明：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摧毁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恩格斯接着讲话，他的讲话中也雄辩地证明，他的那篇所谓"侮辱当局"的文章完全与事实相符。恩格斯说：我们的罪行就是正确地指出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法官们被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驳斥弄得哑口无言。旁听席上的公众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言热烈欢呼。法庭只好再次宣告他们无罪，当场释放。这样，本来受反动法庭审讯的被告反而成了审判反动制度的原告。

1849年春，德国西南部，特别是普鲁士的莱茵省、巴登和普法尔茨地方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

原来，在德国革命后，通过了一部帝国宪法，这部宪法本来是一部残缺不全的宪法，但普鲁士各邦的反动势力就连这样一部宪法也不愿意承认。而宣布它是"革命的文件"，并下令解散了通过宪法的议会。于是，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群众起来保卫最后的一点点革命成果，为维护这部宪法进行斗争。工人阶级为了扩大革命势力，也利用当时的局势参加了这场斗争。农民也参加了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竭力支持起义的群众，并使这个运动具有自觉的目的。恩格斯还为起义群众制定了一个卓越的武装起义计划，并为实现这个计划和领导革命群众而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到了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

恩格斯起先和革命工人的队伍一起到了佐林根，然后从佐林根带着工人们在袭击军械库时得到的两箱子弹，到了爱北斐特。那里的安全委员会立即委派恩格斯领导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检查市内全部街垒，安置大炮。恩格斯到爱北斐特的头一天，就组织了一个工兵连，并在该城的出口处构筑了街垒，拟订了新街垒的布置计划，参加了军事会议。恩格斯到爱北斐特以后，就受到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热烈欢迎。

由于恩格斯是“红党”的领袖之一，又是《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因此恩格斯的到来，使爱北斐特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胆小如鼠的市侩吓得要命。他们担心恩格斯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于是就对恩格斯进行各种诬蔑和诽谤。他们把持的安全委员会甚至下令把恩格斯赶出这个城市。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得知赶走恩格斯的命令后，都很气愤，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但恩格斯冷静地估计了当时的局势，以革命的大局为重，觉得现在还不是公开反对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于是就到工人们那里去，对

他们进行说服，然后把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副官，主动地离开了爱北斐特。

恩格斯从爱北斐特回到科隆后，《新莱茵报》立刻发表了关于爱北斐特事变的报道，感谢爱北斐特工人对恩格斯的同情，还向他们保证：当工人和资产阶级决战一旦到来的时候，恩格斯就会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即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革命形势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莱茵河沿岸的起义被反动军队镇压下去了。过去，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反动派不敢来触动《新莱茵报》，而现在，在革命运动遭到挫折的情况下，反动势力就迫不急待地来摧毁他们久已仇视的这家无产阶级报纸了。

因为恩格斯参加了爱北斐特的起义，反动当局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几乎在同时，马克思也接到了普鲁士政府驱逐他出境的命令。普鲁士政府利用马克思于1845年在布鲁塞尔声明放弃普鲁士国籍一事，把他当作“外国人”驱逐出境了。

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普鲁士，恩格斯和其

他编辑又遭到迫害，《新莱茵报》不得不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的一号（301号）报纸。在致工人们的公告中用这样的话作为结束语：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然后，又转向敌人宣告说：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它还刊载了《〈新莱茵报〉的告别词》，以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宣告说：

"再会吧，再会吧，你这战斗的世界。
再会吧，你们鏖战中的大军！
再会吧，你这被火药熏黑的战场，
再会吧，刀剑和戟枪！
再会吧——但不是永别！
兄弟们，他们不能把精神杀死！
很快我就要身披甲胄，发出铿锵之声，
很快我就要纵马飞奔，回到你们的身旁。"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恩格斯到了

德国西南部，以便唤起革命人民进行斗争。恩格斯后来还到了巴登·普法尔茨，在那里加入革命军，当了一名副官。身佩战刀，参加了四次战役。在每次战斗中，他都非常勇敢，子弹飞鸣对他说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1849年7月7日，马克思同燕妮及孩子迁入巴黎的一所狭小的住宅，但巴黎反动政府很快命令他们离开巴黎，要他们迁往布列塔尼的沼泽地区，马克思经多方努力，终于筹到一些款项，迁居伦敦。

1849年8月，马克思流亡伦敦，家里一贫如洗，但他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与恩格斯一道认真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针对“同盟”内部的错误观点和普鲁士反动当局制造的科隆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849年8月26日，马克思抵达伦敦。燕妮和孩子们因为路费不够，不得不暂时留在巴黎。

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失败后，到了瑞士。马

克思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亲密战友的音讯了，忧虑得很。后来，马克思终于得到恩格斯的消息，马上给恩格斯写信："亲爱的恩格斯：我一直在为你担惊受怕。"过了些日子，又写信给他说："我要在伦敦创办一份德文杂志，这事肯定能够成功……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你也应该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

在流亡伦敦的头几个月中，马克思花费了不少精力，来创办一份新的机关报。他想在这份报纸上。讲给工人阶级听听，人们已经为未来的斗争，为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从革命中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为了给全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指明政治方向，这样一份刊物是非常必需的，但是办报非常艰难，特别是筹措出版资金。

报纸将仍用《新莱茵报》这个人所共知的名称，但是不作为日报，而是作为定期刊物，即《政治经济评论》，继续出版。该报应该起到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刊物的作用，因此，不但应通过书店，而且还应通过同盟盟员自己来

发行，并且以这种方式直接列入同盟宣传活动的项目。经过辛勤的准备工作，1850 年 3 月初，《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一期出版了。一年之中，又出了五期。刊物中最重要的、内容最丰富的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笔。其中有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著作对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以后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策略方针的确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刊物在德国很难推销。出版商不敢在政治上、物质上冒险，许多诺言并没有履行。所以到 1850 年底，马克思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放弃了这项业务。

1849 年 9 月中旬，燕妮和孩子们及琳蘅也来到了伦敦。然而，在伦敦的这些日子里，马克思和全家困难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1850 年 3 月底，燕妮写信给一位好朋友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痛得很厉害，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

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过哪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女孩子们（她们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忙，我们付清了房租。那时，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老板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一下子都跑来向我要帐。我很快把家中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欠帐。可是，把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

车时，又横生枝节。原来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山，按照英国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我们把家中什物统统卖掉，偿清了一切债务。”

马克思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来回不断的折腾。马克思一共有过七个孩子，但长大的只有三个女儿。其余的几个孩子都是在50年代生活贫困的时候相继死去的。1850年11月，1周岁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因患肺炎而死去；1852年4月，也只有1周岁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因病无钱治疗而死去；1855年，马克思最喜爱的8岁的儿子埃德加尔因结核病死去；1857年7月，燕妮又生了一个孩子，但刚生下来就死了。

流亡生活中的苦难并没有把马克思一家压倒，正如燕妮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的："我们在斗争中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的福气好，身

边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这样幸运的人为数不多，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克思依然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说：“我已经把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我重新开始生命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的。”

1849 年 11 月，恩格斯也到了伦敦，与马克思一道研究和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并担负起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工作。1850 年 3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向同盟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并派同盟的一个可靠成员把这份报告交给德国重新展开秘密活动的共产主义者，这个报告就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 3 月》

马克思恩格斯在《告同盟书》中，一开始就充满自豪感地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已在革命时期经过了两方面的考验：第一：其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还是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第二……事实已证明，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换句话说，科学共产主义已经受住它的第一次历

史考验。这对于进步工人的思想教育，以及对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可是，革命还没有完成任务。德国既没有统一，也还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说，失败的责任，应由大资产阶级来承担。大资产阶级不去引导人民群众推翻封建政权，而是和反革命勾结起来，反对当然同盟者工人和农民，到头来自己又重新受封建统治者的排挤。马克思恩格斯又阐明，为什么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从事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透彻地讲解了工人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逐步地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向工人们说：“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在历史科学研究方面关于欧洲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很重

要的。特别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本著作中，马克思想“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现实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以法兰西共和国为例，证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不可能消除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现象。在这部著作中，他第一次表达出这样一种思想，即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不应该接过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一切军事的、官僚主义的、为压迫人民群众而建立的机构，而是必须把国家机器砸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把这些总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该书中，马克思无情地控诉了路易·波拿巴这个暴发户，说他犯了欺骗人民的罪等。

马克思渴望着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革命运动将马上重新兴起，要求之迫切，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他在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这样写着。而且他还满怀必胜的信念宣布："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他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重新爆发革命。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年——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光辉著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了。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开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宣传，从思想上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从组织上加强无产阶级的队伍，积聚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是在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外，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条革命路线。不少人把他们的这条路线当作一种"邪说"。这些人用漂亮的词藻空谈革命，甚至企图立即举行暴动。他们不顾当时的条件，提出在全欧洲建立什么"临时政府"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不顾客观条件的冒险行为进

行了坚决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严厉地指出：这些人是想在“疯人院里制造革命”。

当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由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的一派，坚持他们的冒险盲动的观点。他们号召工人“立即夺取政权”，标榜自己是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而诬蔑马克思恩格斯是“专靠耍笔杆子的人”。他们胡说什么：“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就躺下睡大觉。”维利希和沙佩尔还背着马克思恩格斯非法地召开伦敦区部大会，公开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竭力说服他们，可是都没有效。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建议，要中央委员会将驻地迁往科隆。因为在伦敦流亡者中间，维利希等的追随者占优势，而住在德国的直接参加战斗的盟员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在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了这个迁址的建议。维利布——沙佩尔一派，违抗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另外成立了一个同盟。不久，这一派被科隆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很快恢复了在德国的活动，并收到了效果。德意志各邦的反动政府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危险的敌人”，把他们领导的秘密组织看作是“危险的组织”，因此，1851 年 5 月中旬，科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德国其他地区的盟员中，有许多人被反动政府逮捕了。

普鲁士政府并不是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就罢休，而是处心积虑地要完全取缔同盟，并且要在德国扑灭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普鲁士的内阁于 6 月 3 日在一个特别会议上研究了逮捕问题。他们派遣了许多警官，到达伦敦监视马克思，并且为计划中的控告“马克思派”的诉讼案搜集“罪证”。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措施变成了国家的头等重要行动，甚至普鲁士的内政部和外交部都插手了。

然而，审讯被捕者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可以作为“阴谋”的证据。国王亲自提出，无论如何得不惜任何代价，去定一个“共产主义图谋叛国罪”。于是警察们卖力地写假材料，捏造监视记录，物色叛徒。干这些肮脏的勾当，花了一年半时间，所以直到 1852 年

10月，科隆陪审法庭才能对那些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进行审讯。在这期间。由于政府的暴行，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是停顿了。

当第一批同志被捕的消息传来时，马克思立即全力以赴地去想办法，以便减轻被捕者的痛苦。他毫不犹豫地认为，普鲁士反动派想在打倒共产主义者的同时，打击并消灭德国的整个民主运动。所以更应该利用即将来临的审判，来宣布普鲁士国土上盛行的警察制度的罪状。在科隆审判案开庭的那些日子里，在伦敦的马克思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搜集审讯的详细情报，分析当时的情况，找出反动派的破绽，并在报纸上写文章或发表声明，揭露警察当局的卑鄙阴谋。那些日子，马克思全家人，不顾当时生活条件的困难，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些人帮助抄写文件或者信件，一些人跑腿到邮局去发送信件或到报馆去送材料，并想尽各种办法把一些材料送到科隆的被告手里，作为他们申辩的有力根据。燕妮形容当时的情况说："我们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钱，

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维持生活，并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面前。”正像燕妮形容的，当时他们“不仅用脑子，而且用双手和双脚进行紧张的工作。”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也帮助马克思搜集文件，整理材料，撰写文章，发表声明，揭露反动当局的无耻阴谋。

他们希望“斗争的结果是我们的胜利”，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无数闻所未闻的警察造谣中伤的事实，一向是被普鲁士政府绝对封锁的。一经揭露，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随意决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现在他们必须认定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政府物色了一批陪审员，这些人在审判时的表现，都说明他们是普鲁士反动政府的驯顺走卒。他们说被告多半是有罪的，给判处了三年到六年不等的徒刑。

然而对普鲁士国家来说，这次判决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不遗余力地揭露卑鄙的间谍，科隆共产党人审讯案就成了普鲁士警察制度以及司法制度的一次道义上的失败。

科隆审判案刚刚结束，马克思立即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把科隆案件的前后经过，反动当局的阴谋手法和反动政府的无耻嘴脸都详细地揭露了出来；恩格斯也写了《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把反动政府怎样迫害共产党人的全部真相一一告白于世界公众。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进一步认识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

在科隆共产党人审讯案之后不久，马克思向伦敦支部建议解散伦敦的同盟组织，并且建议向大家讲明白，这个本来已经没有活动能力的同盟，如果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这个建议被采纳了。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像工人运动那样的一种力量，虽然会受到迫害和镇压而停滞不前，甚至于后退，但是它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是阻挡不住的。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写信给马克思说：

“他们不可能把《新莱茵报》、《宣言》以及类似的东西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他们的一切号叫也无济于事。”

德国工人阶级的和国际工人阶级的第一

个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足迹，即使在后来德国反动派掌权的年代里，也并没有消失。这就是马克思和战友们一起不辞劳苦地努力争取的成果。

第五章 革命友情

从 1850 年起，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先后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在马克思成功的背后，是恩格斯的革命友情

19 世纪 50 年代正是欧洲大陆暗无天日的反动时期。马克思侨居伦敦，虽然要为面包付出时间和精力，但仍坚守自己的伟大目标：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迄今为止的著作中已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的、政治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现在问题就在于把已经找到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一事实利用来更充分地论证上述说法。这就需要批判以往的全部论

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说，并且驳倒这些学说。1850 年以来，马克思全力以赴地从事这项工作。

当时，伦敦有个大英博物馆，那里有无数宝贵的图书和大量的资料，马克思就孜孜不倦地在那里学习、工作。每天早晨 9 点钟，他就到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阅览室借来许多书籍。他在那里又作摘录，又写笔记，一直到晚上 7 点钟才回家。吃完晚饭，又照例在书房整理笔记，进行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

马克思每天总是非常准时地到图书阅览室去，而且总是坐在 D 行第二号桌子的坐位上。由于他埋头研究资料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坐位下用脚来回擦地，长年累月，竟把坚硬的水泥地磨去了一层，因此在那里留下了他的“脚迹”。

那时候，马克思仿佛“发狂了”，他急切希望在“洪水”到来之前把一切基本问题搞清楚。所以分秒必争，他每天工作的时间竟达 16 个小时以上。

起初，他希望在几个月内就能写完他计划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然而，不断出

现一些新的问题，必须研究并探明其原因。所以，马克思为了弄清和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开始长期地坚持这项艰苦的工作。

经过前后十几年的紧张劳动，马克思决定将部分手稿整理以后分册出版。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终于出版了。这是马克思后来写的《资本论》巨著的初篇，“它第一次阐述了马克思创立的崭新的价值理论，阐述了货币和货币流通的规律。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整个过程中，阅读了无数的书籍，作了大量的摘记。据统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读过和摘记过的书籍就有1500多种，他写的笔记本，包括手稿、札记、提纲、摘录在内加起来至少有一百多本。像这样持续多年地辛勤劳动，不管怎么样的好体质，也是受不了的。从5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得了很痛苦的慢性病，而且病情日益加重。正如燕妮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说：

“您会相信，恐怕没有什么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可以写一本轶事，描绘那些没完没了的默默的操心、惊恐和痛苦。”

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

“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去克服一切障碍，坚持理论的研究。有一次，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头上，”也要完成这部著作。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恩格斯给了他多方面的帮助。恩格斯不但在经济上接济马克思，而且常常应马克思的请求，把有关的材料和资料从曼彻斯特寄给他，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钟，马克思在自己寓所的书房里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喜讯。马克思在信中说：

“这样，第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情不自禁地为朋友的成就而欢呼。

《资本论》第一卷是向资产阶级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它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开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马克思阐述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说明资本是怎样增长起来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为什么会越来越多，而劳动群众越来越贫困呢？原来，资本家是靠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而富起来的，即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这样，便科学地揭示出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全部秘密。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积累的实质、形式及其发展趋势，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革命结论。

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然而生产过程里的用于购买生产资料

的资本是不会增殖的，只有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才会像摇钱树那样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些新创造出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马克思又说，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由于不变资本（指购买生产资料而不会增殖的资本）比可变资本（指购买劳动力而能创造新价值的资本）增长的较快，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造成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极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使工人“相对过剩”，造成失业大军。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成为束缚社会化生产的桎梏。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恩格斯的评论说：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100多年来，它一直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穷得像只鼠”，恩格斯为了能使马克思从事研究工作和维持生计，甘愿去搞“该死的生意经”。他们分工协作，共创伟业，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在革命失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恩格斯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欧洲的反动势力对他们进行了残酷迫害，所有的报纸刊物都不发表他们的文章，甚至剥夺了他们起码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一家七八口人，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几年前，为了创办《新莱茵报》，马克思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份遗产——几千塔勒现款奉献了出来。当《新莱茵报》被查封的时候，股东们早就退出报纸，一切重担都压在马克思的肩上。后来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快速印刷机变卖掉，并且还借了300塔勒，来支付房租和报纸工作人员的工资。马克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的。为了筹集路费，他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

东西——一套银餐具送到了当铺里，又把全部家具什物拍卖掉，全家来到了巴黎，可是还没有安顿下来，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了。马克思东挪西借，想尽办法，才使一家来到了伦敦。这时，马克思一家“穷得像只鹰”。

1851年夏天，马克思总算找到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即给美国的一家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该报编辑查理·德纳与马克思结识后，邀请马克思担任欧洲通讯员。马克思每星期给报纸写两篇稿子，但得来的稿费还是不能使一家的生活得到保障。有时候，连买报纸、信纸的钱都没有。为了写《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只得把上衣典当了买稿纸；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之后，竟没有邮费把稿子寄到柏林去印刷。家里人生病了，没有钱请医生买药。当马克思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死的时候甚至买不起棺材，只好向邻居借了钱，才把她埋葬了。平日，马克思一家人一连几个星期只能每天吃土豆和面包，即使这些能否天天弄到，还成问题。鞋破了，没有钱买新的……有一次，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的状况已经到了这种有趣的地步，我不能再出门，

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我不能再吃肉，因为没有人肯赊给我。此外，贪婪的房东还否认合同，趁机蛮横地苛要额外房租，当马克思无钱交付时，竟叫警察查封马克思家可怜的家档物什，马克思家被逼一再搬迁，惨不可言。

当马克思处在贫困患难境地时，恩格斯伸出了友谊之手，竭力帮助马克思。

1850 年 11 月，恩格斯也处于很困难的境遇。他自从回到英国以后还没有任何收入，虽然他的父母可能有时寄点零用钱给他，但没有给他固定的汇款。他的父亲告诉他，只要他坚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打算接济他。为了摆脱困境，更主要的是为了在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一家，恩格斯于 1850 年 11 月不得不重返英国曼彻斯特，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去搞“该死的生意经”，一直到 1870 年为止。

刚开始的时候，恩格斯没有固定的薪金，仅从他父亲那里得到大约每年 200 英镑的“交际费用和生活费用”，那时，他是公司的助理兼办事员，每天在办事处工作 8～10 个小时。恩格斯极其厌恶这种商人的生活，很想另找一种职业，但他在伦敦居住的一年，使他认识到，

要帮助马克思一家免于饿死，只有走这条路。马克思的经常求援及其家庭的艰难困苦，使恩格斯不断增强自己曾经所下的决心：不管时间多长，只要友谊和政治上有必要这样做，就只有忍受这种“鬼商业”的桎梏。

在曼彻斯特的头几年，恩格斯对马克思只能作少量的接济。因为200英镑作为恩格斯和他爱人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要使马克思一家人不挨饿，那就太少了。他要求父亲多给他一些钱。他父亲发现恩格斯的商业通讯写得很好，就每年给他增加50英镑。为了不致使马克思一家挨饿，恩格斯常常背着父亲，从公司里取钱寄给马克思。不久，他父亲从帐目单上发现了他多取了钱，就企图通知公司，不准恩格斯提取他指定之外的，即每年200英镑之外的款子。为了这件事，恩格斯同他的父亲弄得很不愉快。他的父亲还常常从德国到曼彻斯特来观察，恩格斯只好小心点。所以，在50年代初恩格斯只能一次帮助马克思几英镑，最多也不能超过十英镑。

过了二、三年之后，恩格斯在公司里有了自己的收入，他可以多帮助马克思一些了，一

次可以帮助马克思一、二十英镑，甚至几十英镑。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帮助是他应尽的职责。尤其是马克思把全部精力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那时，马克思正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他去完成这本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和结构的杰作。恩格斯深信，唯有这本书才能证明共产主义者主张的原则的正确性。所以，恩格斯的这种对马克思的支持，使马克思得以把几乎所有的时间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

可以说，马克思在生活中的胜利不仅应归功于他自己的巨大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恩格斯这样的战友的无私奉献。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一位朋友，马克思终究难以克服严酷的生活环境。从 1850 年到 1870 年这 20 年间，马克思给恩格斯的每封信中几乎都提到求援或收到汇款。从马恩通信中累计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的现金援助约有 4000 英镑。这还不包括信上提到的恩格斯经常亲手交给马克思和不通过邮寄的款项。也不包括恩格斯代写文章给予马克思全家另一种方式的经济援助。

那时候，马克思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每周写两篇文章,但马克思当时还不大精通英文,不能熟练地用英文写作。恩格斯于是经常替马克思修改文章,有时把马克思用德文写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当马克思忙于写《资本论》腾不出空来的时候,恩格斯干脆替马克思写。在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十年写的文章中,至少有1/3是恩格斯写的。

有一次,马克思写《资本论》正忙得不可开交,就请恩格斯代写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立即着手写作,把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寄给马克思看,马克思再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当时发表时署的都是马克思的名字。要知道,两美元一篇文章的稿酬多少能缓和马克思一家的经济困难啊!所以,这些文章很长时期内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写的。直到1913年,当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这组文章原来是恩格斯替马克思写的。

马克思一家人对恩格斯无私的援助十分感激。特别是当他们陷入绝境的时候,收到恩格斯寄来的钱,全家人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

汇单送到他们家的时候，孩子们总是高兴得跳起来。

“噢！救命钱来了！”

马克思的孩子们总是这样地喊着。

马克思对于恩格斯慷慨的援助，常常感到过意不去。他多次向恩格斯说自己压榨了他，而恩格斯总是笑着说，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东西供你榨取。

恩格斯居住曼彻斯特的20年间，虽然同马克思分居两地，但他们一直维持着精神上的密切联系。马克思不时到曼彻斯特去和他研究文章中的理论问题，还稍事休息几天；恩格斯也有机会去伦敦看望马克思，同他的一家作短期的团聚。可是，这许多年中书信往来，是这两位朋友的主要联系方式。据今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的他们两人的亲笔信，20年时间就达1300余封。显然，他们实际上写的信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有些书信遗失了，未能收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去。

他们通信谈论的问题范围很广泛，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到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分析，评论，从阶级斗争到

党派斗争，从共产主义运动到对个别人物的批判，从理论到实践，从个人生活情况到工作、学习情况，从活动到思想等等。有许多书信简直就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因此，他们两人的书信集也就成为一部百科全书。

他们把自己知道的全部东西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定期写信成了他们两人的习惯，如果他们之间偶尔有谁十几天没有写信，那么，另一位就会十分焦急和不安。有一次，恩格斯没有及时回信给马克思，马克思立即写信给恩格斯道："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还有一次，马克思犯了严重的肝病，没有给恩格斯写信，恩格斯就再次写信给马克思说：

"老摩尔，老摩尔，

大胡子的老摩尔[①]！

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

① 马克思的外号。

任命了小杜西[1]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他们在通信中互相关怀备至，有一次，恩格斯患了病，马克思知道后，立即根据恩格斯的病情和病态，翻阅了有关医学书籍，很快弄清了病因。他告诉恩格斯应该吃什么药，怎样治疗效果最好，如何使疾病不再复发等等。还有一次，马克思生了病，没有及时去疗养，恩格斯就写信说：“不过你要理智，并且给我和你的一家人赏个面子——治治病罢。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怎样呢？如果你这样一意孤行，事情必然要弄到这个地步。说真的，在我使你不陷入这种境地以前，我日夜不会平静，每天，只要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忐忑不安，以为你的病又恶化了”。

5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研究工作方面实行了某种分工。马克思专攻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和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恩格斯则在军事学、语言学方面，并且后来愈益奋发地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系统的深入钻研。没多

---

① 马克思小女儿爱琳娜的外号。

久，恩格斯在军事理论知识和军事史知识就达到很广博的程度，所以马克思在提到恩格斯的时候，幽默而自豪地把他称为自己的曼彻斯特“陆军部”。恩格斯对语言学的研究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到50年代初。除了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外，他还精通所有最主要的罗曼语。从1852年起，他学会了俄语、塞尔维亚克罗提亚语、捷克斯洛伐克语。50年代中期，他又回过头来钻研斯堪底那维亚语。60年代末和80年代，他致力于研究克尔特——爱尔兰语、荷兰语、弗里西安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恩格斯总共能用12种语言讲话、写文章；能阅读20种文字。恩格斯还把兴趣转移到研究自然科学方面。他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评述了他对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等科目的钻研，兴高彩烈地报道了德国生物学家马·雅、施莱登、泰·施旺和英国物理学家詹·普·焦尔的伟大发现。当时他就断定：自然科学的一切最新发现将日益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正确性。1859年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著出版，恩格斯和马克思立即认为它具有开辟新天地的意义。恩格斯在

1859 年 12 月 11 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恩格斯后来在 60 年代，仍继续对自然科学攻读钻研。他对分子说发生了兴趣，于是又深入地研究化学。由于恩格斯长期的勤奋苦学，他的才华是全方位的。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回忆道："他哪一样也不外行。他精通自然科学、化学、植物学、物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战术。"

自私自利，互相倾轧甚至嫉妒等等习气，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身上是没有的，他们厌恶这种作风。所有科学上的重要评价，所有政治决定，没有一项事先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所有的手稿，只要时间来得及，没有一件是不经过对方预先看过，提出建议然后付印的。所以他们中一个人的思想和结论，同时也是另一个人的，这一点已经不言而喻了。

当然，由于恩格斯在经济方面无忧无虑，他们夫妻两人过着中上等生活，并且没有子

女，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可是，从1860年以后，恩格斯也连遭不幸。1860年2月中旬，恩格斯接到家信，得知父亲病危。虽然他们父子俩感情不融洽，信仰不同，但恩格斯仍然决定去看望老人。可是，当地法庭对他在1849年夏在爱北菲特、巴登进行革命活动的控诉还未了结，于是他的母亲向当局申请只回来访问两周。这样，文牍旅行，最后经由普鲁士内政部长批准，而他的父亲早在他到家前两天逝世了。安葬了父亲以后，恩格斯为了不使风烛残年的母亲由于家庭遗产纠纷问题而感到痛苦，他同意了兄弟们要求他放弃在恩格斯基尔亨的企业继承权，而只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占一万英镑的股票，成为一个小股东。1861年2月13日，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它事情。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我以为，无论是我在你那里时的表现或是我的信件，都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丝毫没有阻碍达成某种协议的意图，相反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

更不幸的是，1863年1月初，恩格斯的夫人玛丽·白恩士因心脏病逝世。恩格斯非常悲痛。他在第二天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三个星期以后，他又在信中写道，他感到随着这位青年时代的爱侣离开人世，他剩余的一点青春也付诸东流了。玛丽的突然病逝，对她的妹妹希莉也是沉重的打击。她姊妹俩不仅有手足之情，而且由于政治观点相同，关系极为密切。以后恩格斯和希莉日益亲近和互相关心，以至由于互相同情和倾慕，而产生了永恒的爱情，于是希莉终于成了恩格斯的后继夫人了。

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事业、理想和信念的基础上，所以，才结出了这么美丽动人的友谊之花。正如列宁赞扬恩格斯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确实如此。但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友谊丝毫不带有人类的浅薄，他们在精神上的交融才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给予马克思以无限的

力量。这一点丝毫不夸张。马克思在他最喜爱的儿子埃德加尔死亡(他一生中极度伤心的事有不少次，这是其中之一）以后，说出了恩格斯的友谊对他意味着什么:“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列宁曾高度赞扬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他说:“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马克思一家虽然过着贫穷的日子，但家庭生活却生趣盎然。在境况最苦的时候，他们笑得最多，他们是最幸福的家庭。恩格斯又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无数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到

目前为止，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说马克思是一个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的、难以接近的甚至脾气古怪的人。显然，这些人以为只要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始祖马克思描绘成一个恐怖的形象，就能够比较有效地把他们“所害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搞臭，从而阻止它的传播。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无聊而可笑的。

确实，马克思遭遇到了贫困、疾病以及其他打击，特别是在50年代；如果是别的人，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恐怕早就屈服了，怨天尤人了，甚至灰气丧气了。即使在个人生活最艰难的年月，马克思一再振作精神，鼓气勇气来继续工作；这是因为他毫不动摇地认为自己还应该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多多作出贡献。他从未失去信心。虽然过着贫穷的日子，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以及和朋友们相处时，仍然谈吐诙谐，生趣盎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起他住在伦敦的那几年里和马克思全家在一起的情形时，说：“对付残酷的贫困，只有一个唯一的办法，那就是笑。谁要是因为穷而郁郁不乐，那就是贫困已经把他抓住，把他吞噬下去了……

我们在境况最困苦的时候，笑得最多，没有别的什么时候是笑得这样多的。”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马克思特别感到愉快。他本来有两个女儿，燕妮和劳拉；1855年初又添了一个小女儿爱琳娜，大家管她叫杜西，这是家里的宠儿。虽然马克思工作非常忙碌，可他总是挤得出时间来和自己的孩子们玩。她们由于他黝黑的脸和乌油油的头发而称他“摩尔”。（“摩尔”来自希腊文 μαυρσs，意为黝黑的，欧洲人用以泛指黑皮肤的人）从50年代中期起，连恩格斯和其他朋友们都越来越频繁地用这个绰号。他夫人和女儿们还称他“老尼克”和“山神”。马克思家里，大家都非常欣赏绰号。他们喜欢把妈妈叫做“妈咪”，把琳蘅叫做“尼姆”。女儿们的绰号叫起来都音调整铿锵：大女儿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劳拉叫“卡卡杜”（意思是白鹦鹉），爱琳娜则有好几个外号：“杜西”、“中国王子古古”或是“矮子阿尔贝利希”。

在工作之暇，或在散步时，马克思和孩子们一起嘻嘻哈哈地跑来跑去。她们喜欢和他玩骑马或马拉车的游戏。后来爱琳娜讲起这些事

的时候说："但是摩尔不光是一匹出色的马，他还有更大的本领。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讲故事能手。他一面散步一面讲故事给姐姐们（我当时还很小）听。这些故事不是以章节来分段而是以里来计算的。她们两人要求他：'再给我们讲一里吧'。至于摩尔讲给我听的那些无数的奇异故事中，最妙的要算'汉斯·勒克尔'了。这个故事一个月一个月地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一直讲不完。"

马克思还常常给孩子们朗读《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尼贝龙根之歌》、荷马的《奥得赛》和不朽的《唐·吉诃德》。马克思在讲故事和朗诵诗歌的过程中，教女儿们爱善良和真理，恨撒谎和残忍，教她们独立思考，独立行动。

1860 年夏天，燕妮和劳拉不上学了。爸爸妈妈尽力张罗，使这两个姑娘还能在私人那里学习一点法文和意大利文。有几年她们还学绘画和唱歌。

当然，马克思的密友恩格斯的到来，更是给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实际上，马克思的三个女儿早就把恩格斯当第二个父亲一样爱

他。那时，恩格斯经常利用一切机会，想出各种办法使马克思三个女儿在贫困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得更加美好。他在曼彻斯特只要能挤出时间并且手头宽裕时，就给自己安排几天假期，前往伦敦看望马克思一家。这对于马克思一家来说，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回忆中说："当恩格斯来信说他要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来的时候，马克思一家都为此大大欢庆，老是在谈这件事。而当恩格斯来的那一天，马克思等得不耐烦，甚至工作不下去。两个朋友抽着烟，谈了一个通宵，畅谈着他们分别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马克思在家里，只要一有工余时间，最喜欢的事是阅读文艺作品。他非常推崇海涅、歌德、荷马和但丁，还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他们的著作。他认为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都是极伟大的剧作家。在他看来，读世界文学名著，很有助于他的历史研究，因为这些作品以艺术的方法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他十分爱看当代卓越的写实主义者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和英国作家狄更斯及菲尔丁的小说。他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社会关系，

有其经济基础。这一点，马克思已用科学方法剖析出来了。

燕妮·马克思对于文学的爱好，并不亚于她的丈夫。可惜能够用来阅读文艺书籍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她除了尽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下一天的生活操心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的任务。燕妮是马克思的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多数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誊写清楚。马克思常常要跟出版社和编辑部办交涉，手续繁琐，很难处理，还必须写信。她在这些方面都干得不少，减轻了丈夫的负担。她有政治判断力，聪明能干，绝对可靠，并且毫不自私，马克思因为有这样一位夫人而非常自豪。他拿出去发表的手稿，几乎没有一篇是没有经过燕妮看过的。

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并且因为他和燕妮之间的信件后来大部分已经散失，所以关于他对夫人如何尊敬、倾慕和眷爱的情况，见证是不多的。但是有一封信却保存下来了。这封信无与伦比地表达了他对燕妮的感情。1856 年夏天，燕妮因母亲垂危

而到特利尔去探望，住了几个月。马克思写信给她说："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

你的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学，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

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为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还应该提的是，琳蘅在马克思家的作用。自从到了马克思家，她便与它同甘苦。马克思家里的事情没有她不干的，无论什么事情她都乐意去做。她总是愉快地、笑容满面地随时应付一切事情。如果马克思的夫人病了或不舒服，她就代替她做母亲。她意志坚强，她认为该怎样做就怎样做。马克思很佩服她。她在马克思家简直不是仆人，完全以主人的姿态行事。她可以在马克思发火的时刻训斥他，而马克思在她面前总是像绵羊一样。有一次，马克思和一位朋友下象棋，已经到了半夜了，马克思仍然决心不赢对方不罢休。琳蘅就把他教训了一顿，马克思这才老老实实地去休息。

琳蘅对马克思一家非常忠诚。她可以成百次地为马克思而牺牲自己，可以为马克思的夫

人和孩子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对马克思的朋友她非常亲切，热情地招待他们；对马克思的敌人她非常痛恨。她是马克思家里的“守护神”，马克思一家人也是这样称呼她、爱戴她的。当她生病的时候。马克思夫人、马克思和孩子们都轮流地在她身旁护理她、照顾她。恩格斯对琳蘅也十分亲切。当她生病的时候，恩格斯就给她寄来成筐对她健康有帮助的好酒。

马克思一家生活是艰苦的，但决不是孤立的，而且是最幸福的。

第六章 捍卫第一国际的革命性质

马克思为第一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为它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使国际工人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以其卓越的工作，成为第一国际的灵魂

在革命失败的年代里，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刻苦地钻研革命理论，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另一方面非常注意培养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继续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国际组织而斗争。原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像李卜克内西等都紧紧地团结在他们周围，刻苦地学习革命理论，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马克思恩格

斯的培养下，成长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后来在回忆马克思对他的教育时说：“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尚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你只要一见到这位伟大的智者永不停息的顽强的学习精神，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原则，即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尽快地建立一个工人政党。“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党的成员”，马克思于 1853 年 3 月 10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但是这个未来的党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翻板，它必须适应那些在德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国际和国内的要求。

50 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大工业的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扩大。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各国的工人运动由低潮逐渐转入高潮。在英国，随着 1857 年经济危机的到来，不同行业的各个工人组织又活跃起来。他们纷纷举行罢工，捍卫工人们的利益，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法国在 1857 年危机后，也成立了许多工人组织，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在

德国，拉萨尔于1863年5月组织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等国，在60年代也先后建立了工人组织，工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革命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越来越感到加强团结的必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越来越深入人心。

恩格斯说：“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马克思的这个愿望很快实现了。

1863年7月22日，英国工人为了抗议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在伦敦举行了声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法国工人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英国工人提出召开由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工人组织参加的大会，讨论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提高工资斗争方面的问题。法国工人积极支持这个建议。这样，英国工人就和法国工人组织了一个大会筹备委员会。

1864年9月28日，由英、法、德、意和波兰工人参加的国际工人大会在伦敦圣马丁礼堂举行。当时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也被邀请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挤满了人，甚至使人透不过气来。经过热烈地讨论，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选举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导委员会。由于这是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所以又称“第一国际”。

但是，第一国际从成立的那天起，内部斗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首先在制定协会的纲领和章程时就展开了斗争。总委员会的委员中，成份非常复杂，有主张阶级调和、希望成立互助团体的蒲鲁东主义者，有鼠目寸光，只为“五分钱”而斗争的工联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所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部，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同机会主义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

成立大会以后，英国代表起草了一份杂乱无章的纲领，意大利代表起草了一份内容很成问题的章程，都提交给总委员会讨论。这个章程提出要建立一个全欧洲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并把改善经济、加强教育、增进道德作为

协会的三重目的，说什么“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是以合法的形式，让政府了解他们的境况、愿望和要求。”很明显，如果采纳这样的章程，协会就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互助团体。当时在总委员会内经过激烈的争论，意见分歧未能统一。

马克思因病未能参加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纲领。但他听到一个这样的“原则宣言”时，大吃一惊。于是决定带病为协会草拟和修改纲领和章程。总委员会也决定把这两个文件交给马克思修改。

马克思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几天，重新起草了一份《成立宣言》和一份《临时章程》。为了团结欧美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一致的斗争，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马克思在草拟这些文件时，一方面坚持《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词句上尽量做到适合当时工人运动的水平，出色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困难的事……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

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充满着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坚持了革命的原则。

在《成立宣言》中，马克思用工人群众熟知的事实和通俗的语言，再一次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重申了“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强调了无产阶级只有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在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夺取政权，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成立宣言》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再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

马克思在《临时章程》中，首先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其最终目的是“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章程还指出，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即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战斗。

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后来在总委员会上被一致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第一国际创立时就取得了胜利。马克思成了第一国际的灵魂。

马克思后来一直是总委员会的常任委员和整个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国际整个存在期间领导了国际的主要工作。第一国际的所有主要文件几乎都是马克思亲自起草的。由于第一国际贯彻了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它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工作很多，他总是最准时、最经常地参加各种会议，而这样的会议往往十分频繁，几乎天天都要举行，有时甚至一直到深夜。马克思有一次告诉恩格斯，他将参加的会议是：

“3月1日。波兰大会。

3月4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人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6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同上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到夜里12点钟。通过决议。”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内部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解释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解释总会员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力图通过每一个问题来教育总委员会委员，使他们完全自觉地执行决议。

马克思在原则问题上是毫不迁就的，但在方式方法上又非常注意灵活性。例如，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建议下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在总委员会内部不应有不做工作的“名誉委员会”，这样就可以使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客不能混进来。有一次，英国代表提议吸收一个伦敦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政客作为总委员会。马克思自然不能同意这个提议，但他没有采取简单的多数压服的办法来否决这个提议，而采取了另一种办法。马克思对每一个同意这个提议的人进行个别解释工作。通过个别谈话或写信向他们说明：不能容许一个不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政客进入国际领导机构。经过马克思的说服，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后来自动撤销了自己的意见。

马克思非常重视倾听工人们对运动的意见，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

治经济问题。吃完饭后，他常常到工人家里，找工人一同散步，谈论各方面的问题。开完总委员会会议以后，他还常常和一些工人出身的委员一起走进小酒店，要一杯啤酒，和他们谈谈。

但是，在当时第一国际的领导机构中也混进了一些败类，有些是怀恨在心的阴谋家，有些是想把国际当作“摇钱树”的野心家。马克思对这些人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阴谋，撕下他们的画皮，并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清除出国际。

马克思认为第一国际的主要任务是把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因此，第一国际积极支持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通过罢工斗争来提高工人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在组织上经受锻炼。由于第一国际的有力支持，1866 年英国裁缝工人大罢工、1867 年巴黎铜业工人大罢工、1868 年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都相继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些国家的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被罢工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把第一国际看作是“十分可怕的组织”。在资产阶级眼里，第一国

际简直成了一个万能的庞然大物。他们都以为第一国际大概拥有成百上千万的资金，可以长期地无休止地支持工人罢工直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哪里会知道，第一国际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资金。总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会像马克思，以及1870年之后参加进来的恩格斯等，都是不取报酬地自愿工作的，一个经管行政事务的总书记每周也只领取15先令的微薄报酬。当发生罢工的时候，第一国际通过在各国建立的支部组织，进行募捐，来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在资产阶级眼里，第一国际简直是一个神秘莫测的组织，它的领导人坐在伦敦，似乎只要一挥手，就可以使千千万万的工人实行罢工。实际上，第一国际只是把无产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团结一致地去战斗。

在马克思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第一国际在整个存在期间取得了巨大胜利，它在各国无产阶级当中享有崇高威信，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做好准备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第一国际是一个联合性的组织，允许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参加进来，除了共产主义者，还有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为了保持国际的革命性质，马克思与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第一国际成立的目的就是把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成为谋求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核心。正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联合性的组织，就必定会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参加进来。其中，有共产主义者，有蒲鲁东主义者，有工联主义者，有巴枯宁主义者，有拉萨尔主义者，等等。马克思认为，第一国际应向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者敞开大门，以便利用群众自己的实际经验，耐心地向他们说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从而逐步地把工人群众争取到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当然，和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必须作一些让步。马克思自己在第一国际里工作时，心里常常是不高兴

的，为了顾全大局，还要不露声色。由于马克思的修养和模范作用，赢得大多数总委员会委员对他的爱戴和尊敬。当然，马克思对于第一国际内猖狂地进行宗派活动的人是毫不留情的，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起草《临时章程》时，就考虑了这一点。为了对搞宗派活动的人有个束缚，马克思在章程中规定，一切被接受加入协会的人都要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

尽管这样，第一国际内的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还是肆无忌惮地搞各种阴谋活动，个别工联主义者也曾试图反对总委员会。但由于马克思有多年同宗派主义集团作斗争的丰富经验，而且他在理论上完全清楚地掌握了各种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和它活动的规律，因而能够有力地批判宗派主义遏止分裂趋向，把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团结在总委员会的周围，使许多派别的大部分成员没有脱离国际工人运动的正确轨道。

第一国际刚成立不久，蒲鲁东主义者就开始进行阴谋活动。虽然蒲鲁东在1865年就去世了，但是，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等国却有相当深的影响。蒲鲁东主义者在1865年第一国际召开的伦敦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就开始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公开提出，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第一国际，企图据此把马克思排斥在第一国际之外。他们的这种错误观点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

接着以法国托伦为首的蒲鲁东主义者在1866年度和1867年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发难。在大会讨论马克思起草的《临时章程》和《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们的指示》时，他们抛出了一个"备忘录"，企图用它取代马克思起草的文件。他们在"备忘录"里空谈什么"各劳动人民将在互惠的基础上公开地互相交换产品；自由地组织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交换——互相效劳、互相工作、互相信用"等等。这些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了。之后托伦又提出什么"我是自由的拥护者，因而也就是私有制的拥护者。"这些与无产阶级相违背的言论，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斥责。

1867年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决定，号召全体会员学习刚刚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在马克思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的

威力之下，蒲鲁东主义者发生了分化，它的左派开始意识到私有制的危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以托伦为首的蒲鲁东主义者右派逐渐被工人运动所抛弃，而托伦本人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直接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向凡尔赛分子投降，因而被第一国际开除了。这场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

1868 年以后，第一国际转入了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把巴枯宁派驱逐出第一国际。

巴枯宁出身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当过沙皇军队的军官。1848 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革命，革命失败后被奥地利政府逮捕，并交给了俄国沙皇政府，被关在监狱里。巴枯宁在狱中曾三次向沙皇写自白书和特赦请求书，向沙皇忏悔说他参加革命是“丧失理智和罪孽深重”，乞求沙皇对他宽恕。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西伯利亚总督是他的亲戚，所以他没有受苦就“顺利”地逃跑了，先后到了日本、美国、英国。因他以前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所以在英国探望过马克思。那时第一国际刚刚成立。当马克思知道他

要到意大利时，就委托他在意大利组织第一国际的支部，他表示愿意为第一国际出力。应该说，马克思对巴枯宁的印象这时还是非常好的。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巴枯宁向你问好。他今天已经去意大利，他现在就住在那里（佛罗伦萨）……我必须说，我十分喜欢他，比过去更喜欢他……

我认为，大体上他是16年来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更加前进的少数中的一个。”

巴枯宁到意大利之后，马克思给他寄去了《协会临时章程》和《成立宣言》。他收到之后立即给马克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但是，自此以后，几年来杳无音讯。由于理论修养不足以及过分灵敏的头脑和泼辣的活动力，巴枯宁逐渐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所左右。那时在意大利还盛行马志尼的宣传，马志尼的宗教的、政治的教条主义，助长了巴枯宁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引起了他对一切国家政权的否定态度。他的喜爱密谋和地方暴动的倾向也越来越强烈。在那里，他创立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最初只有意大利人参加，主要是为了反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令人厌

恶的资产阶级空谈。但是不久这个团体就扩大成为国际性的组织。

为了这个秘密团体，巴枯宁于1867年秋迁居日内瓦，企图首先影响和平自由同盟。当这一步失败以后，他开始寻求参加国际的道路，虽然这几年的时间内一直对国际根本不感兴趣。1868年10月，他在日内瓦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建立两个月之后，巴枯宁让贝克尔向总委员会报告，要求总委员会批准它参加第一国际。贝克尔虽然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以前的好朋友，但当贝克尔寄来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后，马克思非常愤怒，总委员会立即决定拒绝这个请求，并委托马克思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通告信。马克思在12月18日"后半夜"写信给恩格斯的一封征求意见的信，证明了他本人当时的气愤。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宣布，同盟是信奉无神论的，它要求消灭一切宗教迷信，用科学知识代替信仰，用人的公道代替神的公道。接着，纲领要求各个阶级和两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

等，而且建议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它还要求两性儿童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发展才能的同等手段，即享受抚育和教养以及在科学、工业和艺术的一切领域受教育的平等。最后，纲领反对不以工人战胜资本为直接和间接任务的任何政治活动。马克思不久评价它是“陈词滥调的杂烩”、“无聊的废话，故弄玄虚的和只求暂时效果的荒谬臆想的集大成”。

巴枯宁收到这个通告信后，头上好像挨了一棒，几个星期都沉默不语。后来他还是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名义给第一国际写了回信，表示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立的组织，同意解散中央局，要求总委员会吸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把巴枯宁的信交给马克思处理。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写了回信。马克思在回信里指出，总委员会不是罗马教皇，允许各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个前提，不得提出任何与第一国际章程相抵触的论点。马克思接着批判了同盟的纲领。后来这封回信曾秘密地印发给各个支部。

狡猾的巴枯宁为了卷土重来，修改了自己

的纲领，表示同意接受总委员会的意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这才正式同意接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各个支部加入第一国际。但是，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之后，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不向总委员会报告他的组织的人员材料，也不解散他的同盟领导机关中央局，只是把中央局变成他的秘密组织，并运用它进行阴谋活动。这时阳奉阴违的巴枯宁已经控制了三个报刊，并利用这些报刊传播自己的主张，他还通过第一国际日内瓦地方组织，建议把废除继承权问题列入第一国际代表大会讨论。

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接受巴枯宁的挑战，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继承权问题。马克思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报告》，彻底批判了巴枯宁把废除继承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目的的荒谬观点。马克思的报告在第一国际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巴枯宁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且设法让他的追随者们也混进了代表大会。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千方百计地破坏总委员会和马克思的威信。但是，他的一切阴谋都落空了。

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之后，加紧了攻击总委

员会的活动，猖狂地在他的小报上鼓吹他的政治主张。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写了《机密通知》，批判了巴枯宁和他控制的报刊的一切错误言行。

第一国际日内瓦支部和巴枯宁控制下的《平等报》中的先进分子，接到总委员会的《机密通知》之后，开始觉醒，起来反对巴枯宁。巴枯宁在日内瓦蹲不下去了，于是迁到德森，在那里继续搞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恶毒地攻击总委员会是“权威主义的地盘”，咒骂马克思是“权威主义者”、“独裁者”，打着要求“支部自治”的旗号，大搞分裂。

马克思与巴枯宁分子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马克思看出，巴枯宁的理论和行动，将危害总委员会辛勤建树的一切，看出巴枯宁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把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于是，马克思积极着手把第一国际中有阶级觉悟的力量动员起来，反击这种危害革命运动的阴谋。在这方面，他的最大成就就是，帮助德国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真正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也成了马克思最强大的支柱。至于彻底清算巴枯宁分子，因巴黎公社革

命的暴发而被推迟。

在与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德国工人阶级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

1867年，马克思写信给一位朋友，报道了第一国际的成绩。他列举了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说国际在这些国家里“已成为一种力量。”当时他没有提到德国，虽然那时他是德国通讯书记。可是自从《资本论》问世以后，国际在德国也有了快速进展。官方的资产阶级知识界顽固不化，想闭口不谈《资本论》，可是这本书开始起作用了。马克思费了不少心血，在德国工人中间传布他这部科学巨著中最重要的思想。

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1863年5月，拉萨尔在德国组织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对此，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可是，拉萨尔被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时，却把自己的政治观点

写进了联合会章程，使这个组织在政治上仅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走和平议会的道路；在经济上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把生产合作社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这就使德国工人联合会滑进了机会主义的泥潭。

1864年8月底，拉萨尔与人决斗死亡。拉萨尔去世时，立下遗嘱，任命以前他情妇的秘书伯恩哈特·贝克尔为他的接班人。贝克尔在1848年以前参加过革命活动。但他是软弱无力和头脑不清的人，没有领导规模稍大一点的运动的能力。自从担任联合会主席之后，他仍然执行拉萨尔的路线，拒绝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他甚至在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中说，联合会不可能与国际工人协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可能损害联合会的组织，不会带来实际的好处。

对于伯恩哈特·贝克尔的行为，马克思写了《人类的主席》一文批判他，文章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马克思的文章发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贝克尔。柏林的工人联合会组织通过决议，把他从联合会组织中开除出去，

并呼吁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他们的决议。在联合会其他地方组织中也有作出类似决议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因不受信任，不得不辞去主席的职务。把职权移交给副主席。

当时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律师约·施韦泽是拉萨尔的另一个信徒。他以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方式进行着阴谋活动。他装出一副敬重马克思恩格斯的样子，邀请马克思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邀请李卜克内西担任该报的编辑。施韦泽给马克思寄去了办报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拉萨尔的鼓动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商量后，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李卜克内西也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不久，李卜克内西发现了拉萨尔给他的信徒的遗嘱。

原来，拉萨尔生前已和普鲁士反动大臣俾斯麦勾结在一起，答应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反动政府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而俾斯麦答应拉萨尔的交换条件只是"实行普选制"的诺言。这完全是一种背叛工人阶级的行为。施韦泽一伙人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马克思恩格斯是该报编辑部成员。另一方

面在报纸上宣传所崇拜的拉萨尔的思想观点。马克思曾多次向编辑部提出声明：应该尽量认真、尽量迅速地清除自己报纸上的幼稚的“偶像崇拜”，同时要对俾斯麦进行坚决的斗争。但编辑部却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他们的阴谋被李卜克内西发现并报告给马克思之后，马克思立即写信给恩格斯说：“在现在已经了解了拉萨尔策划的背叛的时候，不要利用我们的名字去蒙蔽工人，或者使自己成为任何愚蠢言行的工具。”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宣布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李卜克内西也公开发表声明退出该报的编辑部。

在这之前李卜克内西已在德国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最初成立了一个支部。李卜克内西经常向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会倍倍尔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倍倍尔是位镟工，14 岁从国民学校毕业后就当了工人。他 1863 年参加了新成立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并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1864 年当选为常务委员，以后又担任了协会联合会的主席。倍倍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使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影

响，转向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使第一国际增加了6000多德国会员。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会员也纷纷起来与拉萨尔的门徒的叛卖活动进行斗争。俾斯麦也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投靠而信任他们。反而在施韦泽发表了一些政治性文章的时候，把他抓进了监狱。全德工人联合会面临着垮台的危险。这时拉萨尔分子们又来向马克思恩格斯求救，马克思恩格斯当然拒绝了他们。于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工人以白拉克、约克等人为首，退出了拉萨尔派分子控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他们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领导的组织一起在1869年8月于爱森赫城正式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民主工党是在爱森纳赫城成立的，为了把它与拉萨尔派的组织区别开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叫做“爱森纳赫派”。这是世界上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按照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部分。

马克思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才使第一国际在德国建立了强大的组织。他先后写了近百封信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和其他德国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向他们说明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终于使德国工人运动蓬勃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来。这样，几年以前还被拉萨尔分子首领不可一世地嘲讽："马克思党"的成员总共只有三个人——马克思是"总管"，恩格斯是"秘书"，而李卜克内西是他们的"代理人"。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科学共产主义在德国已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现在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不再是一个单枪匹马地作战司令了。第一个独立的全国工人政党在接受他指挥。马克思立即把这个党的经验和成绩，介绍给国际。而这些成就，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巴枯宁观点的荒谬和缺乏理论根据。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商业活动占去了他许多时间，不仅要把许多时间消磨在公司的

办公室里，还要和商界的各种各样的人周旋。但是，恩格斯还是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进行科学理论的研究。他除了写一些理论文章以外，还专心致志地研究军事学、语言学。还认真地研究自然科学，他总是细心地观察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一切新成就，并用这些新成就来说明哲学上的许多问题，捍卫和发展他和马克思一起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那些年代，虽然不能直接参加建立第一国际的活动，但从第一国际成立之日起，他就竭力想办法，出主意，积极帮助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参加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为第一国际做了许多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通信中，总要对第一国际内部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进行研究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以便共同制定斗争的策略。恩格斯还和第一国际的许多活动家通信，向他们解释总委员会的路线，解释马克思采取的正确立场。恩格斯还为第一国际做了许多组织工作，如发送国际会员证，组织对罢工的声援，为罢

工工人募捐等等。

但是，“该死的生意”占去了他不少时间，这使恩格斯非常苦恼，他把这段生活称为“埃及的幽囚”生活。他总想一有机会就摆脱这个“该死的生意”。有一次，他给马克思写信说：“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该死的生意’，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无论如何，再过几年，我的商人生活就要结束。”

欧洲的革命形势在发展，革命的风暴日益临近了，恩格斯想摆脱商业生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那时候，马克思正好写完《资本论》，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恩格斯就决定退出商业活动。

1869 年 7 月，当恩格斯决定退出商业活动时，兴奋地写信告诉马克思：“真好啊！从今天起不再搞这个‘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马克思也写信热烈祝贺他从‘埃及的幽囚’中解放出来。

从恩格斯当时兴奋激动的情绪中，人们才知道，这将近 20 年的“埃及的幽囚”生活对

他来说究竟是什么滋味。

恩格斯最后一次到公司去的那天早晨，穿着一双皮鞋，出门时高兴地喊着："最后一次了!"过了几个钟头以后，他挥着手杖，满脸笑容地欢唱着回到家里来。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正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就像过节一样地摆开宴席，喝着香槟酒，来祝贺恩格斯获得自由的节日。

多年来压在恩格斯肩上的重担终于放下了，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1869年7月1日，恩格斯在给母亲的信中一开头就说："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我觉得要更好地度过这一天，莫过于立即给你写信。"又说："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今天早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我的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可以打开窗户，不必担心到处都是煤烟尘垢了，窗台上摆着花卉，屋前长着一些小树木；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写字台前，同坐在货栈里我那间只能看到天井的阴暗房间里，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了。"在这个月，恩

格斯又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不用说，我不需要告诉您，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商业而能重新随意工作，是多么高兴，尤其因为这恰好发生在现在，即欧洲的事态愈来愈尖锐化。有朝一日暴风雨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的时候。"

恩格斯为了结束在曼彻斯特的事务，又在曼彻斯特逗留了一个时期。在这期间，他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科学理论研究工作。恩格斯当时想写一部爱尔兰的历史，因为他对爱尔兰这个被压迫的民族特别同情。当时，爱尔兰的土地运动正处在新的高潮，英国统治阶级一方面血腥地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者，另一方面又在英格兰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挑起民族纠纷。所以恩格斯想写一部爱尔兰史，来说明无产阶级应该怎样看待爱尔兰问题，这是具有很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但恩格斯只写了第一章和第二章，普法战争就爆发了，紧张的革命活动使他一直没有时间写完这部书。

1870 年夏末秋初，恩格斯决定迁居伦敦。事前马克思夫人带着两个女儿——小燕妮和杜西，替恩格斯找到一所很合心意的住宅。地点是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位于美丽的瑞琴特

公园的对面，距马克思寓所，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自恩格斯迁到这里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一天不见面，大多数是在马克思家里。据马克思女儿回忆，他们经常一起散步，如果不出门，那就在马克思屋里来回踱步，"两人各沿屋子的一边，走到屋角就转过身来，他们的鞋跟在地板上磨出了一些坑洼。他们在这里讨论了许多大多数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时常两人一前一后地走来走去，半晌不发一言，有的时候又各自说自己所想的一套。直到半小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互相承认双方所想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每天，恩格斯在他自己那两间摆满书橱、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要呆许多小时，书籍除了要用的几本放在书桌上之外，都放在书架、书橱里，房间显得丰富整洁。

恩格斯处理来往信件非常认真，不管重要和不大重要的，他都要归入档案，通常还要注明收到日期和复信日期。虽然后来随着组织活动的发展，各种信件似潮水般涌来，他还是没有改变处理的方法。这对他的科学理论研究工

作时间是有影响的，可是恩格斯工作起来既敏捷，又轻快。

1870年9月20日，即恩格斯迁入伦敦新居的当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吸收恩格斯为总委员会的委员；10月4日，恩格斯被选入总委员会。从此，恩格斯就在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构从事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现在一切问题都能够随时跟马克思商量了，并摆脱了其它事务，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事业了。

恩格斯被选入总委员会后，处理了各种事情。他是总委员会中处理问题效率最高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会议他不参加。1870年，他是比利时的通讯书记，因此他对当时安特卫普雪茄烟厂工人大罢工非常关心。他把罢工的情况向总委员会详细作了汇报并对支援罢工工人作了安排。他还把这件事的情况写信给德国；也要求英国工联给予支援；并通过第一国际的报刊把比利时工人的斗争情况告诉各国工人。由于各国工人的捐款，安特卫普罢工延长了好几个月。

恩格斯还帮助国际成员对普法战争制订

一个独立的政策。1870年11月。英国工人在全国举行团结示威游行，并在会议中表示欢迎法国成立共和国。在马克思的坚持下，总委员会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但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对英国工人的策略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恩格斯要求总委员会讨论英国工人对普法战争的态度问题。1871年1月31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坚持英国工人阶级应当有独立的政策和报纸，迫使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工联领导人所理想的资产阶级法兰西共和国。他们一直认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一个争取政治权力的阶段。

这次讨论帮助总委员会中的许多英国委员对法国不久发生的事件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1871年10月，恩格斯（五十一岁）被选为西班牙通讯书记；此外，还暂时担任比利时书记。1871年10月，他一方面担任西班牙的书记；同时又被委任为意大利的书记。后来除西、意两国外，他还不得不执行葡萄牙和丹麦的书记职务。在国际的工作中，恩格斯因通晓

多种语言，常翻译国际的许多文件和频繁的通信。

巴黎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写下了《法兰西内战》，热情歌颂“冲天的巴黎人”的革命精神，总结了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

1870年7月底，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战争开始是由法国挑起的，但是腐败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王朝很快在普鲁士军队面前大吃败仗，以到法国的重要据点色当被包围，路易·波拿巴也当了普鲁士军队的俘虏。

消息传来，整个巴黎马上轰动起来，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迅速高涨。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皇派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成员大部分是一些反动

派，他们把自己的政府叫作“国防政府”，实际上是“卖国政府”。他们表面上表示要“抗战到底”，“决不让出一寸土地”，实际上准备向普鲁士政府卖国投降。

到了 1871 年 1 月，临时政府的头子梯也尔同普鲁士签订了临时停战协定，宣布卖国投降。“国防政府”的这种反动卖国政策使法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成立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挽救法兰西的民族灾难。法国工人阶级纷纷武装起来，改组了国民自卫军，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反动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终于公开向无产阶级发动了进攻。他们借口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企图以此来解除工人武装。当时，摆在巴黎无产阶级面前的是两条道路：“是按照梯也尔的命令，把武装交出去，让法兰西民族完全覆灭；还是行动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卖国政府，把法国从覆灭中拯救出来。巴黎的无产阶级选择了后一条革命的道路。1871 年 3 月 18 日，英勇的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的工人立即占领市政厅，梯也尔政府的首脑人物都怆怆惶惶逃到了凡尔赛。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接管了巴黎政

府，当天晚上市政厅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革命的红旗，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胜利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巴黎公社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后来把巴黎公社的成立叫作“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巴黎起义的消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在马克思恩格斯主持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曾多次讨论了法国革命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普鲁士占领法国的情况下，法国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的起义将是“愚蠢举动”，他们一再告诫法国工人不要过早地发动起义，如果起义，那一定会遭到普鲁士军队的镇压，会使历史倒退 20 年。但是，当法国工人起义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当法国工人手持武器，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去责备他们，去埋怨他们，而是立即站到起义者一边，以实际的顾问和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积极热情地支持巴黎公社。马克思热情地赞扬法国工人的无比勇敢精神，并把这次起义看作是法国工人的最光荣的业绩。马克思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

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各种报纸上刊登的材料和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虽然他们两人住在伦敦，但是他们始终及时地给公社以具体的指导和热情的支持。3 月 18 日以后，马克思设法和赛拉叶、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建立通讯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援巴黎公社。马克思还亲自给各地的国际会员写了几百封信，广泛地揭露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诽谤和污蔑，宣传巴黎公社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号召各国工人组织起来支援巴黎公社。在国际的领导下，欧洲许多城市都举行了由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组织了游行示威，表示对巴黎公社的声援。

马克思还通过一个来往于巴黎和伦敦的德国商人秘密地同巴黎公社保持着直接联系，不断向公社领导人提出建议。给以具体的指示。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匪帮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地企图进行反革命复辟，他们乘巴黎革

命还没有取得全面胜利，公社的政权还不很巩固的机会，阴谋卷土重来。马克思要求公社的领导人揭露敌人，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予以公布”，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但是，“过份仁慈”的巴黎人，在敌人接连不断地组织反革命示威和军事进攻面前，一方面忙于公社的选举，另一方面对反革命暴乱没有采取坚决地镇压措施，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反而洞开巴黎城门，让他们撤退到凡尔赛；公社对一些私藏武器和炸弹的反动分子，抓住以后也很快就释放了。马克思当时提醒公社，要他们立即向凡尔赛进军，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马克思在给巴黎公社委员的信中说：公社应该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进，集中主要精力开展对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希望公社派代表到全国各大城市去，发动广大工人和农民参加共同的斗争。

当马克思得到凡尔赛和普鲁士秘密勾结的消息时，立即写信告诉公社领导人，要他们加强戒备；还特别告诉他们，要加强面对普鲁士军队的蒙马特尔高地，要公社战士们行动果

断，不要相信普鲁士所谓的“中立”态度。马克思在信中说：

“普鲁士会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方便，以加速占领巴黎。因此，你们要当心啊！”

但是，当时公社的领导人没有听取马克思的具体建议和宝贵意见，以致以后的斗争中丧失有利的时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

由于公社对反革命过分“仁慈”，梯也尔匪帮逐渐喘过气来。他们集中兵力，向巴黎反扑，夺取了巴黎外国的一些炮台和据点，他们还和普鲁士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来镇压巴黎的革命。1871 年 5 月，普鲁士反动政府和梯也尔卖国政府签订了和约，同时还达成了口头秘密协议，规定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让凡尔赛军队通过普军防线，停止向巴黎运送粮食。和约签订以后。普鲁士军队立即释放了 10 万法军战俘，这就使凡尔赛匪帮的力量大大加强了。

5 月下旬，梯也尔匪帮向巴黎发动了总攻势，战争的形势对革命十分不利。但是公社战士们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和坚强不屈的精神。

激战进行了几星期，先在巴黎近郊，最后在城里的大街上。每个市区，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屋，都由公社战士保卫着。还有许多妇女和丈夫、兄弟、父亲一起英勇斗争，勇敢的女教师路易莎·米歇尔就是其中一个。

凡尔赛的反革命队伍正在推进。他们正在向公社战士进行野蛮的报复，这些消息对马克思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他病倒了。他的大女儿燕妮写信给德国的朋友们说：

“目前的局势使我们亲爱的摩尔痛苦极了，这无疑是他生病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朋友当中，有许多是公社战士，其中有些已经牺牲在凡尔赛的屠刀之下。”

凡尔赛的匪徒们用极其残暴的恐怖手段对待被俘的革命战士和妇女、儿童。凡是参加过战斗的人，凡是衣衫上有枪托痕迹的人，甚至相貌像工人的人，都被匪徒们就地枪决。被杀死、监禁、流放、驱逐的人数达10万之多。

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向他的朋友说：“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我曾建议公社委员们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而当时他们是还有时

间这样做的；我曾事先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将陷入罗网；我向他们揭露了皮阿·格鲁赛和韦济尼埃；我曾要求他们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么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

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不辞辛苦地让那些幸免于杀戮的公社战士能够逃出法国。他保护了无产阶级的许多优秀的代表人物，使他们免受军事法庭的审讯，并且帮助他们办护照，筹措路费，找工作。许多人认为他的家是第一个避难所。这些法国流亡者一连几个星期在他家进进出出，受到了他的热情招待。支出大量增加，这自然使主妇感到棘手。因为马克思专心致志地干着国际的工作，除了恩格斯的支援外，一点收入也没有。燕妮常常不得不去向朋友们借贷。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想尽办法为流亡的法国革命者服务，什么都阻挡不了她对他们的关心。这段时期里发生的事，确实常常使她回忆起1848年革命失败以

后，马克思不得不带着一家逃亡。到达伦敦时身无分文，艰难困苦的情景。

马克思不但拯救了一些革命者，而且主要的是把公社战士的斗争经验应用于国际工人运动。4月底，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他甚至就在病床上写这个文件。他写了两个草稿，然后最终定稿。巴黎的最后一个街垒失守的两天以后，即5月30日，他已经写成了宣言《法兰西内战》，向总委员会宣读了。6月底，发表于报刊上，并译成多国文字的小册子。

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根据详细占有的资料和铁的事实，揭露了阶级敌人散布的各种谣言和诡辩，驳斥了他们对公社的攻击和诽谤；用公社的宝贵经验批判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在书中指出：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得出来的最根本的经验，最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黎公社原则。

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失败了。但是，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公社失败一年以后，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的诗——当时译成了许多种文字——成了在马克思恩格斯意旨的指引下英勇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赞歌。成了向各国和各色人种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号召：

“醒来吧！全世界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的人！

你们要用暴力，

来废除那炙手可热的律令！

醒来吧！奴隶们！
去跟压迫者算帐！
再也不能永远赤贫！
成群地冲上去吧！非拥有一切不行！
听！号角已经吹响！
起来；进行最后的搏斗！
国际工人协会，
在为人类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公社失败后，国际外反动政府联合组成一支围剿队对付国际；国际内巴枯宁分子也要搞跨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国际经受住了考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出版，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由于它公开声明拥护公社，而作者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大总管”马克思，国际一下子成了公众关注的中心。正如在1848年——1849年革命以后迫害共产主义者时期那样，现在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组成一支围剿队

来反对革命运动。他们都在深入研究，怎样才能消灭国际，怎样才能使国际的拥护者不敢吭声。欧洲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法国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就足以构成刑事罪而应该受到惩罚。俾斯麦同沙皇以及维也纳政府商议，以便采取共同的措施来反对国际。他把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定了叛国罪，判了两年要塞监禁。在西班牙，国际的支部被取缔，教皇宣布，凡藏匿国际成员者，就是帮助了魔鬼的奴隶。

在伦敦，许多暗探跟踪着总委员会委员。1871 年 8 月，马克思在一个海滨浴场呆了几天，因为他在前几个月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一下。他散步时，总是有一个秘密警察跟着。马克思很幽默地告诉夫人，他是怎样大胆地制止了这个特务的。“昨天，我又遇到了他，很反感，于是就停住脚步转过身去，以轻蔑的眼光透过长柄眼镜打量这个家伙。他怎么样呢？恭顺地脱下了帽子，而且今天已不再光顾了。”

马克思一直受到其政敌的攻击，他们恶毒咒骂和造谣中伤，其诬蔑的程度，在资产阶级

报刊上还从未有过。正如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说，他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他接着还说：“这对于过了20年单调淡泊生活的人来说，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威胁我说要向法庭起诉。看他们敢！我是不怕这些流氓的！”

尽管雹子似的攻击向马克思袭来，但这位国际工人协会的领袖，虽已是56岁的人，却仍然象当年30岁的《新莱茵报》总编辑那样，为革命事业而热情奔放，敢说敢做。

这时候，不但应该同政府的恐怖政策以及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同国际内部有些人一心想把国际搞跨的势力进行斗争。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以为时机已到，他们可以占领国际，排斥工人运动中的科学共产主义，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强加于国际工人运动了。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切实有效地反击了巴枯宁分子的阴谋活动，捍卫了国际工人协会。还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里昂的工人也举行了起义。巴枯宁立刻带着一帮追随者急急忙忙地赶到里昂，并且进入市政厅。由于里昂有巴枯宁的组织，使他有机

会在里昂工人阶级面前显露自己。他在市政厅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废除国家，反对权威，并下令撤除市政厅的警卫。他要把里昂变成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权威的、甚至是没有武装的城市。可是他的美妙的幻想在24小时之内就破产了。资产阶级军队的几个士兵没费气力就把巴枯宁和他的一帮兄弟赶跑了。他们溜回了瑞士。里昂工人用鲜血赢来的胜利被巴枯宁轻易地葬送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罪人，竟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配合各国反动派放肆地攻击诽谤巴黎公社。

巴枯宁回到瑞士之后，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网罗信徒，扩展他的阴谋组织，还利用他的门徒分裂了瑞士的第一国际组织。

总委员会为了给巴枯宁阴谋集团以迎头痛击，准备在第一国际1871年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上，解决巴枯宁派的问题。巴枯宁害怕见到马克思恩格斯，没敢前来参加会议。马克思在伦敦会议上批判了巴枯宁反对工人参加政治运动的言论，揭露了他企图分裂第一国际的阴谋，并建议选出一个调查巴枯宁的阴谋组织的委员会，着手调查巴枯宁的组织情况和他的

阴谋活动。

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巴枯宁的分裂活动更加猖狂。他召开了没有被批准加入第一国际的九个巴枯宁派的地方支部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汝拉联合会"。他发出通告，扬言他们是自治组织，不受第一国际代表会议的"侵害"，并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这个通告成捆地向外散发，并寄给了资产阶级的报刊。

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得到了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一些持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的响应。他们声明要改组总委员会。各种资产阶级激进报刊也向总委员会发动总攻击，使总委员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决定给巴枯宁派以更有力的反击。他们为总委员会起草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通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批判了巴枯宁主义。总委员会决定在1872年的海牙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上彻底解决巴枯宁派的问题，并派人到瑞士、西班牙、比利时、俄国调查收集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的详细材料。

巴枯宁和他的骨干分子千方百计阻挠总

委员会的调查，甚至收买警探、冒险分子、骗子和武装匪徒，采取恫吓、暗杀总委员会派出的调查人员的卑鄙手段，破坏调查工作。被派到各国的调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一切困难，有的人在受重伤的情况下完成了调查任务。

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从各种各样的非第一国际组织中选派代表，以鱼目混珠的手法取得代表席位，并且在代表大会上掀起反对总委员会的恶浪。他们提出取消总委员会的一切职权。巴枯宁主义的意见遭到大会的否决，大会通过了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

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各国资产阶级对第一国际的种种迫害，第一国际在欧洲开展活动更加困难，他们向大会提议把总委员会驻址迁往美国。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通过了这项提议。根据章程规定，大会选举了在美国居住的新的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的朋友左尔格当选为总书记。

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审查巴枯宁派的组织。根据大量调查材料，大会决定

把巴枯宁和巴枯宁派的首要分子开除出第一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批判巴枯宁的文章。这样，巴枯宁分子在政治上不仅被打倒了，而且在道义上也垮台了。此后，巴枯宁再也不能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重要作用了。

马克思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于1873年9月写信给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左尔格说："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因此就放弃纽约的中心点。"

根据马克思的意见，3年以后，1876年年中，总委员会在费拉德尔菲亚召开了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宣布解散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呼吁：

"由于当前欧洲政治局势所产生的原因，我们解散了国际的组织，可是我们却看到，这个组织的原则，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工人所赞同并加以维护的……以后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时，全世界的工人将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

重新聚集在一起。那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将喊得更为响亮。”

第一国际完成了它的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第七章　最后的斗争

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一家有了一些变化：姑娘们都长大了，找到了革命的伴侣。马克思一家庞大起来，他们共享革命的甘苦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姑娘们都长大成人了。在父母跟前时，所想所做的都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关，因此她们自己也参加了工人运动。大女儿燕妮从小就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息息相关。60年代中期起，她就开始逐渐代替母亲，给父亲当秘书，并且遵照他的嘱咐，写了许多通讯。她分享了爱尔兰自由战士的希望、失望和痛苦，并且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全力以赴地募集捐款，来为那些被驱逐出境的公社战士们解

决困难。这时她认识了法国新闻记者沙尔·龙格。他曾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身份，在公社战士的行列中参加了战斗。他们的婚礼是于1872年10月举行的。

二女儿劳拉多才多艺，因此她有“厨娘”、“秘书”、“女骑士”、“女诗人”等绰号。她是一个能干的当家人，无论什么活她都干得很麻利。劳拉也经常帮助父亲抄写东西，后来常常陪着父亲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摘录材料，并且加以整理。她还经常为父亲收发信札，按照父亲的吩咐草拟信稿，从报纸上摘录资料等等。1868年4月2日，劳拉与拉法格举行了婚礼，这比她姐姐结婚早三年多。

拉法格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西班牙通讯书记、法国人。他在1866年由于第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亲密起来，并且常常在马克思家进进出出。这个漂亮的、有知识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对劳拉产生了恋情，劳拉也有些喜欢他。这样他们很快就相爱并订了婚。那时拉法格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巴黎大学当局勒令退学不久，还很年轻。于是马克思多次教育拉法格要正确对待恋爱，不要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

的亲昵。一直到1868年马克思才同意他们俩结婚。

拉法格结婚之后，在伦敦参加了皇家外科医院的考试，获得了行医的权利。不过，到了1868年10月，他和劳拉一起回法国去了。起初他们居住在巴黎。他们在巴黎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沙尔·龙格(即后来马克思的大女婿)等人经常往来。著名的法国无产阶级政治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及其追随者也常常到拉法格家里来。拉法格和劳拉竭力在法国传播马克思的学说。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介绍给布朗基和他的友人，布朗基很赞成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拉法格还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法文，并且在法国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

拉法格和劳拉经常把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活动情况写信向马克思汇报。他们在第一国际巴黎支部中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使第一国际在法国工人中有了威信。1870年由于第一国际会员的大量增加。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也成立起来了。

巴黎公社成立之前，拉法格和劳拉迁到波

尔多居住。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他们在那里从事马克思学说和第一国际的宣传、组织领导工作。巴黎公社成立时，拉法格赶到巴黎，巴黎公社委派他在波尔多发动革命起义。拉法格回到波尔多之后，立即在他创办的《国防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写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并在报纸上发表了揭发“国防政府”的卖国行为和主张为革命进行战斗的文章。1870 年 10 月底，拉法格改组了第一国际波尔多支部，加强了支部的领导力量，使第一国际波尔多支部全力以赴地支持巴黎公社，配合巴黎公社进行革命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当局发出逮捕拉法格的命令，他与劳拉逃到了比利时，以后又到了西班牙。拉法格和劳拉在西班牙和巴枯宁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夫妇两人还一起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海牙大会之后，他们就到了伦敦，在那里一直住了八年。在伦敦，拉法格从事新闻工作，劳拉当教师。他们的三个孩子在来到伦敦之前就先后死去了，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生过孩子。

燕妮结婚以后，马克思家里只有四口人了

——夫妻两人、琳蘅和小女儿爱琳娜。那时，爱琳娜虽然只有17岁，已经从姐姐手里接过了为父亲当秘书的业务。由于马克思没有时间来亲自答复所有的信件，她就干练地担负了通讯工作。这位高高瘦瘦的，头发乌黑，长相美丽的活泼姑娘，在父亲旅行到外地去休养时，也陪着他。尽管她还年轻，却已经成为他所信任的人了。她也和姐姐们一样，无限热爱父亲，而且认为能够做他的可靠助手，是自己的最大幸福。后来，在重新活跃起来的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她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极差。特别是从普法战争到海牙代表大会间，马克思所付出的劳动，几乎是人力所不能胜任的。只是因为高度集中了精力，才使他那已经很衰弱的身体顶住了种种劳累。但是到了1873年春天，也就是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没几个月，他就垮了下来了。

剧烈的头痛和失眠，使他十分苦恼。由于头晕，他在几小时的脑力劳动以后，就干不下去了。有一度甚至完全不能工作。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把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

一当身体稍有恢复，他又投身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写作，他是多么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完成这部巨著啊。

1875年春天，马克思又搬了一次家，迁到了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离原址不远。这里，很快又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和国际工人协会久经考验的战友们的常聚地。在这里，谁都感到真正的人生幸福，是同那种为全人类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

燕妮·马克思善于招待客人，使他们永远忘不了在这里作客的情景。在这方面，比起她丈夫来，她是毫无逊色的。从科隆革命时期起就一直忠实地站在马克思一边进行斗争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也常常到马克思家来。他说："马克思的家为每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开放着。我和许多别的人和他家属相处时，其愉快情形是难以忘怀的。一家中最得人心的是那出类拔萃的马克思夫人。她是一位高尚的、特别美丽的妇女，仪态优雅，但是非常善良、亲切、有说有笑，既不傲慢，也没有局促不安的现象。所以人们在她周围，就像在家里自己母

亲戚姐妹跟前那样随便。她满腔热情地对待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所得到的每项成绩，哪怕是极小的成绩，也使她感到十分满意快乐。”

当然，还不能不提到琳蘅对马克思一家的忠心耿耿，体贴入微。所有和马克思家接近的人，都知道这位无私的妇女对马克思一家有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全家的轴心，一切都围绕着她转动”。

到马克思家最多、最勤的还是恩格斯。很奇怪，他们两人虽然已经认识几十年了，却仍旧彼此不断发现对方新的优点，不断因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而感到幸福。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给朋友的信中幽默地说：“恩格斯陪着摩尔东走走，西逛逛，他在摩尔身上起的作用，比任何药物都大得多。我们每天见到‘将军’，晚上和他在一起，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恩格斯能够把马克思肩负的工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承担起来。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他的经济学著作，恩格斯就日益频繁地做着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但是有一点是一

如既往，没有改变：不管两人中的哪一个，在给他其国家的战友们出主意的时候，总是两人一起考虑给以什么样的建议、指示以及批评(如果必要的话)。经常同恩格斯商讨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他的“弗雷德”的帮助，他就不能满足国际工人运动的日益增多的要求。

他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一直像个威武的将军。马克思的一家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恩格斯的绰号——“将军”

恩格斯有个绰号叫“将军”。马克思家里的人和伦敦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绰号，平时都管恩格斯叫“将军”，连写信的时候，也往往不叫他名字，而称“亲爱的将军”，恩格斯在给他们写信的时候，自己也常常在信的末尾署上“你的将军。”

恩格斯的外表确实像个威武的将军，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平常总是精神抖擞，朝气勃勃，好像随时都准备去参加阅兵典礼似的。他穿一套衣服能穿很久，能经常保持整齐

清洁，好像永远是新的一样，所以显得更加威武。

恩格斯不但是个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还是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恩格斯 21 岁时在柏林服了一年兵役，在这期间不但学习了军事操练，而且还认真地钻研了军事科学，很快获得了“炮手”的称号。后来在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时期，他又参加了起义的军团，曾四次直接参加战斗。那时候，他在军团里当一名副官、负责弹药、武器、粮食和服装的供应工作。在战斗激烈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前线，身佩战刀，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在战场上见过他的人，都称赞他沉着镇静和临危不惧的精神。

恩格斯年轻时就喜欢骑马。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更认为骑马有特别重要意义，因此经常练习骑马跳越障碍。有一次，他连人带马都摔倒了，脸上还受了伤。马克思知道后十分担心地写信给他说：你可不要做太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们拿脑袋去冒险的。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强调指出，

骑马是军事科目的物质基础，并风趣地说：请你放心，我的脖子将在另一种场合下折断，而决不会在坠马时折断。

德国革命失败后，恩格斯觉得，武装斗争在未来的革命中必将起重要作用。为了使无产阶级的军事学说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系统而认真地研究了军事科学，刻苦钻研了从步兵战术、工事构筑、武器类型直到军事通史等各种军事知识。恩格斯不但研究了许多著名军事专家的著作，自己还写过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文章，例如：1853——1855年写了许多关于克里木战争的文章，1857年——1858年写了关于鸦片战争的文章，1859年写了论法国和皮蒙特同奥地利作战的文章，1861年帮马克思写了关于美国内战的文章，另外，还为英国、德国等军事杂志写了许多有关各种军事问题的专题论文。在马克思恩格斯为美国百科全书写的大约80篇专题军事论文中，绝大部分是恩格斯执笔的。

恩格斯在这些军事文章中，总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战争，例如，恩格斯在关于英法

联军侵略中国的文章中着重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加强了对外国侵略的反抗，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他说，这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争，这是谋求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他还热情歌颂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愤怒地控诉沙皇俄国20多年来，把中国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的强盗行为。

恩格斯这位将军写的军事文章，确实要比那些号称军事“专家”的文章不知高明多少倍。恩格斯不仅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所以站得高、看得远，对问题有精辟的理解，往往能够明察秋毫，料事如神。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才能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有一次说：他非常信赖“曼彻斯特的军事部”，这个军事部在任何军事问题上都会立刻给他指示。

1849年匈牙利对奥地利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恩格斯写了许多文章登在报纸上，由于文章的内容常常很快得到证实，使当时所有的

人都感到震惊。那时候，恩格斯写文章是不署名的，所以大家猜测：这些文章可能是匈牙利军队某个高级指挥官写的。其实，恩格斯既不是高级指挥官，也没有掌握新奇的情报，他只是根据奥地利官方公布的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去伪存真，得出正确的结论。

恩格斯的军事才能在普法战争期间表现得更加突出。那时候，他为伦敦一家英文报纸《派尔——麦尔新闻》写了59篇文章，其中40篇用了《战争短评》的标题。他的这些文章都是随着战事的进程写的，开始是每星期写两篇，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每星期就写三四篇。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有关资料和报刊上的消息，尽管这些消息有时很不完整而且互相矛盾，但他在文章中总能全面地描绘战争的整个真实过程，并且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变。例如当时，虽然法国一开始打了胜仗，但是恩格斯根据法国军队的组织情况和军需部门的腐败程度等预言：普鲁士很快会占上风。事实很快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又例如，法军在色当投降的前几天，恩格斯在文章中就已经预见到：法军必将在色当遭到惨败并不得

不投降。不到几天，事实就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总之，恩格斯在头一两天所作的预言，过后往往丝毫不差地被证实了。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样的文章除了熟悉军情的最高指挥部的军事专家以外，谁能写得出来呢？

有一次，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赞道："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的这些文章在这里多么轰动一时啊！这些文章写得如此惊人清晰明了，使我不能不把你称作小毛奇。"当时，马克思也把恩格斯称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就给恩格斯起了一个"将军"的绰号，这个绰号很快就在朋友中间广泛传开了。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曾经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

光辉的顶点。”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所有从事科学研究者的杰出楷模。

马克思的一生除了斗争就是学习，而学习也是为了斗争。他从来也不愿让自己的头脑停止思考。他曾说：若一个人失去了工作能力，就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只要他不是天生的畜类。

马克思过人的勤奋是和他那过人的毅力和精力分不开的。他日日夜夜埋头工作，连躺在床上养病的时间也被利用来钻研科学。对他来说，不能看书学习的时刻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壁炉的两旁以及窗子对面都顺墙放着摆满书的书柜，书柜上堆着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一直顶到天花板。两个桌子上也堆着稿件，书和报纸，壁炉上也是书，那上面还有香烟、火柴及马克思夫人、女儿、恩格斯等的照片。马克思不准任何人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去整理他的书籍和稿件。这些书籍和稿件看起来摆放得杂乱无章，实际上它们在马克思的脑子里都有固定的位置。马克思总是能够立刻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马克思有一个习惯，喜欢反复阅读自己做的摘录和他在书中圈

划出来的段落，以便将这些牢牢记在脑子里。马克思的记忆力非常好，表现出惊人的准确。

马克思的好学精神和他强烈的求知欲推动着他从事广泛的科学研究工作。人们称赞马克思说，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他不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历史、法律等社会科学有深刻地理解和贡献，而且在语言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也都很有素养。他还很喜欢文学，在他的著作和平时的谈话中经常引用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和警句。

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马克思为了完成这部科学巨著，他达到了忘我的研究境界，他研究的科目之多，和使用过的材料之浩瀚，是非常惊人的。恩格斯在谈到这点时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务的人，一个问题自然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论地租的一章写得空前地完善。他能轻松自如地用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阅读，此外，他还研究古代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恩

格斯还对马克思写《资本论》作了计算，仅仅在俄国统计学方面，马克思所阅的书，其体积就超过了二立方米。

马克思睡得很晚，但他每天早晨总在八、九点钟起来，喝过清咖啡和读过报纸以后，就到书房去，一直工作到半夜甚至更晚一些。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晴朗的傍晚到外面散步的时候，工作才中断一下。白天，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学习、工作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他的胃为了大脑的这种繁重工作而付出了代价。他吃得很少，常常感到胃口不佳；为了增进食欲，他常吃些味重的菜，像火腿、熏鱼、鱼子酱、酸渍菜等。同时，他也很少饮酒，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禁酒主义者。可是，他吸烟却吸得很厉害，大量地消耗着火柴。他曾有一次说，《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他写这部书时所吸的雪茄烟的价钱。由于长年的贫困，他不得不吸劣等牌子的烟，因此吸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医生曾不止一次禁止他吸烟。

为了使《资本论》第二、三卷写得更精采，马克思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博

览群书。在数学方面，他钻研了代数学，研究了数学分析，写了《微分史大纲》。在这个大纲“论导数的概念”和“论微分”两篇文稿里，他出色地把辩证法用于数学领域，独立地制定了解释微分学的新方法。那时候，恩格斯正在写《自然辩证法》，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于是就把《微分史大纲》给恩格斯看，在他的手稿上写道：“为将军而作”。恩格斯看了马克思的这部文稿之后说：“你无需害怕在这方面会有数学家走在你的前面。这种求微分的方法其实比所有其他的方法要简单得多，所以我刚才就运用它求出了一个我一时忘记了的公式，然后又用普通的方法对它进行了验证。”

由于马克思的勤奋，他的学识非常渊博，思想非常丰富，正像他的女婿拉法格说的：“他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

马克思在总结自己的科学研究的道路时，曾经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间，为了修改补充他的《资本论》二、三卷，他广泛地研究了物理学、植物学、土壤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农业化学、地质学、工业、手工业、土地关系、所有制、货币、银行、信贷、金融、殖民地、世界通史、原始社会、税务、财政、统计、地租、价格、生理学、气象学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书。他还细心地搜集了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匈牙利、意大利、瑞士等国官方的经济方面的现实统计资料。这就是马克思为了科学研究，为了人类解放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

恩格斯评论马克思说：“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

“爱森纳赫派”领导为了统一德国工人力量，急于求成而放弃原则，与拉萨尔派合并，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批评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满腔热忱地关心和指导着各国的工人运动。各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们，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总是要向马克思恩格斯请教，并且总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最好的建议。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哪个国家工人运动的关系，都比不上同德国工人运动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德国是他的祖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同他们有着极其浓厚的历史联系，更主要的是因为自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对欧美工人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德国社

会民主工党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坚决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俾斯麦政府加紧了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迫害。1872 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都因反对俾斯麦的侵略政策，被加上“叛国”罪名而判处短期徒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许多地方组织被封闭，就连拉萨尔派的组织也未幸免。

在反动政府的迫害下，工人阶级迫切要求克服工人运动的分裂状况，统一力量，共同对敌。这时，拉萨尔派的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工人对施韦泽公开反对巴黎公社表示强烈的不满。施韦泽向俾斯麦投降事实的披露更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工人中的影响急剧衰退。联合会为了保住自己的组织，开除了臭名昭著的施韦泽。两派工人的联合的障碍清除了。于是，在 1874 年，拉萨尔派的首领向李卜克内西等人提出两派工人组织合并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原则上同意两派合并。他们在给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信中指出，两派合并的前提是拉萨尔派完全放弃其错误观点，两派工人组织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合并。可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看不清拉

萨尔派首领们没有完全放弃拉萨尔的理论观点，急于求成，接受了拉萨尔派的和解建议，并且没有把他们与拉萨尔派商谈合并的情况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5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了两派合并前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的让步；宣扬超阶级的“自由的人民国家”，认为通过争取普选权和建立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协社，就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草案也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诬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否认工农联盟；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看完这个纲领草案后，非常气愤，严厉地谴责了爱森纳赫派负责人向拉萨尔派首领的无原则的让步。

恩格斯首先写信批评了这个纲领的错误。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在这封信中，他

还特别尖锐地责斥了关于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糊涂观点。他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马克思在1875年4、5月间,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纲领草案进行了逐条逐句的分析和批判,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的《哥达纲领批判》。

在《哥达纲领批判》著作中,马克思不仅彻底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的重要原理。他指出,过渡时期的必然性,以及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这

里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它因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在经济、道德、精神等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很多痕迹；加上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产品还不十分充足。因此，这时它的生活资料只能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也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到了高级阶段，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及产品的极为充足等，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社会主义还必须继续前进，达到共产主义。

通过《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驳斥了拉萨尔派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批判了拉萨尔的"自由国家"概念，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抨击了拉萨尔的庸俗社会主义分配观，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出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远远超出了在德国工人政党在联合时刻所给予的直接帮助，它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一样，已成为马

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

但是，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当时没有发表，那时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广大工人群众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的影响，用正确的观点来理解《哥达纲领批判》中被歪曲的词句，对它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的新闻界也没有弄清这个纲领的真正含义，误把它当作革命的纲领来加以反对。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革命形势出发，决定暂时不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

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1875 年 5 月，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哥达合并，通过了对原纲领草案稍加修改的《哥达纲领批判》。宣布合并后党的名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后又称为“社会民主党”。

德国工人力量统一以后，工人阶级受到了统一的鼓舞，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党的组织很快壮大起来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扩大了。1877 年党获得了近 50 万张国民议员的选票，有 12 人被选为议员。党的刊物也增加了

18种。这样，德国革命运动大大向前发展了。

为了把握社会主义前进方向，马克思恩格斯集中力量对付“蠢驴笨牛”，这就是无聊的杜林和“苏黎世三人团”

哥达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工人运动结束了内部的分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合并的时候没有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降低了，党内对机会主义妥协的情绪也更加滋长。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续涌进工人阶级的队伍，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更使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泛滥，特别是杜林和“三人团”的猖狂活动，给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杜林是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出身于普鲁士官僚家庭，曾任柏林大学讲师。在德国党合并前后，他以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利用大学讲坛，宣传一套所谓政治激进理论。他先后写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哲学讲义》等著作，阐述他的全面观点。杜林在哲

学上走调和派的道路，把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和露骨的唯心主义折衷在一起，认为先有模式、原则、范畴，然后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便构成现实世界。在经济学上鼓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歪曲并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来阐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把这些东西吹嘘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体系"，扬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改革"，大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杜林在德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度形成了杜林热，伯恩斯坦就是杜林的狂热信徒。那时，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有人受了杜林的迷惑，认为他的作品可以为党的利益而介绍出去，并加以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杜林的思想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严重的危害，如果不及时对杜林"理论"进行批判，不仅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传播，造成工人思想的极大混乱，而且，有可能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工人党因为杜林问题造成新的分裂。

马克思由于忙于写《资本论》，他委托恩

格斯写批判杜林的文章。从1876年9月起到1878年，恩格斯不得不暂时放下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写了《反杜林论》一书，全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恩格斯在此著中系统地阐述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也就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在哲学方面，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物质和运动、时间和空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自然和必然等基本观点，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揭示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国家、法、道德等的阶级性质。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观点，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同时，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指出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助产婆，是社会进步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在社会主义方面，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

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描绘。他指出：在没有剥削的社会里，“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列宁说道：《反杜林论》“是一部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在恩格斯著写《反杜林论》时，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百忙中，也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方面合作的一个——最后一个——典范。后来恩格斯在提到这本书的诞生时，谦虚地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政治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

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反杜林论》出版之后，给杜林以沉重的打击。许多受杜林思想迷惑的人逐渐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中解脱出来，从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巩固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清除杜林思想的工作还未结束，在德国发生了两起谋刺皇帝的事件。俾斯麦反动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件事栽赃在社会民主党头上。1878年10月，俾斯麦促成国会通过了一项“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这个法令规定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逮捕、放逐社会民主党党员，取缔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组织、报刊和集会。在非常法实行期间，党的组织被解散了，党的出版物被禁止了，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判刑、放逐。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下，党和领袖们茫然失措，而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即纠合在一起，高唱投降主义的论调，乞求统治阶级的饶恕，并胁迫党的领导自动解散党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一时动摇起来。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放弃斗争的行为。他们首先耐心地帮助李卜克内西等人克服动摇情绪，向他们说明将近 40 年来，他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李卜克内西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逐渐认识到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又帮助他们制定了党在非常法情况下的斗争策略，即采用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法，把党的组织转为秘密的地下组织，开始进行广泛的地下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坚持革命路线，在对"左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更把右倾机会主义看成是党的当时主要危险。于是争对党内纠合起来的机会主义小宗派集团，尤其是对"苏黎世的三人团"给予了严肃的揭露和批判。

所谓"苏黎世三人团"，是指三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成立的集团。这三个人是伯恩斯坦、赫希伯格、施拉姆。他们三人在苏黎世担任党的机关报编辑三人委员会委员的职务，领导着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1879 年 8 月，他

们三人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篇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仅用了三颗星花来代替名字，所以后来称作苏黎世三人团。

在这篇文章中，三人团说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该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领导；不应当以暴力革命吓跑资产者，而应当走合法的改良的道路。他们甚至要求党向俾斯麦表示忏悔，承认罪有应得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气愤，马克思当时就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污蔑党的东西。恩格斯还以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写了一封通告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德国党的领导人，对这个机会主义纲领进行了致命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了这些机会主义者的谰言。他们指出，他们在创立国际时，就明确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企图让工人阶级把自己

的解放寄托于资产者的领导，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十足的背叛。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白色恐怖面前，不是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而是要求全面地和解，这实际上是要把阶级斗争一笔勾销，所以党的领导一定要坚决反对“这种糟蹋党和理论的行为”，不能容忍这些家伙留在自己的队伍中。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个秘密的会议上，决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的一切职务。由于伯恩斯坦表示决心悔改，才暂时留在党内。这个人从此之后向马克思恩格斯靠近，还常常去伦敦拜访马克思恩格斯，并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可是，他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修正主义的鼻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自指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向俾斯麦应战了。他们已知道不怕牺牲地、机智勇敢地、创造性地保卫自己了。在议会内和议会外，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他们的作为，符合当时流行的一句话：

“社会主义在向前行，

蠢驴笨牛不能叫它停。”

紧张的革命活动和贫困的生活条件，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他患了很多疾病。在与病魔的抗争中，他又不幸失去了爱妻和长女。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也与世长辞了，但他的英名与事业却永垂不朽

紧张的革命活动和贫困的生活条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多年来，他患着好几种疾病：风湿病、神经衰弱、慢性肝病，后来又得了胸膜炎、肠胃病等等。1878年以后，每况愈下的病情日益使他的工作难以进行，然而，马克思是决不会向疾病屈服，向疼痛投降的。

只要健康有一点点好转，他就坐在那里紧张地赶工作，一心想把《资本论》第二卷脱稿。但是他的头痛几乎不能忍受，咳个不停，还有神经炎和一阵阵的头晕，使他工作不下去。这是长达几年之久同疾病进行英勇的斗争。恩格斯后来发现，他在那个时期写的手稿，“相当

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尽管孜孜不倦，他还是没能把《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完成付印。

可是更使他痛苦的，是他夫人的病。她已病了很久，一直没有确诊，可能是肝癌，看来是治不好的了。燕妮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度的疼痛。她那开朗的性格仍然没有改变。在那几个月中。她痛苦得很，可是并不灰心丧气。她写信给一位医生说：“我就是这样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我真希望还能稍微多活一个时期，亲爱的好心的医生。奇怪的是，一个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留恋‘尘世’”。

即使在晚年，她仍然不断关注着各国工人运动的每一项成绩。1880年底，马克思夫妇能够在自己家里欢迎倍倍尔了。这不论在燕妮还是在她丈夫心中，都是一件大大的喜事。倍倍尔是为了要向两位“老人”汇报德国党的所有外交内政方面的事项而来到伦敦的。他同他们商量党的策略问题，请求他们为党的机关报撰稿，得到了他们的许诺。马克思夫妇和恩格斯一样，因看到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位聪明能干，精力充沛的并且密切联系群众的领袖而欢欣

鼓舞。他们对待他甚似亲人。30年后，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激动地叙述了那次在马克思家作客的情况：

“我们在伦敦度过的那些日子里，只有一个星期天。那天我们全体应邀到马克思家吃饭。马克思夫人是久已闻名的了。她的容貌美丽，招待客人时仪态大方，和蔼可亲。我一下子就对她产生了好感。马克思的大女儿，也就是那和龙格结婚的燕妮，正带了孩子们在那里探亲。我也见到了他们。那个年代，马克思到处被人诽谤为人类最凶恶的敌人。可是我在这里却十分惊喜地看到他是多么亲切温和地同两个外孙一块儿玩，而孩子们又是多么深情地依恋着外祖父。马克思的另外两个女儿杜西（后来同艾威林结婚）和劳拉也在场。杜西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黑眼睛，非常像父亲；劳拉是头发淡黄，眼睛乌溜溜的，比较像母亲。两个人都是又漂亮又活泼。”

当倍倍尔于翌日到马克思家辞行时，马克思夫人已经疼得躺倒在床上了。这是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在妻子身边照料，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

间，陪她到法国去看看大女儿和几个外孙。回到伦敦时，她已经筋疲力尽。

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他这次大病之所以能够痊愈，全亏爱琳娜和琳蘅的悉心照顾。爱琳娜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有几件愉快的事，使燕妮的日子好过了些。从德国传来了一个消息，读者要求印行《资本论》第三版。在英国的一个著名刊物上，前所未有地登载着一篇文章，颂扬马克思为卓越的科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家。10月底的一次令人兴奋的选举结果，再次证明，即使在非常法的压迫之下，德国工人运动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工人们愈来愈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了。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他连送葬都

没去成，因为医生看到他身体太虚弱，不许他参加在海格特公墓举行的葬仪。恩格斯负责料理马克思夫人的丧事。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了讣告，讣告开头这样写道：

"死神又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夺去了一个生命。"

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夫人为无产阶级所作的贡献时写道："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自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

关于她的个人品德，就不用我来说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认为使别人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卡尔·马克思克制不了丧偶的悲痛。燕妮逝世的那天，恩格斯就说："摩尔也死了。"这

句话说得再确切也没有了。可是非常强烈的生存愿望，使他又振作起来。可恶的病损害了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战胜疾病。“遗憾的是，为了恢复健康，将采取治疗措施，这样就不得不损失一些时间”，马克思在写信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为自己的这种状况而烦恼。

他接受了医生的劝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就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起先他到怀特岛的文特诺尔去。1882年春天到阿尔及尔。可是他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的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到阿尔及尔去以后，健康情况并未好转。接着到法国南部小住，也不见好。只有到巴黎近郊的女儿燕妮家而且在夏末到瑞士去以后，马克思的身体才慢慢地复原。

10月份，马克思回到了英国，这时体力已经增强些了。他又想继续搞《资本论》，并且还要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撰写几篇文章。

然而好景不常。为了避开伦敦11月的浓雾，马克思又到文特诺尔去，可是这个冬季，那里的气候潮湿寒冷，他感到也是十分苦恼。1883年1月11日，又来了一个可怕的打击：他的大女儿因病突然去世了。“我一生经历不少伤心事，但是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却从来没有过”，爱琳娜说。她是来向马克思报告噩耗的。她知道，这个消息将会在他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感到自己此去等于是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旅途中，我焦急地绞尽脑汁，不知该采取什么方式来把这件事告诉他。但是不等我开口，他已经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来了。摩尔立刻就说：‘我们的燕妮死了！’接着还命令我马上到巴黎去照看那些孩子。”

第二天，卡尔·马克思回到了伦敦。起先患支气管炎，接着并发了喉头炎。于是他又卧床不起了。只能吃流食，达几星期之久。2月份，肺部出现了脓肿现象。

在马克思病得很严重的日子里，马克思家的女管家琳蘅像母亲一样细心地照顾和关怀他。

那些日子，恩格斯总是天天来看望马克

思，恩格斯把伦敦最有名的医生请来为他会诊，并亲自研究了一切有关肺部疾病的书籍。每天下午，恩格斯从瑞琴特公园路自己家里走到梅特兰公园路的拐角处，来到马克思住所的半圆形花坛时，总要提心吊胆地望一望马克思屋子里的窗帘是不是已经挂下来了。

3月14日那天，马克思醒来以后，感到比平日好一些，他高兴地喝了点葡萄酒和牛奶，还喝了点汤。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把他搀扶到安乐椅上，因为躺着呼吸困难，坐着感觉舒服一些。到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恩格斯来了，琳蘅说，马克思正似睡非睡。"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博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怀着悲痛的心情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写信告诉世界各地的马克思的朋友和学生，并用函电向各国社会主义者发出了讣告。恩格斯在信中说："我们党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

全世界无产阶级都为马克思的逝世而感

到万分悲痛。许多国家的革命者纷纷致电表示哀悼并献花圈。

1883 年 3 月 17 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他与妻子燕妮合葬在一起。恩格斯在墓前致了悼词。在悼词中他阐述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历史功绩：一，“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们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恩格斯还说，马克思是“科学巨匠”，但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后，恩格斯说：“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恩格斯竭力帮助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义无旁贷地担负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艰巨任务。恩格斯认为，出版马克思的遗著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屋子里堆满了书籍、卷宗和纸包。恩格斯在这些卷宗和纸包中找到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手稿足有几千页，有的章节还有好几本稿本。这是马克思花了将近 40 年的心血留下来的一份非常珍贵的遗产。

但是，手稿到底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立即出版，谁也不知道。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很关心，渴望尽快印行《资本论》的第二、三卷，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

论。而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根本不信马克思还有《资本论》二、三卷，于是诽谤马克思说：马克思生前经常说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看来他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他的思想枯竭了，他拿不出科学的论据，只好用这种诡计来恐吓他的论敌。面对着战友们的关怀和敌人的诽谤，恩格斯决定一定要出版《资本论》二、三卷。

恩格斯立即放下了自己正在从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毅然决然地开始整理和出版亲密战友的遗稿。

《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是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首先原稿笔迹不清，须要誊清一份。恩格斯日夜坐着抄写，以致于废寝忘食的工作使他的健康很快恶化了，医生禁止他再伏案熬夜，他在1884年2月5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说："咳，这个第二卷！我的老朋友，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啊！可是我那该死的病却使我不得不失去半年的时间。……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确实，由于马克思

写作《资本论》二、三卷时身体状况极差，很多手稿是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断断续续进行的，因此手稿字迹异常潦草不清，很难辨认。有许多用的是缩写字，有时用英文、法文等各种文字杂写在一起，有时甚至整个一句话只用几个字母来代替。像马克思这样的手稿，只有恩格斯这样知识渊博，对马克思的思想了解得很深刻、很细腻的人，才能完全根据马克思的精神来整理，只有恩格斯才能深深地懂得，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每一个符号、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丢失的。其次，原稿多种多样，是马克思在1861年到1880年左右不同时间写下的。恩格斯不得不从中选择出最成熟的样本。更为困难的是要把手稿中无数空白填补起来，而且要填补得好像通篇都是由马克思本人完卷的一样。恩格斯以出色的才能和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把手稿分了类，使它系统化，对照了包罗万象的新的事实材料，并且用许多注释和附件补充了这个手头的原稿。他还把手稿分成两部分，把马克思搜集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历史的丰富材料放在后一卷里发表。

经过恩格斯一年多的顽强奋斗和艰苦努力，1885 年 2 月，《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整理工作终于完成了。恩格斯把它送去付印。由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著十分严谨，对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以便搞成一部“完全符合作者本意的著作”，所以，这部著作读起来前后紧密连贯，天衣无缝，就好像马克思本人写成的那样。《资本论》第二卷的问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劳动的结果。为此，恩格斯给《资本论》第二卷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讲了他整理此卷的经过。

接着恩格斯立刻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三卷。这卷的内容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任务是“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也就是分析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派别之间怎样为分配掠夺物（以利润、企业所得、利息、地租等形式出现）而展开的激烈斗争。恩格斯本来打算第二年出版这一卷。但是，整理第三卷手稿要比整理第二卷的困难更多，这个困难超过了恩格斯原来的预料。

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初稿也极不完整。在近1000页的第三卷手稿中。有些章节只写了一些材料，有些章节甚至只写了一个大标题。恩格斯在整理过程中，就得重新安排这些材料，加以补充，并根据马克思的精神把空白的章节一一写完。这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劳动。另外，年已65岁的恩格斯当时视力衰退，只有在天气晴朗、光线充足的时候才能动笔，到了晚上很难进行工作，再加上他还担负着许多其他的革命指导工作，因此，《资本论》第三卷一直过了大约十年，到1894年才出版。

恩格斯是以顽强的精神和极大的热情来整理马克思的宝贵遗著的。对他来说，马克思的遗稿是他在科学研究中“获得最大愉快的源泉。”有一次，恩格斯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要整理像马克思这样每一个字都贵如黄金的人所留下的手稿，是需要花不少劳动的。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重新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不仅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而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所以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巨著，是他们两人共同劳动的结晶。列宁曾经中肯地写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经济理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中引起了一场空前的革命。从此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有了不可摧毁的坚实基础。

第八章　把握第二国际的正确方向

“谁要是像我这样五十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是一种义不容辞、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承担了各国工人党导师的义务

恩格斯不但紧张地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写了不少光辉的著作，给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武器，而且以他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积极指导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际的革命斗争要求恩格斯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这样就常常打乱他的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但是，恩格斯深深感到，落在他肩上的责任重

大，他必须在理论方面和实际政治方面代替已经逝世的马克思。所以，他说："谁要是像我这样五十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

19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在工人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各国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在一些先进的国家也都成立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把革命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恩格斯密切注视和仔细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情况。他给一些社会主义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同各国革命活动家大量通信，来指导当时的各国革命运动。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在反"非常法"的年代里，与反动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采取议会内外相配合的方式，不断向政府发动攻势。这样，俾斯麦看到用"鞭子"政策镇压不了社会主义运动，就企图用"糖果"政策来收买工人。从 80 年代初开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迷惑工人的"社会立法"，如"疾

病保险法”、“意外灾难保险法”、“残废和老年保险法”等等。但同时规定，凡领取国家救济金的人无权参加选举。工人没有受骗，自己组织自由互助基金会，以抵制俾斯麦的各种“保险法”，拒绝接受国家的“贫困救济金”。党的著名领袖和活动家们以个人身份当选为议员。德国工人阶级在反非常法年代里的斗争，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它不愧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

恩格斯很关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活动的情况，他积极支持利用帝国国会的讲坛来揭露统治阶级反人民的政策，积极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

恩格斯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在议会选举之前制定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条例，应采取灵活的策略，在不做原则性让步的前提下，可以与反政府的党派达成协议，为党争取更多的选票。

1884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了 55 万张选票，比三年前增加了近 24 万张选票，有 24 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当选。恩格斯知道后十分高兴。

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之后，重新在议会组织了党团组织，并充分利用它的权利开展斗争。恩格斯很重视党在议会里的斗争策略，坚决主张党团除了批评政府反人民的政策之外，还必须提出积极的法案，并为党团草拟了一系列法案，如标准工作日立法，工厂立法、生产伤亡事故责任立法、劳动残废者保障立法等等。

1887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时，获得了77.4万张选票，比1884年多22.5万张。

恩格斯对法国工人运动十分关心，他和保尔·拉法格、劳拉的通信最频繁，往往通过他们把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建议转告给工人党的其他领导人。法国工人党成立初期还不是统一的，它包含一些布朗基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那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来自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拒绝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党纲中规定的目标。主张只提出一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争得的要求，因此称为“可能派”。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他们要求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修改党纲，使它“适应”当地的情况。1882年在党的代表大会

上，可能派竟提出修改党纲总纲的部分的要求，23个盖得派的代表坚决反对，并退出会场，单独召开大会。1882年10月28日，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不会例外。……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也曾向工人党领导人指出，他们在策略上缺乏灵活性，在一些问题上有宗派主义倾向，不善于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革命力量。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拉法格等人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正确的路线，一方面和可能派决裂，一方面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斗争，积极领导法国工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

恩格斯尽力帮助工人党的领导人参加1889年举行的众议院的选举，甚至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物质上支持法国工人党的选举运动。他支持盖得·拉法格等提出的在议会里建立由七至八名议员组成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小组，恩格斯热情帮助，促进了法国工人党

迅速发展起来。

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活跃起来，从80年代起，出现了几个社会主义团体。1881年，民主联盟组成，1883年6月发表了基本上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纲领。这时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和他的丈夫艾威林参加了联盟。1884年8月，民主联盟决定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在改组之前，它内部出现了由爱琳娜、艾威林、巴克斯、莫利斯等人组成的左翼。但是，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严重的错误，海德门还是个阴谋家、野心家、机会主义分子。恩格斯赞成爱琳娜、艾威林、巴克林反对海德门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希望爱琳娜等人在工人中间进行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认为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同工人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

1884年12月，联盟发生了分裂，恩格斯支持爱琳娜、艾威林、巴克斯等人退出联盟，组织社会主义同盟。

但是，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联盟内部存在健康的无产阶级力量，因此，尽管它的领导

是机会主义的，它仍有可能提高自己在工人中的威信，必须把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同它的普通拥护者区别开来。

社会主义同盟从社会民主联盟内分裂出来之后，由于它的领导莫利斯和巴克斯受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影响，变成了脱离群众和实际斗争的宗派组织。反对一切议会活动。恩格斯在这种情况下，指示爱琳娜和艾威林退出同盟，在伦敦东头区工人激进俱乐部进行宣传活动。这种宣传活动不久就取得了成效。

1889 年 8 月 13 日，伦敦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有 10 万人。这次罢工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无产阶级尚未组织起来的阶层已经积极地参加了斗争。但是，恩格斯指出，垄断资产阶级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收买工人阶级的某一特定部分，因此英国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运动很可能只有在摧毁这种垄断地位之后才能产生。

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绝大部分是德国移民，在 1877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拉萨尔主义的观点还比较流行，恩格斯曾多次写信给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指出社会主义

工人党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并强调指出，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不脱离现在各种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努力争取建立一个美国无产阶级的全国性的政党。美国本地生长的工人组织了"劳动骑士团"。这个组织虽然发展得很快，但缺乏有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纲领。1886 年 5 月 1 日，全国一万多个企业中 35 万工人全部停工，举行大规模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规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恩格斯对 1886 年美国工人的罢工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在美国爆发，动摇了全世界资本阶级的主要支柱。

恩格斯在与左尔格的通信中，在强调美国无产阶级的罢工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的同时，还指出了美国工人运动的缺点和弱点是：缺乏明确的纲领和鲜明的目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很少，在今后的斗争过程中应注意克服。

此外，恩格斯还亲切帮助和有力指导了俄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士、丹麦、比利时、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革

命运动。

在形式上，恩格斯不是各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各国社会主义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都清楚的知道，恩格斯有渊博的知识和几十年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得到他的帮助，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列宁指出："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地增长德国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

除了恩格斯熟悉的各国社会主义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之外，还有许多恩格斯未见过面的人向他求教。

恩格斯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教条的作法，他曾多次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

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特别反对有些人常常把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能救世的教条。正因为这样，他利用欧美各国报刊和朋友们提供的关于实际运动方面的情况，对各国运动的细节问题也加以认真地分析研究。恩格斯的书信不是简单地要求或建议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而首先是针对各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具体分析，并以分析的结论中得出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建议。他的书信，往往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因此，他的许多书信被人拿去在工人报刊上发表。

“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接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在恩格斯的促成下，1889年7月14日诞生了第二国际

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1876年第一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但是，还要不要建立一个新国际？什么时候建立新国际？新国际的任务是什么？

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慎重地考虑过。1874年秋，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

“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接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1882年2月，贝克尔向恩格斯建议成立一个像第一国际类型的新国际工人组织，恩格斯认为建立新国际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为：

1）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内，反动派的势力强大，政府不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如果成立了新国际，就会受到迫害；如果建立秘密组织，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阴谋的欲望，和不可避免地有密探混进来。

2)法国工人运动的两派正在争吵不休。马克思恩格斯支持的盖得派一再犯策略上的错误。

3）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数量非常少，绝大多数工人领袖是些机会主义者。

所以，除了以上那些国家之外，剩下的就不值得花费气力建立新国际。恩格斯把将来要建立的新国际看作是这样一个团体：“它再也

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我们坚决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绝不应当在还比较安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

到了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欧美有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各国涌现出一批有威望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产阶级残酷压迫的革命愿望越来越强烈。因此，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然而，当时工人运动中形成了两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主义联盟派”为主；另一派是革命社会主义派即马克思主义派。当革命派着手筹建新的国际组织时，“可能派”及其同伙于1888年在伦敦召开了所谓“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并决定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其目的是要窃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国际工人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走上改良主义邪路。当时

德国党的领导人没有认清“可能派”的这种阴谋，竟然对“可能派”的倡议颇感兴趣，公然停止了自己原定的筹建工作，去同“可能派”进行谈判；甚至有人还主张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恩格斯知道这一情况后，坚决反对德国党领导人的做法，他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批评了他们与机会主义调和的倾向，建议国际代表大会由法国社会党主持召开，并且大会应该具有纯粹社会主义的性质。

恩格斯毫不含糊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他说：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

为了粉碎“可能派”的“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恩格斯甚至中断了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东奔西走，写了许多信”。1888年12月4日，恩格斯写信给法国党领导人拉法格，要求在各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宣传召开革

命派代表大会的消息，并且警告说：如果你们一点事情也不做，不宣布你们要在1889年举行代表大会，那么人们就会跟着“可能派”走。同时，恩格斯还对德国领导人作了大量工作。后来，恩格斯给左尔格写信说明给德国领导人做工作的情况，他说：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说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

在恩格斯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下，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终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并于1889年2月在海牙召开了预备会议，会议决定在同年七月，即在“可能派”开会的同时，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以便在两个代表大会对照之下，让工人群众识破“可能派”的机会主义本质。

1889年7月14日，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两个对立的代表大会同时在巴黎召开。参加改良派大会的有九个国家的代表，共有550名，其中法国人竟占487人；参加革命派大会的代表，共有393名，来自22个国家，其中很多人是各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革命派大会会场的布置是这样的：会

场上悬挂旗帜，挂着马克思像和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其他战士的像。讲台正面挂着的红布上写有金字的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左右两侧挂着两幅标语：一幅写着："工人党"，另一幅写着："中央革命委员会"。台前是说明社会党工人的目标和要求的口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

大会选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盖得、拉法格等人组成主席团。李卜克内西为执行主席。恩格斯因忙于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未能参加大会，但他热烈欢迎这次大会的召开，并赞扬大会的胜利。

革命派的这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没有在形式上通过一个关于成立新的国际联合会的决议，但实际上这次代表大会事实上宣告了新的国际即第二国际成立了。由于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第二国际直接继承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传统，所不同的，只是从它创立之日起，它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为基础的。正如恩格斯预言的，第二国际的任务是使国际工人阶级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个历史使

命，可是在25年以后，这个历史使命竟被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导者背叛了！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以象征工人阶级团体、斗争、胜利的每年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

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许多工业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巨大的示威来纪念自己的节日。恩格斯参加了1890年5月4日（星期日）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示威运动。示威场面使他极为激动。他在1890年5月9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说：

“这里5月4日的示威真是规模宏大，甚至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第四号讲坛（一辆大货车）上面，环顾四周只能看到整个人群的1/5或1/8，但是在目力所及范围内，只见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有25万至30万人，其中3/4以上是参加示威的工人。艾威林、拉法格和斯捷普尼亚克都在我的那个讲坛上发表了演说，而我纯粹是一个观众。”

信的末尾一句是：“我昂首走下了那辆旧货车。”

恩格斯对朋友和同志如春天般的温暖，在生活上和思想上无私相助。他对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都能用通俗的语言解答清楚。只要和他接触，就会使人精神振奋

还在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恩格斯的夫人莉希患了重病，虽然恩格斯想方设法多次带她到疗养地治病，但始终没有痊愈。1878年夏，莉希的病情急剧恶化，终于在9月12日逝世了。

莉希的逝世，对恩格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和恩格斯生活了15年多。多年后恩格斯回忆说：

“我的妻子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

恩格斯的夫人逝世后，对他的家务的照

料，就落到他家抚养的莉希的侄女，即玛丽·艾伦·白恩士身上，亲友都称她为彭普斯。

过了几年，艾伦·白恩士结了婚，这时，恩格斯的家务开始由马克思的前管家琳蘅主持。马克思逝世以后，琳蘅被接到恩格斯家，从此，她不仅是恩格斯的女管家，而且是恩格斯政治上的助手。她和在马克思家里时一样，热情地接待来访者和客人，听取外国来的人讲新闻，甚至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讨论。由于她敏感性强、思想坚定，对人对事都有一定的见解，因此，在日常生活上和政治上都能帮助恩格斯做大量的事情。如果说琳蘅是恩格斯的女管家，不如说她是恩格斯家的主人，她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

恩格斯对这位品质高尚、为马克思操劳40多年的老人十分尊重和优待，把她当作亲密的战友，为了让她得到充分的休息，恩格斯雇了女佣人，而琳蘅可以随时离开伦敦去德国探亲，或者到海滨去疗养；在伦敦她可以随时去参加各种娱乐活动。

恩格斯到了老年时候，总的说来身体状况很好，有时犯点小毛病，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

恢复健康。

1884年秋，恩格斯犯了腹股沟疝病，这种毛病是他在年轻时因猎狐连人带马摔了一跤而落下的。病复发时不能下床，一直过了半年才恢复健康。这时他意识到爱护身体的重要性，从此之后，他如果感觉健康状况不好，就努力做到静卧，每年盛夏，恩格斯也要停止工作，到海滨去休息一个多月。

1887年1至7月，恩格斯患眼病，根据医生的要求限制工作时间。为了完全克服视力衰弱和慢性结膜炎，他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到美国和加拿大去一次游览。

1888年8月，他邀请老朋友，著名化学家肖莱马和他一起去美国旅行，陪同他们的有爱琳娜和艾威琳。他们乘“柏林号”客轮从利物浦码头出发。“柏林号”的乘客不多，伙食很好。有很长的甲板供乘客散步，经过10天海上航行才到了美国。

他们先到纽约，在老朋友左尔格家里住了8天，以后又到了波斯顿住了7天，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玩了5天，然后顺着安大略湖驶往圣劳伦河，顺流而下来到蒙雨阿勒，从那里回

到美国的普拉茨堡，顺路到了阿德朗达克山脉。尔后乘船经过香普冷湖和乔治湖，驶向沃尔巴尼，最后沿哈德逊河回到纽约。

9月19日，他们乘"纽约号"客轮回英国。

这次旅行给恩格斯和肖莱马都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恢复了疲劳，感觉到至少年轻了五岁。恩格斯的眼病也消失了。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女儿十分关心。劳拉和她丈夫拉法格住在巴黎。1883年4月底，拉法格和盖得等人因发表演说而被法庭判处六个月监禁。拉法格第一次坐牢，不免有些害怕，恩格斯写信要他鼓起勇气。他根据李卜克内西多次蹲监狱的经验告诉拉法格，监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他要求拉法格利用在监狱的时间自学德语。拉法格出狱之后，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由于拉法格常常受反动政府的迫害，生活很困难，恩格斯及时给予帮助。恩格斯和劳拉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劳拉的三个孩子在巴黎公社革命间先后死去，以后再也没有生过孩子。因此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协助拉法格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恩格斯写给劳拉的书信里，把国际运动的一切情况告诉

她，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情况和健康情况告诉她，常常要求她到伦敦去住几天。如果恩格斯弄到名贵的酒，就要求劳拉和拉法格去，劳拉和拉法格每次到伦敦去的路费，都是恩格斯付给。

恩格斯把爱琳娜和艾威林看作是自己的孩子，每到星期日和节日，爱琳娜和艾威林就到这位老人家去吃饭。这对年轻的夫妻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得到恩格斯的关照。

恩格斯对革命老战士十分关心。老朋友贝克尔是 1849 年巴登起义军的指挥官，他在革命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一位天生的人民的统帅，他具有惊人的冷静头脑和罕见的善于指挥部队的才能。他在政治上能够坚决地执行正确路线。但是，他在晚年住在日内瓦，依靠写通讯稿维持生活。1886 年 9 月，恩格斯邀请他至伦敦作客，贝克尔在恩格斯家里住了十天。他已是 77 岁的老人了，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辛辛苦苦地收集材料，为维也纳出版的《通讯》杂志写稿，他也很想做这件事，但是，这位老人不可能在继续写通讯稿的同时，还写回忆录。为了帮助这位老英雄，恩格斯每个季

度给他寄去五英镑，同时写信给倍倍尔、伯恩斯坦等人，要求德国党每月固定给贝克尔一定数目的生活补助费，他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党既然在财力上允许（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话和从苏黎世得到的消息来看，情况是这样的），那它就应该用自己的抚恤金起码是部分地负担这位老战士的生活费用，而不要让他为了每星期挣25法郎累瞎了眼睛。”

恩格斯还告诉倍倍尔，贝克尔写回忆录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回忆录对德国革命运动史、对德国党成立之前的历史、对党成立之后的部分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可惜的是，党给贝克尔的生活补贴落实后不久，贝克尔去世了(1886年12月7日)。恩格斯在贝克尔去世的第三天就发表了悼文，恩格斯写道：

“贝克尔的逝世，使我们丧失了我们有过的唯一一位德国革命将领。

这是一个光荣地参加过三代人的解放斗争的人。”

恩格斯对已故的老战友的亲属也很关心。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普劳德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和女儿生活十分

贫困，恩格斯一方面经常给她们经济上帮助，另一方面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每月给她们一百马克的生活补助费。

由于恩格斯对人和气并且好客，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更加敬爱他，他们从世界各地络绎不绝地来到伦敦拜访这位老人，特别是星期日，是恩格斯家最热闹的时候。恩格斯把平时节俭的钱花在星期日招待客人上。

不论是住在伦敦的朋友，还是从国外来的客人，不论是革命的老人，还是刚参加运动的年轻人，不论是恩格斯的亲属，或是马克思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根据恩格斯的习惯，往往都在星期日到他家里集会，他们欢聚在一起，愉快地饮酒谈笑。恩格斯时而用德语，时而用法语、英语和其他语言和人谈话。人们对他产生极好的印象，只要和他接触，就会使人精神振奋。他那大无畏和乐观精神能鼓舞每一个人。谁要是有悲观失望和沮丧情绪，经恩格斯寥寥数语，就能把精神激励起来。恩格斯对人的鼓励是以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坚强的政治信念为基础的。这位勤奋不懈的巨人，不论在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文学等

方面都非常精通。他对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都能用通俗的语言解答清楚。

恩格斯每天总是要抽出时间阅读各国的报刊，他对各国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常常向这个国家的朋友介绍那个国家的情况，而向那个国家的朋友介绍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他的记忆力很好，以至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他能滔滔不绝地讲得十分准确。他十分健谈，无论怎么陌生的人，和他交谈后，立即就感觉毫无拘束了。

到恩格斯家作客，是件很荣幸的事，因为他能使人丰富知识，焕发精神。所以，朋友们就像探亲那样希望到他那里去住几天。恩格斯家里有备用的客房，他希望朋友们到他家作客。只要他知道那位朋友要到伦敦去看望他，他就亲自到车站或码头去迎接。有时在一个月内，他要接待好几位客人。

在理论方面得到恩格斯帮助最大的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考茨基在年轻人中，是一位唯一勤学的人，只是由于他为了挣钱谋生而写作，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考茨基夫妇在伦敦居住近四年，他们在理

论上得到恩格斯的耐心帮助，恩格斯还教考茨基识别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字迹，准备把《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交给他誊清。

1888年初夏，《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到伦敦，伯恩斯坦也随之来到伦敦。伯恩斯坦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受过中等教育，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他是银行职员和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柏格的私人秘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曾参加过苏黎世三人团的宗派活动，后来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愿意改过。1881年拜访过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向马克思恩格斯求教。伯恩斯坦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学习勤奋、思想开朗、头脑机智、经得起批评，又会办事。因此，得到恩格斯的信任，恩格斯说他大大超过考茨基，说他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但是，恩格斯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优缺点都看得很清楚，这两位年轻人都缺乏自信心，特别是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往往动摇，露出沮丧情绪。作为政治活动家，这种毛病会导致丧失政治信念的危险。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这种缺点，教导他们不要只看到运动的现

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

第二国际初期，在许多国家工人党中，搞阶级调和、走议会道路的思潮甚嚣尘上，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再版《法兰西内战》，撰写《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从而保证了第二国际初期活动方向的基本正确

第二国际的初期活动主要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由于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但是，到了 90 年代初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开始泛滥，搞阶级调和、走议会道路的思想在第二国际领袖当中也颇有市场。

在德国，俾斯麦对工人阶级的恐怖政策产生了和他预期相反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增长，党员人数增加到数百万人，而且许多人曾在军队里服过役。1890 年，非常法实施期满，资产阶级担心“过激”的措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要求改换统治手法。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宣称“反对镇压”。俾斯麦被迫辞

职，议会决定不再延长非常法。

工人阶级斗争取得的辉煌胜利，使德国民主党的领导人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可以不通过暴力斗争，而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的道路达到解放工人阶级的目的。这个思想在第二国际其他国家工人党领袖中也很有影响。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第二国际的前途就会被葬送。面对这种情况，70 岁高龄的恩格斯以惊人的毅力，决定采取措施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

189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哈雷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拟定党的新纲领。这次大会后，在党的刊物上展开了关于党的新纲领问题的讨论。为了使党的新纲领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党的纲领，帮助党同党内猖狂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恩格斯决定发表马克思在 1875 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手稿。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给拉萨尔主义以毁灭性的批判，并且最完备地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观点。它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同时是对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典范。

1891年1月底，《哥达纲领批判》和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恩格斯根据《新时代》出版者狄茨和考茨基的请求，将给白拉克的信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尖锐的词句删去或修改得缓和了。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上了党的议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极大惊慌和愤恨，他们公开跳出来叫嚣说：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对恩格斯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也极为恼火，恩格斯则通过回信耐心地教育他们，说明发表马克思的纲领批判的必要性。

为了用事实教育党的干部，为了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恩格斯借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的活动的机会，于1891年3月再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并写了一篇很长的

《导言》。恩格斯在《导言》里针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在《导言》里再一次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无产阶级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砸毁旧的国家政权，用真正民主的新的国家政权取代它，才能巩固自己争得的统治，并且在新的国家政权中，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规定由普选产生的公职人员可以随时被选举者撤换；第二，公职人员的最高薪金不能超过工人的最高工资。

由于德国党的领导人对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让步妥胁。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更加猖狂，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福尔马尔于1891年6月1日在慕尼黑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发表机会主义的演说，认为政府废除非常法和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存在，以及允诺社会改革，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要求党放弃革命目的，只进行合法的改革斗争和议会斗争。恩格斯写信给《新时代》编辑考茨基，尖锐地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必须痛击"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恩格斯要求党取消福尔马尔用党的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

恩格斯坚持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再版《法兰西内战》，以及主张对福尔马尔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对进一步讨论并制定党的新纲领草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1年6月18日，费舍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斯新党纲草案。恩格斯认为，现在这个草案大大优于以前的纲

领。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被清除;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讨论。

恩格斯研究纲领草案后,写了《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纲领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恩格斯把那种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的做法,叫做机会主义,而且这种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是恩格斯为反机会主义,争取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不调和斗争的范例。

1891 年 7 月 4 日,《前进报》公布了党的执行委员会考虑过恩格斯意见而修改过的纲领草案。这个经过修改过的纲领草案在各级党组织里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提出了一些建议和修改意见,而且提出了新的纲领草案,

《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了由考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从恩格斯1891年9月28日给考茨基的信和9月29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考茨基的纲领草案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意见，但整个说来，他认为它比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草案较令人满意，建议考茨基作一些修改，赞成倍倍尔支持考茨基的草案。

党的执行委员会为了审查提出来的各种纲领草案，成立了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纲领委员会。由于恩格斯和倍倍尔支持考茨基的草案，纲领委员会就以考茨基的草案为基础，制定出最后的纲领草案。并提交1891年10月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它清除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明确地表述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纲领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恩格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所采取的几项措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这些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而

且也有力地鞭挞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从而保证了第二国际初期活动基本上沿着正确的轨道开展起来。

为批判法、德两国工人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写下了《法德农民问题》，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纲领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夺取政权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中，争取同盟军——农民的问题占了显著的地位，而且成了工人运动内部意见分歧的焦点。在欧洲国家里，法、德两国农业方面的资本日益集中尤为迅速，使国内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产，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因此，农民一反以往对政治采取冷漠隔世的态度，而要寻找一条出路，摆脱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受到的生存威胁。这样，社会主义政党就在实际上有可能去吸引农村居民参加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剥削者国家的斗争。

法国是个“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法国

工人党首先应该考虑如何把农民争取到自己的这边来。但是法国工人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在农民问题上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和政策。1892年9月，法国工人党在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土地纲领；1894年9月，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对这个纲领作了补充，加深了纲领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其主要表现是：把争取农民只看作议会选举的需要，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无视农村居民中包含有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笼统地提出联合农村中的“一切成分”，把富农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土地经营者都联合起来；牺牲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则，提出维护农民私有制，“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的错误主张。

在南特代表大会后不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巴伐利亚党的领导人福尔马尔援引法国党的《南特纲领》，主张在党的土地纲领中不仅要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要反映富农以及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散布谎言，说什么《南特纲领》“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

恩格斯对德、法两国工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十分不满，对福尔马尔的谎言非常愤慨。他在给德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

“我不得不声明，……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

“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么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福尔马尔所说的相反的东西”。

他指出，福尔马尔是叛徒，其农民政策甚至比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右。他十分赞赏倍倍尔在代表大会上对福尔马尔机会主义观点所持的原则立场，批评李卜克内西袒护福尔马尔的错误态度。他对李卜克内西说：

“如果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把党置之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作是党内的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这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他急于进行辩论，这不过是履行自己的重大的职责，注意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正确

地解决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

为了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纲领，批判法、德两国工人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恩格斯于1894年11月写成了《法德农民问题》。

《法德农民问题》全篇贯穿着这样一个真理：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恩格斯说：除了少数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例如英国本土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只有争取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才能取得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同时，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获得真正的解放。由此可见，工农联盟是符合工农两大阶级根本利益的。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迫切任务。

恩格斯根据经济地位的不同，把农村居民分成为几个组成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大农和中农、小农、农村雇佣工人。恩格斯认为，农村雇工是工人阶级的忠实同盟者。小农是农民

当中最重要的阶层。对待小农的态度，是确定对待其他阶层态度的立足点。恩格斯详细论述了小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私有者。由于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压榨，他们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作为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点根深蒂固，拼命抓住小块土地不放。小农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态度，甚至使他们容易受到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把工人政党看作危险的敌人。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不可克服的。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能够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工人政党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这部分农民身上。

恩格斯严厉批判《南特纲领》关于“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的谬论，指出工人政党决不能联合农村的大农和剥削短工的中农，更不应该联合大土地所有者。

无产阶级虽然必须联合广大小农，但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为生产资料公共占有而斗争。工人政党必须向农民反复阐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

真理："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恩格斯在书中还向社会主义政党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阐述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在当时，对于第二国际各国工人政党反对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第九章　恩格斯的晚年

“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恩格斯的一生是为工人阶级解放奋斗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我还有一分力量，我就要坚定不移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正因为这样，他赢得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尊重和爱戴。但是，他总是非常谦虚，把这种荣誉归功于马克思。

恩格斯 70 岁生日的时候，祝贺的电报、信件、礼品从世界各地像雪片似的飞来。有的送来精美的相册，有的送来珍贵的画册，德国佐林根地方的人，还送来了一把精制的小刀。恩

格斯在答谢这些祝贺时，把各国社会主义者给他的荣誉归功于马克思。1890 年 12 月 5 日，他在给法国党领导人瓦扬的复信中写道：

“我收到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贺信。由于我比别人活得长，命运要我享受我已故的同辈人，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所应得的荣誉。请您相信，对于这一点以及这一荣誉中属于我个人的微小的一部分，我不抱非分的想法。”

恩格斯在 1891 年生日那天，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贺电贺信之外，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歌手们还准备举行音乐会庆祝恩格斯 71 岁生日。恩格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给歌手们写了一封热情的信。他在信中说：“马克思和我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恩格斯要求歌手同志们放弃这个打算，并且非常诚恳地表示：“既然我出于不得已而只好阻止你们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意愿，我只有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 50 年的伟

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与梅林的通信中，对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提出的异议是：对他的评价太高了。恩格斯说他自己的一切独立发现，早已被眼光锐利、眼光更开阔的马克思发现了。

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对他的颂扬——无论是谁对他的颂扬，他都表示坚决反对。1890年12月初，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发表之后，恩格斯就批评她“过分地颂扬”了他。1892年5月3日，恩格斯接到《新时代》编辑考茨基的通知说，《新时代》撰稿人、经济学家鲁·迈耶尔在他写的《大总部和为报纸写作的小笔杆》稿子中，称恩格斯为“目前健在的最老和最大的经济学家”，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复信中，坚决反对这种称号，他指出，给我想出什么头衔，简直是胡闹。他要求考茨基为他做一件好事，把迈耶尔写的那些东西全部改掉，并向迈耶尔解释清楚，希望迈耶尔学会正确的表达方法，避免用广告式的语言。

1894年5月，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恩格斯为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回信中拒绝这样称呼他，“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

1893年8月，73岁高龄的恩格斯亲自来到瑞士苏黎世参加了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快闭幕时，大会为恩格斯的到来并致闭幕词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历时几分钟之久！

“热烈的掌声此伏彼起，代表们和走廊里的群众都热诚地欢迎这位忠诚勇敢的同志。”恩格斯用法语、英语和德语致了闭幕词。他首先声明说：“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大（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接着恩格斯又说：“……现在国际要比以前强大

得多了……为了不致蜕化成宗派，我们应当允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了。”

1893年9月，恩格斯到了维也纳，9月11日，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举行了欢迎恩格斯的晚会；9月14日，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恩格斯作了简短的发言，他再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功绩和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他说：“到处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利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恩格斯又谦逊地说：今天国际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即使50年来，我对运动作出了某些贡献，那我也不希望任何报答。对我来说最好的报答就是你们。对我的报答就是整个世界！台下群众为恩格斯的话所倾服，报以热烈地掌声。恩格斯接着说：我们这

些人就是一个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伟大强国，是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决定一切的强国，这就是使我骄傲的地方！

的确，恩格斯就是这样一位诚挚而谦逊的伟大的革命导师，他把一切功劳和荣誉归于他的亲密战友马克思，并对日益蓬勃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充满了自豪和信心。他无愧地这样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恩格斯晚年仍努力工作，虽患不治之症，却仍保持乐观诙谐的性格。1895年8月5日，恩格斯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理论，却是一盏不灭的明灯，永远光照人间

由于恩格斯年轻时喜欢体育活动，诸如击剑、骑马等等，到了老年，他能够保持精神饱满，乐观，从来不为什么事情而自寻烦恼，所以，他的身体是健康的。

恩格斯到了 72 岁，还有很好的胃口，走起路来还很精神。他被称为是伦敦的最显年轻的老人之一。但是，他毕竟老了，对于吸烟和饮酒都得极力节制。他每年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休养和旅游，以便恢复那疲劳过渡的身体。他把休养的时间一般安排在酷暑的夏天，而在气温宜人的季节则埋头工作。

1890 年 6 月，老朋友、著名化学家肖莱马邀请恩格斯和他作一次到挪威去的航海旅行。7 月 1 日，他们乘船启航。一路风平浪静，3 日下午到达挪威海岸，船在岛屿和礁石之间前进，沿着哈丹格尔峡湾北上。不久到达沃达。沃达那里已经没有真正的黑夜，太阳是 22 点钟落的，太阳落山后，只是显得昏暗，北边的天空是红色的，天气清凉爽快。第二天早晨，他们驱车进入盆地，那里的风景很像瑞士。当天下午他们回到沃达，睡一夜之后继续北上。7 月 7 日到达特隆赫姆，观赏了大瀑布。随后他们往特朗瑟，在那里访问了当地的拉普人，参观他们的训鹿。拉普人很矮，但是他们很有趣。从特朗瑟向北，便是哈默菲斯。恩格斯和肖莱马在那里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鳕鱼。从哈默

菲斯北上，便到了北角，北角见不到黑夜，他们观赏了有名的午夜之日。但是，他们感觉再没有什么比那种长久的白昼亮光更快地使人厌烦了，整天看不到黑夜，总是在明亮的光线下睡觉。

恩格斯和肖莱马从北角返回来，在北部的斯瓦尔提森，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接连不断的大冰川。在那里，他们曾到过一个冰川旁，这冰川同海只隔一层很低的冰碛层，因而同海面很接近，约高出一百英尺。从伏斯到卑尔根一段路程，火车四个半小时行驶了108公里，列车在各种各样的悬崖峭壁中行驶，全部线路几乎都是靠爆破开出来的。

恩格斯和肖莱马于7月22日在卑尔根乘“锡兰号”汽艇游览峡湾，以后乘轮船返回伦敦。恩格斯感觉这次旅行愉快而有意义。

1891年夏、秋两季，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英国威特岛）休养，住在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易莎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在二个星期里，他们不是爬山，便是涉水，对恩格斯的健康大有裨益。

1892 年夏，恩格斯准备回德国避暑旅游，但是，由于他在 8 月初老病复发了而不得不放弃这次旅行计划。

到 1893 年夏天，恩格斯才实现了他去德国和瑞士的旅行计划。他为了慎重起见，在去德国之前，先到伊斯特勃恩休养几天，然后动身去德国。他先到科隆，与倍倍尔夫妇会晤，然后同他们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的时间看望去那里旅行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由于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邀请，恩格斯于 8 月 12 日返回苏黎世参加大会，并作了闭幕式发言。

恩格斯在苏黎世表妹博伊斯特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然后随同倍倍尔、门德尔森到伯尔尼南方高原地区旅行。那里天气晴朗风景优美，“少妇山为我们穿起格外洁白的睡衣。少妇山、勃朗峰和玫瑰峰是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三座最美的丛岭。”

他们从那里回到苏黎世，在苏黎世附近的雨特山游玩，在那个小山上，可以眺望远处一派雪山连绵的美景。

恩格斯和倍倍尔于9月初离开苏黎世，到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在维也纳，恩格斯和倍倍尔受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热烈欢迎。恩格斯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发言，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

恩格斯走访维也纳之后，前往柏林。他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在柏林，也同维也纳一样。恩格斯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德国社会民主党不顾恩格斯的反对，为欢迎他在9月22日举行了有4000人参加的大会。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他不把柏林社会民主党大会看作是对他个人的接待，而看做是对一个伟大的同事和战友、对马克思的斗争中的同志的接待。接着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政党，由于它的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

9月26日，社会民主党为恩格斯举行了同志宴会，李卜克内西在宴会上祝酒，指出了恩格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作用。

恩格斯结束这次旅行回到伦敦后，曾写信给拉法格和左尔格等人，对这次旅行中受到的

隆重接待表示吃惊，他写道：

“所有这些，当然他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完全不合我的口胃；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下一次我要求有一个书面协定，保证我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出来旅行。”

1890年11月4日，琳蘅去世了。琳蘅和恩格斯一起幸福地度过了七年，由于她的帮助，恩格斯才能在这七年内安静地工作。她逝世了，是很大的损失。恩格斯在写给老朋友左尔格的信中说：“最后的两个1848年前的老战士。现在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琳蘅去世了，居住在美国霍布根的老朋友左尔格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但是，恩格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搬往美国的。可是在伦敦住下去，就必须有一位可靠的人来主持恩格斯的家务。

不久，恩格斯接到了维也纳路易莎·考茨基的信，她愿意到伦敦主持恩格斯的家务并担任他的秘书。

路易莎·考茨基原来是考茨基的妻子，在德国实施非常法的初期，她随着考茨基来到伦

敦，常到恩格斯家里作客。路易莎给恩格斯留下了生气勃勃、使人高兴的印象。1888 年，路易莎随考茨基回国，不久传出消息说他们离婚了，原因是考茨基喜新厌旧，他趁路易莎去维也纳看望自己有病的母亲的机会，和州法院法官的女儿勾搭成奸。路易莎同意和他离婚。

恩格斯知道这些情况后，多次写信给考茨基，批评他作风不正和随便抛弃自己妻子的错误。

琳蘅去世时，恩格斯接到路易莎拍来的唁电。恩格斯为答复路易莎的慰问而给她写了一封信，并表示希望她搬到伦敦来，担任她的秘书。

路易莎立即表示同意，并于 1890 年 12 月底收拾行李离开维也纳，搬到恩格斯家里去。路易莎是位干静、利落、十分能干的年轻女子，她管理恩格斯的家务，照顾恩格斯的生活，恩格斯非常感激。恩格斯又能安静地工作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因为路易莎又同时做他的秘书。她在他那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要是别人，就不会做那么全面的工作。

恩格斯为了减轻路易莎的家务劳动，雇了

二个女佣人。路易莎除了作秘书工作之外，还独立地写作，为一些工人报刊写稿，还担任了维也纳出版的《女工报》的编辑。她经常与各国社会主义者直接通信，接待来自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人和恩格斯的朋友，参加1891、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94 年初，路易莎和一位青年医生弗赖贝格尔博士结婚。弗赖贝格尔原是维也纳大学的医生，工作很有成绩。奥地利著名议员就把他介绍给恩格斯，1892 年 11 月 3 日他从维也纳来到伦敦，住在恩格斯家里，并在伦敦一家医院当医生。

路易莎和弗赖贝尔格结婚之后，仍然和恩格斯在一起生活，他们夫妻两人对恩格斯的健康百倍小心，制定了对健康长寿有益的饮食措施。这无疑对年老的恩格斯的健康起着良好的作用。

恩格斯在 1892 年 8 月初，老毛病——腹股沟疝复发。经过一段时间医治和休养，像“老牛拉车”那样慢慢地恢复健康。

1893 年 11 月下旬，恩格斯一连好几天收到从德国、奥地利、美国打来的许多电报，询

问他的健康情况，恩格斯在1893年2月7日给俄国一位朋友复信中，说明自己对生命的看法：

“您友好地说祝愿我活90岁，我非常感谢，我并不反对，如果我仍然能像现在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我的体力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常有的那种衰退的话，我就要恳求您原谅，我宁可不在人间。”

为了预防万一，他在1893年7月26日重新修改了自己的遗嘱。他在马克思在世时，曾起草了一份遗嘱，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遗赠马克思。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重新写了一份遗嘱，把他的遗产平均分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爱琳娜，和马克思已故的长女燕妮的孩子以及海伦·德穆特（即琳蘅）。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琳蘅已经去世了，他就必须修改自己的遗嘱。他把他的1000英镑遗产赠给倍倍尔和辛格尔，作为德国党竞选国会议员的经费使用；给他的内侄女罗舍3000英镑，其余的财产分为八等分，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3/8，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3/8（其中劳拉和爱琳娜各取出1/8给马克思已故的大女儿燕妮的孩

子们)；路易莎2/8。恩格斯还嘱咐：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和手稿、私人信件移交给爱琳娜，他本人的全部书籍和全部著作权移交给倍倍尔和辛格尔，他的全部手稿和全部信件遗赠给倍倍尔和伯恩斯坦。

1895年5月初，恩格斯正在准备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和他和马克思的全集时，得了食道癌。恩格斯病的发展的过程是：起初，他脖子的右侧出现了一个肿块，不久就扩散，成为一簇位于深部的由于某种原因凝集而成的腺体。

恩格斯重病在身的时候，仍然坚持工作。

1895年6月，由于恩格斯脖子上的肿瘤痛得使他几个星期无法睡眠，弗赖贝格尔医生决定送恩格斯到伊斯特勃恩海滨去休养。伴他同去的有劳拉·拉法格。6月18日，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我还强健，吃得多一些，胃口也好了一些，人们说我的气色不错，因而整个状况好转，但是，病的进程也在加快：肿瘤扩大，疼痛加剧，睡眠不好等等。病情进展很急，不像在伦敦时那样缓慢，但属正常。"到7月24日，恩格斯的病已经很重了，他又

从伊斯特勃恩返回伦敦。

到了这时，恩格斯对自己的病还一直持乐观的态度，他指望能够战胜疾病。但是周围的人已经知道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了。

恩格斯回伦敦之后讲话半个钟头，就讲不出来了。后来他只能利用一块小型记事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如此，他的情绪很好，怀着痊愈的希望。他还在记事板上写着一些开玩笑的话，但别人看了是很难受的。他只能吃流质，体力已经非常衰竭。后来，连穿衣脱衣都要别人的帮助。

恩格斯的亲人、德国和其他国家党的领导人开始着手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但不幸比预料更快，8月5日晚上10点30分，伟大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长眠了。

恩格斯在伦敦的亲人和朋友通知各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这一沉痛的消息。

恩格斯去世前曾经指示，不要举行任何群众性的纪念仪式，他一生始终尽量避免宣扬个人。朋友和亲属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隆重的仪式。准确执行已故者的愿望，是对他应尽的义务，隆重而豪华会有损于对逝世者的纪

念。有些党内的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示惊奇：为什么没有向广大党员透露了一点点有关恩格斯生病的消息。医生早已诊断恩格斯生病的消息。医生早已诊断恩格斯患了绝症，当时理应尽一切努力避免把病情声张出去，免得让病人知道他病危的实情，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停止仔细阅读各种报纸。这就是对他病情保持沉默的原因。

恩格斯在德国的亲属有四人来到了伦敦，为逝世的亲人准备了一个用鲜花扎成的大卧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献了大花圈，并签上名："献给不朽的朋友和顾问——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尔·拉法格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弗·沃尔霍夫斯基以俄国社会主义小组"人民意志"的名义、维·查苏利奇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献了花圈，奥地利党、瑞士党、《前进报》编辑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亲自拜访过恩格斯的各国朋友、以及最亲近他人的人都献了鲜花。这样一来，躺卧着即将送去火化的伟大领袖的遗体的灵柩，实实在在铺满了鲜花。

8月10日，恩格斯的追悼会在伦敦韦斯

敏斯特滑铁卢车站候车大厅举行。灵柩安放在候车大厅的台座上，覆盖着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送的花圈。参加追悼会议仪式的大约有80人，其中有恩格斯在德国亲人代表（四位侄子）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老朋友。

葬仪在下午2时举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作为恩格斯最老的朋友，说：自从卡尔·马克思离开人间以来，德国党不曾遭受过这样的打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去世，是马克思的第二次去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卡尔·马克思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与马克思有如一个巨大与另一个巨人，是不能分割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工作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

李卜克内西接着又悲痛而严肃地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你的思想，以及你和朋友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把我们炼就成一个统一体，指引我们奔向胜利！我们哀悼你，就像哀掉卡尔·马克思一样。我们不会用石头或金属为您铸造纪念碑。您比这样的纪念碑伟大得

多，而且您并没有去世！您仍然活在我们心里，我们对您们两人欠下的感激之情，只能用实现您们的学说来偿还。

保尔·拉法格、倍倍尔等相继讲话沉痛哀悼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下午3时30分，一辆灵车盖满鲜花和花圈驶向沃金火葬场。赛米尔·穆尔（他本人与路易莎、伯恩斯坦为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艾威林、拉法格、李卜克内西、辛格尔等作为正式的见证人出席了火葬仪式。

恩格斯的逝世，引起了全世界工人同声悲恸。这是用各种语言发出的声音，在美洲的铜矿场、西西里的硫矿坑、印度炎热的稻田和澳大利亚闷热的纺纱厂——在贫困而疲惫不堪的人们盼望着好时光到来的一切地方，都笼罩着因恩格斯的去逝而带来的悲哀。

恩格斯曾经吩咐把他的骨灰投入大海中，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们为他树立墓碑。

8月27日，爱琳娜、列斯纳和伯恩斯坦遵照恩格斯的遗嘱，护送他的骨灰罐到他生前喜爱的地方——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岩壁，将骨灰罐投入海中。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列宁，在他的悼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开头援引一位俄国诗人的著名诗句。但是，波涛澎湃，海浪翻腾，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动员和武装起来的千百万无产阶级，汇合成不可阻挡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大军。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必将在全世界胜利。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